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与1992年



## 1992：历史不会忘记

邢贲思

光阴穿过公元 1992 年，驶进 1993 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年时间，只是短暂的一刻。但，只要伴随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进步，这一刻便将永载史册。

1992 年，就是这样的一刻。中国的改革掀起新的高潮，它来得迅猛、全面，深刻。五千年文明古国被搅动，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起一团火，12 亿人口都在动，整个世界都倾听着中国。

这是东方睡狮醒来的时刻！

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迈动巨人的步伐，完成了南巡壮举。他在南巡期间的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全国人民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建设的步伐再快一点，千万不要丧失发展中国的大好时机。三月份，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于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改革开放热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2 年，我国人民思想解放达到了新的程度。通过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全国人民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冲破束缚，转换脑筋。人们不再纠缠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敢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采取和吸收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左”的危害，再一次清除“左”的东西对于改革开放的阻碍和影响，认识到了“左”的危害，“左”的特征，“左”的根源，认识到防止“左”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在主要防止“左”的时候，对右也不能忽视，也要时刻保持警惕，左和右都能葬送社会主义。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人们冲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本本，冲破了旧体制思维方式的束缚，冲破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保守的传统习惯，人们放开手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显身手。

1992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上一个大台阶。全国进一步向世界敞开大门，形成沿海、沿江、沿边的大开放格局，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世界再一次涌进中国，“三资”企业迅速增加，外国投资达到空前规模，中华民族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改革又推出了新举措，迈出了新步伐，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制定了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条例，开始了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的政治体制改革，全日上下对“第二次革命”进一步形成共识。

1992 年，我国的经济的发展进入快行轨道，12.8% 的速度令世界赞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全国一扫过去以阶级斗争

为纲，大搞政治运动的陈风陋习，出现了全国各族人民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建设的喜人景象，与过去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92年，我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四大，大会对过去十四年改革的伟大实践作了科学的总结，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伟大号召。十四大必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成为中国人民迈向21世纪的新起点。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巡视之后，五月份又视察首钢，十月份会见十四大代表，这三次露面和讲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指明了航向，使中国改革大潮再起，中国震惊了世界，邓小平再度成为世界风云人物，历史又一次铭记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

邓小平同志启动了中国的1992，中日的改革开放在1992出现了重大转机。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运筹帷幄，制定蓝图，中国改革开放在1992年出现了浓墨重抹、色彩斑斓的景色。历史将永远铭记中国的1992，中国的1992将永远同邓小平的名字联在一起。

1992，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邓小平，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邓小平与1992年》一书，用纪实与政论相结合的手法，以1992年中国改革大潮为背景，站在当今世界的角度，用现代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目前改革开放现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和全方位的透视，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道理和规律，评析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变化，预测中国改革的趋势和未来，这对于我国人民以清醒的头脑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更坚定的步伐迈向新世纪，走向新时代，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

## 邓小平与 1992 年

## 第一章 小平发布宣言

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黑格尔

当一个社会下了决心要做一次试验的时候，它可以说是真正地向前跃进了一大步；这就是说一个社会一定要容许它自己被说服，或是至少容许它自己受震动；而这种震动永远是来自某个个人的。

——柏格森

## 1.1 一声惊雷

1992年初，这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此时南巡，这是一个关键的行动。小平南巡讲话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是时代的最强音，响彻整个中国，使中国的改革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当代历史又一次如斧凿石般地刻上了邓小平的印记。每个理智的中国人，只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南巡壮举，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一番什么情景？

进入九十年代，全球风云多变，世界动荡不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遭挫折，已经走进低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改变了颜色。

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遭到厄运，列宁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解散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了。它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倾斜，给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前途蒙上一层阴影。人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巍然屹立吗？能够繁荣强盛吗？

就在这时，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利用时机，加紧围剿社会主义力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推行打一场既无炮声，又无硝烟的战争的策略。他们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想要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路子怎么走，中国的改革怎么搞，世界各种不同政治势力，都把眼睛盯住了中国。

中国，在搞了十年改革之后，1988年出现了经济“过热”，物价改革进展不大，通货膨胀严重，“抢购风”的狂潮蚕蚀着改革的锐势，全国不得不停下脚步，进行治理整顿。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前前后后持续了三个月，使得治理整顿进展缓慢。1990年全国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三角债困扰着全民大中型企业。1990年苏联8月事变后，再次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尖锐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往前走，还是向后退；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保卫政权、防止和平演变为中心；是继续扩大开放，还是退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人们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就在这时，有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多一个三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有人利用“毛泽东热”，搬出已被否定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左”的东西又在抬头，“左”的思潮又翻澜波，中国的脚步又徘徊在十字路口。中国的改革步履蹒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遇到了难题。许多人产生了游移心态，左顾右盼，行动迟缓。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左”的议论有增无减，实际上是在做着一种舆论准备：究竟什么理论能成为十四大的指导思想，什么议题能成为十四大的主旋律，人们心中困惑，脑中茫然。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关心中国前途、关心改革命运的中国人，都陷入苦苦地思索，未免心情忧郁。人们生活在这种沉闷和燥热的氛围之中。

沉闷，正在等待闪电雷鸣；

燥热，正在酝酿狂风暴雨。

1月18日，邓小平同志迈开巨人的步伐，离开北京，途经武昌，来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方巡视。南方巡视，发出了震撼世界的时代最强音，发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呼唤——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 改革开放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
- 稳定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小平的话，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千钧，句句中的。

这是积蓄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内在潜力的大爆发！

这是发自 12 亿中国人心底的蕴音！

这是掀起新的改革浪潮的号角！

小平南巡，是在发布宣言。他向全党全国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停滞，不能倒退，只能加快，只能一无反顾地进行到底。历史为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

小平南巡，意在“北伐”。伐什么？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伐阻碍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伐各种试图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主张。

小平南巡，旨在开好党的十四大。党的十四大，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前途，关系着改革开放的命运，他要为这次大会确定思想路线，奠定理论基础，制定思想的主旋律。

小平南巡壮举，立即在中国改革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立即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强烈的时代效应，立即使中国人民思想洞开。历史正在证明也必将证明：它为中国历史增添了崭新的一页，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迈向繁荣发展的中国，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历史人物就是在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意志印记的人物，他是伟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他首先提出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任务，并最能致力于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社会需要。伟人是伟大历史任务的发起人，他的愿望要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能把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紧迫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能把先前社会关系发展进程中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加以指明，他担负起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发起者的责任，率领人民群众，冲破社会发展中的重重阻力，阔步前进。小平同志正是这样，他最先倡导中国进行改革，进行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伟大革命，他的愿望比别人更强烈，最先为中国人民提出了进行社会变革这一历史任务；他的意志比别人更坚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他倡导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当代中国历史如斧凿石般地刻上了他的意志的印记。

小平同志不愧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他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把握时代的脉搏，通晓规律，诸熟历史，审时度势，预见未来。他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进程中，及时地唤醒人们的意识，鼓舞人们的意志，制定行动的策略，成为人们前进的旗帜。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是根据人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比我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他同毛泽东一样，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

史任务，而且描绘并规划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制定了实现这个蓝图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远大目标，而且制定具体步骤；他不但能够在一般的条件下推进了改革进程，而且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排除障碍，拨正航向，避免夭折，向自己的选定的目标前进。他一次又一次掀起改革浪潮，使改革开放成为人民的意志，人民的行动，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使中国当前的改革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趋势，成为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小平同志不愧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中华民族每当到了历史关头，都要出现一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他们急民族之所急，想民族之所想，不畏牺牲，勇于献身。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在 20 世纪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使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明天，需要更多的改天换地、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小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不顾 88 岁高龄，不辞劳顿，历时 35 天，纵横 6000 多公里，途经十多个省市，完成南巡壮举，他这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整个生命倾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倾注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

由此，小平同志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成了中国人民的灵魂，成了当代中国的化身。

## 1.2 一夜春风

小平南巡后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变化，巨大的社会生产力魔术般地呈现出来，人们霎时领悟到：中国不是非落后不可，而是我们社会的内在机制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人们犹如在闪电中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看到了中国大地蕴藏着巨大潜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无比威力。

小平南巡是一次历史的行动，他的行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小平南巡讲话是一声回荡万里河山的呼唤，把 12 亿中国人惊醒。人们听到小平南巡的消息，欣喜不已，痛快淋漓。人们得到小平讲话，兴奋激动，一睹为快。3 月 1 日，中共中央以二号文件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南巡讲话。3 月 9 日至 10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一股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人们拨开迷雾，解开疑窦，廓清方向，那种惶惑忧郁的心情一扫而光，那种正在蔓延滋长的“左”倾思潮得到了遏制。改革开放的大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都动起来了。

海南，我国这个最大的经济特区、第二大岛屿，今春以来，投资热此起彼伏，成片开发，好戏连台。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以洋浦为新起点，实行引进外资、成片开发、统一规划、综合补偿的开发方针，给全岛带来了成片开发热。截止 10 月 1 日统计，全省形成近 40 个开发区，总面积约 400 平方公里。整个开发区正朝向多类型、多元化、大型化、外向型。资金和新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随着开发区的迅速扩展，海南内外投资态势发生较大变化，中小投资热情不减，国内外大企业、大财团纷纷移师海南，投资重点由商贸开发转向工业、旅游、农业和房地产开发。前 8 个月，全省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就有 904 家，比去年同期增长 639 家，合同项目投资额达 14.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71 倍，其中外资金额 10.2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85 倍。海南，处于亚大经济格局中的中心位置，被称为“亚大地区的肚脐”，“南中国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今天正蓬勃发展，迅速崛起，朝着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的方向全速前进。

洋浦，这个海南岛上的天然深水良港，中国难得，世界少有，要开发海南，首当其冲要开发洋浦，当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首次提到开发洋浦的计划，因战乱掀起，壮志未酬。1964 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洋浦开发再次提到国事日程，因文革动乱而搁浅。1988 年，海南的同志提出将洋浦租让外商自主经营 70 年，以一个全新的模式，实现洋浦的腾飞。可惜，由于当时没有闯出姓“社”姓“资”的藩篱，那场爱国与卖国的争论延误了洋浦的开发。小平南巡的春风，给洋浦开发带来及时雨。三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准海南吸收外资开发经营洋浦地区的 30 平方公里上地，建设洋浦开发区，首期投资 25 亿港元，15 年内投资 180 亿港元，庞大的开发计划揭开序幕。大港口必将带来大工业，大工业才能带来大发展。洋浦现已建成 3000 吨级码头一个，20000 吨级集装箱和煤炭杂货码头两个，卫星通讯站已经建成，高压输电线路已经架通。60 公里长的疏港一级公路已同海南公路西干线连接，各种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正在逐步改善。这是一首唱了一个世纪的歌，这是一

个做了一个世纪的梦。正在今天改革新起的大潮中，高歌猛进，圆梦成真。

广东，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先行地区，今年提出了力争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奋斗目标。广州保税区正在兴建，蛇口港开辟集装箱环球航线，结束了大陆无国际中转港的历史。他们制定了建立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高效、开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良好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的开发战略，站在市场经济的前列，跻身于世界市场中竞争，全力拼搏，直逼亚洲“四小龙”。

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正在向商业中心迈进。92 年入春以来，全市积极稳妥地扩大股份制试点，利用外资进行房地产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市划出 5 块土地向海内外投资者出让使用权，市政府决定允许外资在城区进行商业网点的开发建设，王府井地区可兴办合资商业零售企业。通过和外商联合开发，王府井将建成亚洲和世界一流商业中心，成为北京的“银座”。证券交易中心和外汇竞价调剂市场正式开张营业。三资企业大幅度增加，仅上半年就比去年全年的总数还多，协议外商投资额比去年同期成倍增长。92 年平均每天诞生 106 家企业，特区、沿海改革开放措施，正在这里安家落户，交通、通信等投资条件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世人刮目相看。

天津，以加快发展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技术产业区为重点，抓紧建设出口加工和国际贸易为主的滨海开发·9·带、重化工为主的沿海开发带、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沿高速公路开发带、金融商贸信息等第三产业为主的市中心区、经济开发小区为支点的农村开放区域，准备经过 10 年时间，建成我国北方的金融商贸中心，技术先进的综合开发工业基地，内联“三北”、面向东南亚的现代化港口城市。

河北，制定出以渤海湾开发区和京广铁路沿线为重点，形成外贸、外经、外资企业一起上的新格局，即湾线突破，全面开放，推出加快对外开放 12 条措施。四月份公布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 11 条措施，五月份选择全省上百家规模大、技术高、效益好的国营企业，在深圳举办合作项目发布会，为增强企业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制定了“龙虎计划”，即形成 20 条龙（大型企业集团）和 50 只虎（大规模高技术、外向型骨干企业），使河北的一批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全省乡镇企业推行“三沿工程”；重点发展沿海、沿城、沿线的起点高、技术新的乡镇企业，几十片土地对外招商，燕赵大地刮起改革开放的旋风。

大寨，这个昔日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全国人民心中的“圣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迈进工农贸结合的山村，从七沟八梁一面坡走向了全国，从站在虎头山，眼望全世界，到离开虎头山，走向全世界，从传统的农民转向现代农民，自己办起了羊毛衫厂、建材厂、草编厂、经济开发公司，涌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中。

韶山，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韶山人，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工、农、商、旅游综合发展的新格局。过去受传统观念束缚，一直未突破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1978 年人均收入不到 100 元，1992 年，有 27000 多个体经营者从事工商旅游业，办旅社，办饭店、办商场，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当年毛主席回家乡看望并与其合影过的汤瑞仁今年已年近花甲，前些年她只是在家里接待来韶山的客人。回忆幸福的往事，今年，她办起了毛家饭店，当上了老板，用自己经营的饭店接待来访的客人。

现在，这个巨人诞生的地方，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再领风骚。

满洲里，北疆的“深圳”，沉寂多年的边境小镇，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我国的轻工、日用品、食品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东欧；境外的化肥、木材等产品，大量运进来，满洲里利用联接欧亚大桥的优势，大胆跻身国际经济舞台，日益显露出诱人的魅力。今年头四个月和 140 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投资上亿元。国内各省区都在这里建立“窗口单位”，举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独联体、蒙古、日本等各国贸易界人士纷至沓来，市里划定一个经济开发区和保税仓库，向国内外招商，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兴建大型中俄互市贸易区，正在发展为一座国际性商业大城。

陕西，驰名中外的古都，招商活动、经贸洽谈会接连不断，与东部沿海城市进行干部对口交流，使黄土地上刮起开放的新风。西安与香港的定期航班，与日本名古屋的旅游包机相继开通，打开了与海外的空中通道。

宁夏，中国的塞上江南，正在走向内陆，奋起逐潮。高技术开发区、吴忠民族经济发展试验区、降湖经济开发区开始起步，数十家大中型企业走向海外开办“窗口”企业，许多外国来宁兴办实业，一批三资企业安家落户，外贸出口额增加。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一组公路、铁路建成，新机场改建，正在迅速动工，在我国西部，率先实现地市县电话自动化。

青海，三月份成立了格尔木昆仑开发区，上百家工商企业来此注册。一些“三资”企业开始挂牌运营，结束了无“三资”企业的历史。新建曹家堡机场已通至北京。西安，这块内陆高原正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在同封闭沉寂的过去告别。

贵州，这个过去山坳里的夜郎国，今春以来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四月份省领导机关推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特殊政策，允许机关干部“下海”办企业，在全国属率先之列，着重进行金融改革，扩大股票、债券发行种类和规模，发展证券市场。虽然本省无“边”无“海”，但与广西签订经济技术合作阶定，在广西北海购地 2000 亩，在防城港建设两个之万吨以上码头，达到借境通商，借港出海。

云南，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要把云南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重要基地。边贸迈出新步伐，以往单纯的边民互市向大宗贸易转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由生活资料转向工业产品，贸易伙伴增加，贸易总额猛增，外国客商云集，敞开门户，同国内外市场接通。

新疆，正在形成以边境沿线开放为前沿，以铁路沿线开放为后盾，以“西线”城市开放为重点，向全区辐射的新格局，经济贸易活跃，外贸、边贸、内贸成交额与日俱增，和联合国组织合办中国西北地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东联西出。内引外进，使这块神奇的土地汇入世界经济贸易圈。

西藏，关于恢复开放传统最重要的亚东口岸，建设拉萨轻工业开发区，增开国际航空航班，扩大外贸边贸的加快改革开放方案，在北京获得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西藏西部的普兰与印度的贡吉同时开放为边境口岸，中断 30 年的亚玛荣过境贸易洽谈会在错南县恢复，成立内引外联协调委员会，在拉萨首次举行全国商品展销会，美、日、尼泊尔等国外商涌入西藏，合资建旅馆、地毯厂，喜马拉雅山畔掀起了商品经济的热潮。

这就是 1992 年的中华大地，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片土地，都是热潮翻滚，旧貌换新颜。而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省份，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都产生着一种互动效应，你动我也动，上下左右，四面八方，

一起涌动；广东提出 20 年要赶上亚洲“四小龙”，上海则发誓赶超广东，齐鲁儿女更不示弱，他们提出了豪迈的口号，“80 年代看广东，90 年代看浦东，2000 年看山东”。我国南方和沿海城市捷足先登，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整个北方也在磨拳擦掌，大干快上：廊坊吸引外资 40 亿，秦皇岛吸引外资 40 亿，要建东方夏威夷；营口吸引外资 40 亿，要建成“珍珠港”；浑春，要成为东北亚的“金三角”；绥芬河边贸额达 50 亿。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1.3 三度兴奋

小平同志 1 月南方巡视，5 月视察首钢，10 月会见十四大代表，这三次露面使全国人民三度形成兴奋中心，小平南巡是向全国发出掀起新的改革开放热潮的总动员，视察首钢则是解决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难点问题。南下北上，点面交错，使 92 年中国改革既全面铺开，又挺进纵深。会见十四大代表使全国人民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小平同志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改革开放事业的象征，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人是有激情的，民族是有精神的，人民是有意志的，国家是有胆识的。要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必须燃烧起每个中国人的激情。振奋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全体人民的意志，展现国家的宏图。1992 年，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跃上巅峰。形成燎原之势，就是因为中国人的激情被引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被感召了，中国人民的意志被焕发了，国家的生气被挥发出来了。是谁用什么力量呼唤了中国人的激情、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民的意志？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他高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旗帜，提出改革开放的宏伟目标，燃烧了中国人的创造激情，振奋了中华民族改天换地的精神，坚定了中国人民改革必胜的意志。邓小平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化身，改革开放事业的象征，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在 1992 年，全国人民的情绪曾经三度达到高潮，三度形成兴奋中心：邓小平南巡、视察首钢、会见十四大代表。

### 鹏城之春

早春一月，春暖融融，春意盎然，春满鹏城。

深圳，位于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经过 11 年的风风雨雨，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挥着窗口和排头兵的作用。

元月 19 日，邓小平光临深圳特区。当他走下火车，第一个脚步是落在红色的地毯上。红色地毯，这是深圳人民对邓小平表示的由衷尊敬，这是特区接待巨人脚步的特有方式。是啊，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深圳特区的建立，就没有深圳特区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特区的今天。深圳特区人民对小平同志怀有特殊的浓厚的感情。

“我们非常想念您！”这是小平到深圳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这句话代表了广东人民的心声。站在改革开放风口浪头的广东人民，十几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是是非非，评价不一。每当改革开放处于重要关头，都是小平同志及时指明航向，给了广东人民以莫大支持和鼓舞，广东改革开放事业与邓小平同志的关怀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话代表了深圳市人民的心愿。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深圳特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事件诞生了。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的深圳，成为全国人民响往的地方，成了世界注意的地方，深圳人民怎么能不想念特区的缔造者。

“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同志的话，表达了深圳特区盼望小平同志的迫切心情。1984年，深圳特区建立五年的时间，它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特区的功过是非，人们还有不同的议论，不同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还处在艰难的时刻，那时，是邓小平同志，在那一年的1月24日至29日视察了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肯定了深圳特区的经验。8年过去了，深圳又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又有了新的成就，深圳人民多么希望小平同志再次光临深圳视察！

特区人民想念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更时刻注视着深圳特区。8年后又来到深圳，来到了特区人民中间。他刚踏上特区这块热土，不顾旅途劳顿，立即要到深圳各处转转，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这种想看到深圳的心情，和深圳人民想看到小平同志是同样迫切的。这种迫切心情，表明了小平同志时刻牵挂着特区的命运，时刻牵挂着改革开放的命运，时刻牵挂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当人们在谈话时提起1984年他来深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时，小平同志准确无误地诵念出8年前题词的全部内容，人们在为这位88岁的老人的记忆力赞叹不已的时候，更加体会到特区建设、改革开放、人民利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小平同志一踏上深圳特区就精神焕发，满面笑容。他看到深圳整洁繁华的市容，笑了；他参观了蓬勃发展的企业，笑了；他见到了热情奔放的深圳人民，笑了；他听到深圳的建设成就，笑了。小平的笑，是对建立深圳特区的再次肯定，是对深圳特区经济的充分褒赏，是对深圳人民改革精神的高度赞扬。深圳，这座充满生机的现代化城市，巍然屹立在世界人民面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世人宣布：建立深圳特区是一个永载中国历史的英明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深圳特区伟大成就面前，任何关于特区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都已变得没有意义；任何对特区的怀疑，非论、讥难都是多余的杞人忧天；任何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面对深圳特区，小平的笑，蕴含了唯物史观的巨大力量，蕴含了历史发展趋势的巨大力量，蕴含了人心向往的巨大力量。

小平同志来到了深圳河畔，这是深圳和香港的交界处。站在这里，看看深圳，再看看香港，会使每个中国人百感交集。而我们的总设计师站在这里，更是感慨万千。他把第一个特区设计在紧靠香港的深圳，这本身就意味深长，独具匠心，今天的深圳，虽然还没有赶上香港，但它的迅速崛起，就足以证明深圳的前途敢与香港攀比高低。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1997年香港顺利归属祖国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今天，小平同志站在这里，观看对岸的香港。香港，久别的游子即将回归祖国的怀抱。小平同志从桥头来到皇岗口岸，这个口岸是深圳与香港之间的陆路口岸，有180条通道，最大流量每天可达5万辆次和5万人次。看到来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人们似乎想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诗情画景。这是历史的必然，人心所向，任何外来势力都无法阻挡！

元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就要离开深圳去珠海。这五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天。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已通过海外媒介传遍了世界，也传回到了中国内地，92年中国改革的热浪已经春潮涌动，千里冰封的北国已接到了春天的讯息。春江水暖鸭先知，深圳这只先知的鸭，已站在了92年改革大潮的潮头上，已经站在新的改革开放的起跑线上。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

田、排头兵，深圳再次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全国人民透过深圳的窗口，看到了92年改革浪潮汹涌、波澜壮阔的情景，听到了中国人民要以雄壮的步伐登上新台阶的脚步声。这五天，小平同志身在特区，纵观世界风云，畅谈国内外大事。他指点江山，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地筹划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百年大计，精辟透彻地指出中国发展自己的大好时机。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关于办特区，小平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但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特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国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先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了几次。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既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不发达地区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

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干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广东 20 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的严，我们就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 3 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你们要搞快一点！”这是小平离开深圳前留给特区人民的最后一句话，他告别了前来欢送他的省市领导，向码头走去，又突然转过头来，讲了这句话，这是对深圳的急切呼唤！也是对整个中国的急切呼唤！

举世公认，深圳建设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建筑国贸中心大厦时，深圳的建设者们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得到了“深圳速度”的美称。改革开放前，深圳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短短十几年间就变成了高楼林立、道路宽阔、闹市繁华、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从创办到 1991 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 45.4%，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65.5%，出口贸易额平均每年递增 63.7%。这样的速度，右今中外，实属罕见。用一日千里来形容，是不过分的。美国的舆论界称深圳速度为腾飞、崛起，称深圳为“一夜城”。今天，小平再次光临深圳，特区人民按捺不住大于快上的满腔热情，跃跃欲试，开始向征服新的制高点冲刺。小平临别又强调要搞快一点，更是快马加鞭，使深圳的发展乘上“特快列车”。

——利用外资产迅速增加。一至三月份，深圳共吸引外资 2.95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1%，实际利用外资 1.07 亿美元，增加 31.9%。三月份深圳引进外资项目 104 项，是 12 年来最高的一个月。到十一月底，深圳已有外资企业近 5500 家，投资总额超过 141 亿美元，双双位居全国首位。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1992 年全年工业总产值累计完成 330.77 亿元，按 1990 年不变价计算，比 1991 年同期增长 45.9%。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一至十一月份，预算内财政收入累计达 37.3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8.5%。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据对 2719 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统计，一至十月份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46%，所得税总额增长 46.2%，劳动生产率

提高 25.5%，工业增长 44.2%。

—11月24日，深圳市委制定白皮书，提出20年内赶超亚洲“四小龙”的战略目标：紧紧瞄准新加坡和香港，并吸取台湾、韩国的成功经验，争取用20年时间并力争提前，总体经济实力接近和赶上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四小龙”平均水平，接近或赶上香港和新加坡；科技水平超过新加坡和韩国，城市基础建设和城市管理基本接近新加坡和香港的水平，达到现代化大都市的标准。建成亚大地区新兴的金融、贸易、运输、信息、旅游、高科技开发等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在现代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超过“四小龙”，把深圳建设成为人类创造所的一切文明成果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文明地区。

——深圳，巍然屹立在太平洋岸边，正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 珠海之行

1月23日，上午9时40分，小平乘坐的轮船从蛇口驶向珠海。

这是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珠海特区，那是1984年1月26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也是从蛇口来到珠海。8年过去了。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见到邓小平同志，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盼您盼了很久啦！珠海人民盼您盼了很久啦！”

小平同志微笑着说：“我也希望来看看”。

在海关的快艇上，邓小平与谢非、梁广大、市委副书记纪黄挣亲切交谈。当谢非谈到广东要力争在下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时，小平同志强调指出：

“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现在有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快艇要到九洲港时，邓小平站了起来，一边望着窗外，一边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它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在珠海，小平同志主要视察了高科技领域，特别关注中、青年科技人员。

1月24日上午9时40分，小平同志来到了珠海经济特区的生化制药厂。这是一家仅有80多人的小厂。1991年，这个厂产值达3000多万元，人均创利税几万元。小平同志在一片掌声中走下中巴，厂里的干部职工热烈欢迎邓

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频频向大家招手。

制药厂总工程师迟斌元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们全厂职工盼着您来呵！这是我们全厂职工的幸福。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能到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小平同志微笑着摆摆手说：“过奖了。”

迟斌元汇报了厂里的情况，小平同志观赏了拳头产品“凝血酶”。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家欺负的局面。

在一个车间门口，小平同志隔着玻璃墙，向里面起立鼓掌的科技人员亲切招手。他说，在科技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这10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10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办法。

在一座楼梯的转弯处，邓小平看到一幅标语：“不求虚名，只求实干”，便停下脚步，轻声念了一遍，赞许说：“对，就是要实干！”

1月25日，上午9时35分，小平同志来到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等候在公司门口的许多青年科技工作者热情地迎接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十分高兴地对他们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年轻人呵！”

在公司大厅里，小平同志在一张长桌前听公司总经理游景玉汇报工作，当汇报到该公司走的是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邓小平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

游景玉回答：“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就是要靠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计算机房里，游景玉向邓小平汇报说：“我们公司投产第一年，人均产值达20多万元”。

邓小平说，更重要的是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学技术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的更快。

游景玉告诉邓小平，这个公司105人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邓小平看了机房的技术设备和工作条件，不无感慨地对科技人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50年代好多了，大家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项目搞起来了。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你们的要求更高了。

在一台计算机旁，邓小平停下脚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年轻人交谈起来。他握着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当然，老科学家是很重要的。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中国要爱哟！中国要发达，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全国各行各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

这一番话，体现了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科学技术的一贯思想和主张。

小平同志走出计算机房，他高兴地连声说，“好东西，好东西！”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回到大厅，小平同志与科技工作者们合影留念，对大家一再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在返回途中，小平同志对随行人员说，我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一百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差不多就有100人，学历比那时高得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梁广大说：“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3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

小平点点头。

于是，三月份，一条新闻震动全国：珠海市率先在全国重奖科技人员，特等奖三名，各得奥迪小汽车一辆，三室一厅住房一套。这样重奖，今后每年一次。珠海出现了“科技富翁”。

从亚仿公司出来，小平同志来到高29层的芳园大厦，这是和澳门相邻的拱北区的最高建筑。坐在旋转餐厅，小平俯瞰拱北秀丽风光，远眺澳门宜人的景色，倾听着谢非等人的汇报。

谢非说，您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Ⅰ线，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但这有个过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十多年的建设使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

邓小平说，这10年真干了不少事，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会全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睡觉好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很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梁广大说，改革开放前，珠海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创办特区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逐步过上了富裕日子，不少外流的珠海人陆续回来了。

邓小平非常赞赏地说：“这好嘛！”

11点35分，小平走进下楼的电梯。

芳园大厦门前，数千名闻讯而来的群众围拢过来。他们群情激奋，兴高采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小平同志，您好！”向小平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小平同志神采奕奕，步履稳健，在大家面前走过，挥动双手，向周围的人群致意。

离开了芳园大厦，小平一行前往珠海渡假村。路上，他看到一幢幢漂亮的住房，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多少？”

谢非回答：“去年全省人均收入 1100 多元。”

小平说，我看不止这个数。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洋房，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这时，话题自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邓小平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 1984 年至 1988 年。这 5 年中，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89 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 5 年的加速发展？那 5 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 5 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 5 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 3 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处理，尔后继续前进。

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15 分，小平一行来到了内联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副经理丁钦元汇报了公司发展情况。这个公司建于 1984 年 7 月，是在旧仓库、旧石房中开张的。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江海公司全部收回了当年的 500 万元投资，还向国家上缴了 2900 多万元的税利，并积累了 2000 多万元的资产。现公司的生产设备 99% 是国产的，而自己生产开发的录音机机芯 88% 出口海外。1991 年，为国家创汇 2600 万美元。江海公司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自觉、自立、自强的企业精神，发展了企业，培养、造就了一支高水平的职工队伍。

小平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带头鼓掌，对了钦元说，你讲的很好，特别是不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你们做的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感谢你们和全体职工。

丁钦元说，我们是按照您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的。

邓小平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

他回头对梁广大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小平的话，再一次充分地肯定了经济特区的方向和建设成就，使特区人民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风雨如盘，坚不可摧。

小平一行来到厂区，看到厂区汇集着许多青年职工。

小平对丁钦元说：“这么多年轻人，我很高兴和年轻人在一起。”

他来到青年职工面前，亲切地对大家说：“拉拉手吧，拉拉手。”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邓小平对梁广大说，这个厂总的方向是正确的，方法也对。看得出来，他们是从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要发掘人才，你们做得对，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 365 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

1月29日上午，小平身着中山装，在广东省委领导的陪同下，接见了珠海市五套领导班子成员和佛山、中山两市负责人。邓小平同大家亲切握手，依依话别，合影留念。

下午2时40分，小平离开了珠海去顺德县考察。

小平同志结束了对珠海和广东的视察。人们目送小平离去的车影，久久仁足，不肯离去，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耳际响起了这位总设计师的声音：

广东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要稳定，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广东要起好作用！

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改革要有不同前10年的新办法，新措施，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同紧迫感对立起来。

小平的话，传遍珠海，传遍广东，传遍中国，立刻变成了推动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强大动力，变成改天换地、重整山河的现实力量。

## 上海之光

小平离开广东，来到上海，这是南巡壮举的最后一站。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最悠久的城市，饱经苍桑，历尽磨难，记载着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外国列强铁蹄的蹂躏，曾使它满目疮痍。新航路开辟，国际商务的涌进，使它首先汇入世界文明，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领先地位。它古老而又年轻，在改革大潮中起伏升降。它的盛衰荣辱，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称上海是中国的龙头，全国人民关注它，党和国家领导关注它，改革开往的总设计师更关注它。

邓小平，对上海一往情深，他在驾驶中国改革开放航程时，总是善于抓住这个龙头，带动全国这个龙身。从1988年至1992年，连续五个春节，他都是同上海人民一起度过的。

2月4日，小平结束了广东的巡视，又来到上海，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共度除夕之夜。当他健步来到会议大厅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迎上前去代表1300万上海人民向小平拜年，祝他健康长寿。小平满面春风，微笑着向大家致意，向上海人民问好。在欢乐的气氛中，邓小平与大家亲切握手，互贺新禧，合影留念。全国人民从电视屏幕上，见到了这一情景，见到了小平同志，给欢度佳节的各族人民增添了喜庆气氛。这是1992年全国人民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邓小平同志，从而使全国人民验证了关于邓小平同志南巡的传说。

从1月底到2月21日，小平在上海期间同上海市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重要谈话。

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

年。

小平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开诚布公地指出，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小平同志谈到这里不免带有一种遗憾的心情，但他同时又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幅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他又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 1 年就有很大的变化，3 年会有更大的变化。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于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小平的话，给上海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鼓舞，这种力量，足以能够弥补总设计师的“失误”，补偿小平同志的遗憾，实现上海的后来居上。

风雷动，旌旗奋，起宏图。新春伊始，上海人民就站到了新的起跑线上，改革开放出现了万马奔腾的景象：

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制定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以浦东特区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

3 月 10 日，国务院给浦东新增 5 项优惠政策，浦东开发区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全国掀起了浦东投资热潮，中央各部委、兄弟省市以及上海大工业的“集团军”纷纷来到浦东。

4 月 22 日，航空航天部决定用 3 年时间在在外高桥保税区建成航空航天外贸基地，在川河五桥形成航空航天高技术工业区，并着手在陆家嘴筹建“中国宇航大厦”。

5 月 28 日，由我国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 60 多所著名高校集资 7000 万元组建的中国高科集团公司，宣布在浦东成立。这个公司要在浦东兴建 30 层高的高科大厦，作为高校科技的窗口和吸引归国留学生参与浦东开发的窗口。

6 月 2 日，上海轻工业局宣布，今后 4 年在浦东投资 90 亿元，建设一批高科技、高效益、面向世界的现代化企业，形成上海高档轻工业产品的最新生产能力。

7 月 18 日，外经部和上海市政府宣布，将在浦东建造亚洲第一高度的 88 层经贸大厦，占地面积 2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投资逾 10 亿元。大厦建成后，中央各部门和国内各省市的外贸公司将在这开设分公司，以体现浦东的龙头作用。

到八月末，浦东新区共有内联企业 691 家，总投资 35.69 亿元，外地直接投资 25.23 亿元，其中今年新建立的内联企业 529 家，总投资 34.03 亿元，外地资金 29.59 亿元。

在浦东“内资热”不断升温的同时，外资的潮水也源源不断地涌来。从五月份开始，浦东平均每天诞生 3 家合资企业。到九月份，浦东新区三资企业已突破 400 家大关，吸收投资达 20 多亿美元。

为了浦东尽快实现腾飞，后来居上，浦东外部环境建设正在迅速发展。

6 月 24 日至 27 日，江泽民和李鹏分别在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提出，要集中力量先搞好浦东开发，分层次推进长江沿江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

此后，上海立即作出关于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省市参与浦东开发可获8个优先的决定。

7月14日，上海有关部门宣布，全长67公里，关系到浦东开发全局的重点工程——浦东铁路建设，这个原计划于2000年后立项的工程，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准备在“八五”期末通车。

整个浦东开发的远景规划也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到2000年，浦东新区新开发的土地将达到60多平方公里，城市化面积百余平方公里，四个开发小区同时建成，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亿元，年均递增23.6%，人口将达到180万。与此同时，全区要建立全国最完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全国最大的商务活动中心，全国最先进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加工基地，全国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区，全国最现代化的城郊型农业，全国配套服务最好的高质量生活区。

根据统计资料，今年浦东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均呈增长态势，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高于整个上海水平，一至七月份，完成国民生产总值49.2亿元，比全市同期增长速度高7.4个百分点。

浦东，正在高速发展，全速发展，加速发展。

年初，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关于浦东开发能够后来居上的预测，已经被、正在被、最终被浦东建设的速度所证实。人们可能还在争议，浦东是称为“新区”、“开发区”，还是称为“新上海”，“东上海”，或者称为“社会主义香港”，但是，有一点却无可争议：浦东，必将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的东海岸崛起。

## 视察首钢

五月，北京西郊，鲜花盛开，一片葱绿。

在群山环抱的石景山区，座落着我国特大现代化企业——首都钢铁总公司。

首钢，这面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改革旗帜，十几年来，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命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1979年，首钢被批准为国家首批改革试点单位。当时，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同志在全公司干部大会上说：“在国家改革的棋盘上，首钢要做一个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3年过去了。这些年，首钢人一直以“过河卒子”为光荣使命，百拆不回，只进不退，在搞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方面，逐步走上了“公有所本，承包为本，人民为本”的首钢之路。

首钢之路，是解放生产力之路。1991年，首钢的钢材产量达到431万吨，为1978年的3.66倍，平均年递增10.5%，比同期全国重点钢铁企业钢材产量年均递增率高7.2个百分点。

首钢之路，是提高效益之路。1991年，实现利税总额29.26亿元，为1978年的7.76倍，年均递增17.07%，比同期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实现利税平均年递增率高10个百分点。

首钢之路，是为国家多做贡献之路。1991年，上缴18.15亿元，为1978年的4.9倍，年均递增13%，比全国重点企业大约高8个百分点。1979年至1991年共上缴国家利、税、费116.45亿元，为承包前30年上缴总额36.29亿元的3.2倍，为1978年首钢固定资产原值的6.9倍，12年为国家赚回近

七个首钢。

首钢之路，是实现国有资产高增值之路。1979至1991年，首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1亿元，国家投资仅占4.3亿元，新增国家固定资产42亿元，为1978年首钢国有资产原值的2.49倍。

首钢之路，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路。1991年，首钢职工人均月收324元，为1978年的5.26倍，年均递增13.6%。

首钢之路，是技术上等级之路。目前，净产值劳动生产率已入世界一流水平，有7项技术经济指标居世界领先地位。

首钢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全国公认，举世瞩目。然而，首钢成就的取得，并非一帆风顺。首钢走过来的道路，并非平坦笔直。十几年来，首钢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很大阻力；每登上一个台阶，都历尽艰难困苦；每出台新的改革措施，都伴随一场风波。毁誉交加，荣辱参半。是邓小平同志，最了解改革第一线同志的心情，每当关键时刻，他都给予巨大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使首钢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迎风斗浪，勇往直前。因此，首钢工作者对邓小平同志倍感亲切，倍加思念。小平南巡之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首钢也如一炉钢水，出现了热火朝天随喜人景象。与此同时，大家感到，小平南巡讲话，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提出了高瞻远瞩的部署，而对搞活全民大中企业问题没有过多地详细地论述，这一问题恰恰是当前改革开放急需解决的难点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首钢工作者最关切的问题。在他们今天要大踏步迈向新台阶的时候，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新的问题。这就更增加了首钢工作者对邓小平同志的思念之情。

5月22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夫人卓琳及女儿邓楠、邓榕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北京西郊，来到风景秀丽的石景山，视察我国的明星企业——首都钢铁总公司。

了却一桩心愿上午8时20分，小平同志乘坐的汽车徐徐驶进首钢总公司的东大门，然后停在月季园。在这里等候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同志，首钢党委书记、工厂委员会主任周冠五同志、首钢工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赵长白同志、首钢总公司总经理罗冰生同志，一同走上前去，向小平同志致意。

“我早就想来”，小平的话表达了总设计师对首钢的巨大关怀。

“首钢职工早就盼望着您来了！”周冠五的话表达了20万首钢职工对小平同志的崇敬之情。

小平同志和周冠五同志紧紧握手。两只手合在一起，凝结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改革者心心相印，紧紧相联的深厚情谊。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小平同志参观了月季园的各种花卉。小平同志连声称赞这里的花比他家里的还好。周冠五随口应道，那我派几个人给你改造一下。小平同志马上摆摆手说，不用了，你还是专心致志管理企业，把钢铁抓好吧。

接着，小平同志说，首钢我一直想来，可是以前太忙了，这次来就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

小平幽默风趣的谈话，使周围的气氛变得十分热烈、活跃。这时，小平同志的目光停留在一座银白的高大厂房处，周冠五同志指青厂房介绍说：那

是从比利时拆回建立起来的第一炼钢厂，现在已经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小平同志点头称赞：这是条捷径，水平也并不低。周冠五同志说，当时这是您批的。小平同志说，主要是大家干的。

### 换脑筋

随后，小平同志步入月季园迎宾厅，在会议桌旁落座，听取周冠五同志关于首钢改革发展情况的汇报。周冠五对小平同志讲：1960年您上这儿来过。小平同志说：那个时候的主要企业差不多我都看过，你们和那个时候的面貌完全不一样了。周冠五简要地概述了首钢改革后发生的变化：首钢1978年开始改革，当时年产钢只有170多万吨，在国内八大钢中排名最后，这几年发展特别快，现在钢产量已排到老二。小平同志点头说：我赞成你们。小平伸手指指自己的头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个脑筋就行了，脑筋不换哪，怎么也推不动。同样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可干起事来，慢慢腾腾，看不见新的气象。想的面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就更好了。

换脑筋，仅三个字，朴实无华，言简意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触及了阻碍改革的深层原因，指出了推动改革的原动力。

### 首钢的路子走对了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高度地称赞了首钢的改革经验，肯定了首钢十几年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他意味深长地讲：路啊，历来是明摆在那里的，是走得快，还是走得慢；是走得好，还是走得坏，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讲到这时，小平对周冠五说：你们两条都对”。

十几年来，首钢在改革的道路上风雨如磐，艰难跋涉，虽然取得了令人不可否认的成就，但社会上对首钢的经验仍然持有各种争议，首钢在改革的大潮中仍然处于漩涡挺进之中。小平同志来到首钢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首钢改革经验的充分肯定，现在他又在谈话中高度赞成首钢的改革之路，这是把首钢做为中国改革和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方向和样板。

### 学首钢经验要放下架子

小平同志说，现在都在说改革、改革，什么叫改革？怎么改呀？改了以后又怎么走啊？可以走得快，也可以走得慢，可能走得好，也可能走得坏，同样的条件，结果不一样啊，还是要看人的因素噢，明摆着是首钢这么好的经验，究竟有多少家在真正地学习啊？学，就要放下架子。

当周冠五同志汇报到首钢实行跨国经营的做法时，谈到了首钢与美钢合作开发转炉自动化，小平当即予以高度赞扬，他说：“美国人利用你们这个优势，中国人自己不会利用，这是落后现象。”

当听到北京市有一个学习首钢的决定时，小平同志说，学习售“钢”这个决定带点“资”味是吧？不要紧，现在就是要给我带点“资”味，我也高兴。

### 现在就是要解决把大中型企业搞活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问：为什么鞍钢的发展比你们慢一些？周冠五说：“路子没给他们放开。”小平同志点头道：这是上边的责任。我往南方跑了跑，讲了一些放炮的话，也就是这个道理。我听到的呼声就是把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走啊？说到这里，小平同志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现在就是要解决把大中型企业搞活这个问题呀，要全面动起来才行啊。

## 两个原则与“两放”方针

小平同志的话题紧紧围绕着搞活企业，他说：改革开放进行好的、发展快的企业，在两三年之后就能发挥重要作用，在上缴利税、外汇收入、技术水平等方面，都能够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相反，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多交点给国家，管财政的就会少说话了。我不赞成。要求发展好的企业交得太苦了，会打击积极性，不好。老人家又一次加重语气说：什么时候都要以不伤害发展事业的积极性为原则，以不减少职工收入为原则。

小平同志握起拳，举了拳说：首钢交的利税是不少的。有这么些拳头企业、行业，就能够稳住中央的财政，上交的利税就会更多一点。就是要放开，对中央没有损失，上交不会少，搞成功了只会增加嘛。只能走这个路。他强调说：不能走卡紧的路，只能走放松的路，放水养鱼好。

## 主要的毛病在上层建筑的机制

周冠五同志在汇报时说：现在大多数企业 90% 的钱都上交了，机动财力太少，立项也比较难。小平同志马上说：真正的毛病就在这里，或者说主要的毛病在这里，就是上层建筑的这个机制、结构的改革问题。要真正给企业权力。我听到同志们反映的主要是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又说：你不搞活，社会主义的优势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允许改革？这是人的问题，人的思想没解放啊，还有抵触。过去就说姓“社”姓“资”，现在又说别的，反正还有一些人是在看，看你改革开放对不对。当听到上面的一些部、门不肯下放权力时，小平同志对周冠五说：“你们叫啊！”

## 没有点雄心壮志上不去

小平同志还讲到：没有点雄心壮志上不去。经济发展快了，可能会出些乱子的，出了乱子会有人叫好，但是不管他叫不叫，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赞成改革的人，赞成发展的人要挺住。他对周冠五说：你们就挺住了，挺得好。他右手挥了挥说：胆子要放大一些，包括这个顶。为什么就有人顶得住，比如你们就顶住了，首钢就顶住了。顶有顶的方法，顶不得力，方法不对头，没有用处。

小平同志还特别讲到发展速度问题，他说：什么叫慢？实际上慢就是停顿，停顿就是后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 6% 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我们发展速度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不能一样。他们 2%、3% 就不错，我们 6% 并不一定是好速度。因为起点不同，原来的水准不一样，综合力量不一样。我们有

些同志满足于 6%，满足 6%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艰难了。

### 要使大中型企业不要有自卑感

小平同志在听完第二炼钢厂情况介绍后说：要使大中企业不要有自卑感，可以自己干，这是一个机会，扬眉吐气的机会。为什么别人能干出来，我们自己干不出来？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干。要虚心接受先进企业的经验，请人当老师，前苏联的人首钢都可以请来用嘛，为什么还不快点请自己人，请首钢的，请宝钢的，还有别的嘛！哪一行都有先进的东西，要虚心地搞，这是个机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不要抬不起头来，完全可以搞，科技没有国界，只要对我们有利。最后，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 要靠自己的力量把钢铁搞上去

在谈到我国钢铁事业的发展时，小平同志说：日本人有过计算，他们一个企业界大老板跟我谈，中国对钢的需求的饱和点大概是一亿一到一亿二千万吨，可以保证国内建设的需要，要搞到一亿吨钢出头，为什么不干呢？没有理由不干。我们现在是 7000 万吨产量，就是说还差 4000 万吨。他问，进口钢材每年花多少钱？当听说进口 1000 万吨钢材要花 40 亿美元时，小平同志马上说，每年进口三千万吨，就是 120 亿美元，我们可以用这个钱自己干。有了我们现在钢铁企业的这个基础，自己动手搞，会省得多。

周冠五向小平同志汇报了首钢要在山东济宁地区建一个年产 500 万吨到 1000 万吨级大钢厂的设想。小平同志点头赞同。接着，小平同志又了解了首钢向海外出口产品的情况。听说首钢的机电产品及钢标出口几十个国家，老人家欣慰他说：出口大幅度增长，这个非常好。国际市场你能站得住，能够发展，无论穷国、富国，我们都有市场，这就可以放心了。老人家扳着手指说：没有通货膨胀危险，没有还不起债的危险，还怕什么？应该胆子大起来嘛！

小平听完周冠五同志汇报之后，参观了首钢刚竣工投产的四高炉、第二炼钢厂、机械厂重型车间。小平来到哪里，哪里一片欢腾。看到小平同志，首钢职工心情激动，奔走相告，举着鲜花，举着标语牌，向小平表达敬意。小平同志向周围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和身旁的工人——握手。整个厂区沸腾了，首钢职工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10 时 20 分，小平同志一行离开了首钢。

小平同志视察首钢的消息，像春风吹青，迅速传遍了整个首钢系统，在车间、在班组、在机关、在矿山、在建筑工地，……，人们讨论着，传颂着，顿时化成改革、大干快上的冲天干劲。

小平视察南方后，首钢工作者就已经瞄准了新的奋斗目标。全体职工分期分批脱产三夫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广大职工普遍反映“名正了”，“解放了”，“心情舒畅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了”。这次，小平同志又亲临首钢，更是对广大职工的莫大鼓舞，更激发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要把这个举世闻名的企业办得更好。他们开始描绘首钢未来的新蓝图：

——1994年，首钢北京地区钢产量达到1000万吨，成为我国第一家千万吨级的钢铁企业；

——1995年，首钢销售额达到720亿元（40亿美元）以上，使首钢成为大型的国际性的跨国公司，进入世界500家大企业行列；

——要把厂区建成最清洁、最优美、厂景结合的大公园；

——要在山东建设一个500万吨以上的钢铁厂；

——要在2000年使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进入世界十大钢铁企业；

——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在机电制造，电子、矿业、航运等方面，都要形成更大的生产规模。

小平视察首钢后，首钢发生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6月4日，朱镕基副总理来首钢现场办公，落实首钢扩大自主权问题；

——7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批准了“关于进一步扩大首钢自主权改革试点的报告”；

——7月23日，国务院以国发[1992]40号文件正式颁发，明确首钢拥有投资立项权、外贸自主权、资金融通权；——8月，我国最大热连轧机机架在首钢自行设计铸造成功；

——9月，首钢在全公司范围内掀起学技术、学文化、学业务的大学习热潮，以推动首钢腾飞，促进钢铁行业上新台阶，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

—10月17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办的银行——华夏银行；

—10月23日，同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联合收购了香港东荣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月30日，以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加州钢厂的全部产权；

—11月5日，在国际招标拍卖中获胜，以1.2亿美元购买了年产矿石1500万吨的秘鲁铁矿公司；

—10月13日上午，采访十四大的50多家、120多名港澳台和外国记者来首钢采访，首钢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中外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11月12日，首钢自行设计制造、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八流量坯连铸机热试成功，标志首钢在连铸机的设计制造方面跻身于世界前列，具有制造和建设500万吨以上大型钢铁厂联合企业的力量；——12月4日，国务院批准齐鲁大厂建设立项，全首钢十余万人报名申请上齐鲁；

——年终岁末，首钢各项生产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同去年相比精矿粉产量增长15.24%，生铁产量增长13.04%，钢产量增长15.7%，钢材产量增长7.66%，销售收入增长37.85%，实现利润增长35.59%，出口创汇增长66.6%。此外，首钢在机械制造、电子行业、航运业、重点工程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全面丰收。全公司职工的福利待遇又有进一步改善，月平均收入比去年增加38元，宿舍竣工15万平方米。

首钢，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她正站在改革的潮头上，披涛斩浪，拼搏进击。

小平同志南巡之后视察首钢，其意义非同寻常。首钢作为我国全民大型企业改革的试点单位，它的每一项改革都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力探索。所以，十几年来，我国的改革每前进一步，每掀起一次新的热潮，都要引发一场关于首钢经验的议论。这种“首钢现象”成了我国改革过程中社会

问题的集中反映。搞活大中型企业问题恰恰是改革的最大难点，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有人认为，在中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是我国改革深度与广度进展的重要标志。这样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小平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由此可见，小平同志南巡之后视察首钢，是小平同志加快我国改革开放整体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是我国开放的前沿阵地，那么，首钢则是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如果说，小平南巡，向全国发出了掀起新的改革开放热潮的总动员，解决了一个“面”的问题，那么，小平视察首钢则要推动搞活大企业，解决一个“点”的问题。这样，小平同志南下北上，点面结合，纵横交错，使我国的改革在 1992 年既全面铺开，又挺进纵深，出现了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波澜壮阔、气势非凡的全新景象。

## 会见十四大代表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

首都北京，是全国的心脏。

在这个月召开的十四大，要总结 14 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要确立今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事关重大，举世注目。

自 1977 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到 1992 年，我党召开了五届党代会，每一届都对我党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都与邓小平同志的正确主张紧密相关。在 1977 年的十一大上，邓小平同志只作了简短的发言，提出中国需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九个月后，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定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1982 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使改革开放在全国全面展开。1987 年召开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系统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简练明确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样，就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引向深入、全面、持久的发展阶段。这一次，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空前发展之际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事实已经表明，这次代表大会，为我们党，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建立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这座历史里程碑的奠基者和铸造者，无疑，首推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在十四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首先肯定了邓小平同志对开好这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十四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从十四大报告的字里行间，从十四大会议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视察首钢的重要谈话，为这次大会所强调的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定下了主旋律，大会接受了邓小平同志 1992 年提出的思想。

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十四大报告则在

第一部分，集中阐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的集中体现，阐述了为什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怎么样才能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并且，修改了党章，把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纲。

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作出划时代的回答，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关于发展速度的讲话，有助于党的十四大报告对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作出重要修改：“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是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8%到9%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在视察首钢时提出要换脑筋，十四大报告则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新思想。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和首钢时反复强调，中国的事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一定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四化”方针，把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正是按照小平同志这个思想，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选进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189名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6.3岁，大专以上学历占80%，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只有49岁。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和首钢视察时，首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机构的改革问题，十四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简机构，并按照邓小平等老前辈革命家的建议，不再设立中顾委。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成了十四大的灵魂。人们很自然地非常关注邓小平同志。开幕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数百名记者带着全世界的关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是否出席本次大会？”这是十四大的第一新闻，邓小平出席大会是新闻，不出席也是新闻。当记者没有得到是与否的答案时，不得不反复提出这个问题，逼得新闻发言人不得不五次重复提问者不愿意听到的回答：邓小平作为十四大特邀代表，接受了邀请。

12日上午9时，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十四大开幕电视转播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搜索邓小平的身影。

然而，开幕式上，没有见到邓小平；会议期间，也没有见到邓小平；闭幕式上，还没有见到邓小平。

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不甘心，虽然都没有说出来，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感觉，似乎十四大还没有结束。

其实，邓小平同志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十四大。十四大报告第四稿出来时，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仔细审阅，又用两个半天时间对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他从总体上对报告稿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报告有份量，是一大革命。同时，他特地提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有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要写得合乎实际。

十四大开幕那天，邓小平坐在家中电视机前，认真听了江泽民同志宣读的报告。结束时，小平满意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说着就在电视机前鼓了掌。十四大召开这7天时间里，邓小平每天翻阅卜儿份报纸，仔细了解大会进程。19日上午，当他看到十四大胜利闭幕，选出新的

领导机构时，无限欣慰地说：“真是群情振奋”。

可见邓小平同志和十四大代表、全国人民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十四大。他非常了解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他侧乎不会让大会代表失望，不会让全国人民留下遗憾。

19日下午，十四大代表接到通知，全体代表去人民大会堂。这无疑给代表们带来了一丝新希望。

十四大，对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概括，并将这个理论确定为党的基本理论，把按照这一理论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明确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邓小平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坚持，最好的发展，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四大的共识。邓小平，是十四大的瞩目中心，全体代表急切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见到他，这不是一般的人之常情，而是处在伟大历史变革时朗，全国人民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爱戴和尊敬的集中个怀。

代表们的情绪在酝酿着，激荡着，很难想象，一旦大家的希望落空，心情将会变得怎样。

下午3时许，等候在北京厅的七名新常委和杨尚昆、万里等走出北京厅，站在电梯口前。

电梯上方的数码亮了。

当数码亮到2的时候，电梯门开了。

满面红光的邓小平同志，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微笑着同江泽民等同志握手问候，尔后在北京厅门口合影。

邓小平来到宴会厅。

耀眼的水银灯把大厅照得通明，2000名代表的掌声像海啸一样，在大厅中回响。

小平同志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走到代表的面前。他边走边向代表频频招手致意，时而停下脚步，同代表亲切握手。代表们的掌声此起彼伏。

“小平同志您好！”

“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

这些发自肺腑的声音，表达了全体代表的心声，道出了全国人民的深深祝愿。

小平同志走到代表中间位置坐下，同大家合影留念，大厅刹时异常安静。摄影机留下了2000名代表和小平同志的历史性合影。

小平同志精神矍铄，在江泽民等同志的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当小平快要离开大厅时，又回过头来朝代表们频频招手。2000双眼睛饱含深情地目送着小平同志离去。

七名常委为小平送别，就在即将跨进电梯的一刻，小平转过身来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江泽民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您今天同大家见面，使代表们深受鼓舞，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并代表新当选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现在大政方针已定，我们要真抓实干。”

邓小平认真地听完话后，满意地点点头，这才登上电梯，挥手同大家道别。

小平同志离开后，人们仍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

在时间的长河中，刚才发生的一切，虽然是暂短的一瞬间，却也是永恒的一瞬间，是历史性的一瞬间。小平会见十四大代表，必定是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世界在这一时刻的头号新闻。

邓小平同志 1 月视察南方，5 月视察首钢，10 月会见十四大代表，使全国人民形成三度兴奋，使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重新掀起，使 1992 年成为中国改革年。

1992 年，是中国历史上一篇可以大写特写的文章，不管今后谁来写，谁来研究这段历史，谁来做这一篇文章，都少不了这样几个关键词：

1992 年中国改革邓小平

## 1.4 当惊世界殊

小平同志推动了改革，改革大潮搅动了中国，中国震动了世界。小平同志再一次成为世界风云人物，

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地方。中国这一东方睡狮正在醒来，睡狮醒来时，当惊世界殊。中国在升值，中国在崛起，中国正在改变她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199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篇大文章，不管哪位历史学家来写这段历史，都少不了这几个关键词：

1992年 中国 改革 邓小平

信息化的社会，把人类生活的空间大大缩小，地球成为一个村庄，世界联成一个整体。

在这样一个整体中，任何一个国度发生的重大事情，都会立即传遍全球，而全球各地发生的事情也会立即涌进每一个国家。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同整个世界紧紧相联。

1992年中国发生的变化，立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成了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上的一个热点。

小平南巡壮举，立即形成一股巨大冲击波，波及港澳台，波及东南亚，波及全世界。

从1月20日起，与深圳隔河相望的香港，每天都在迅速地报道邓小平在对岸的言谈行止，他们极其敏锐地觉察到：“邓公此番有大动作”，“邓小平南巡，中国改革将起新高潮”。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几乎每天都发表有关邓小平南巡的报道和评论，热情洋溢地报道邓小平南巡的详细情节，评论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阐述邓小平南巡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春节刚过，《深圳特区报》根据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异乎寻常地推出猴年新春八评。首篇《扭住中心不放》发表后，香港《文汇报》立即在头版头条转载，香港其他各大新闻媒介也都发表消息，介绍八评要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认为中国将要有令人瞩目的举动。英国BBC广播电台，日本共同社来电，索要八评原文。

接着，《深圳商报》围绕邓小平关于深圳的主要经验是敢闯的论点，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八论敢闯”的评论，当一论敢闯《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发表后，香港电台、报纸立即把焦距瞄准了《深圳商报》，连续播发了评论的全文。海外报刊都在显要位置刊登邓小平南巡的社论，与总统、首相竞选的消息争夺版面。仅只这“八评”和“八论”，香港就转载百次之多，这不亚于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作了不花钱的广告，调动了全世界的新闻媒介，撞响了类似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的新闻冲击。

小平南巡，使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好，港台股市立即“牛气冲天”，出现了“中国概念股”的新词汇。2月27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劲升100点，成交额激增37.7亿多港元，成为有史以来第八大成交纪录。3月初，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冲破5000点大关，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时，深圳股市也红红火火空前活跃，出现了全国炒深圳的势头。而世界各国正在出现中国投资热，

港澳台大批资金源源向中国涌来，各国大财团纷纷来中国投资、办厂、办公、办企业，珠江三角洲、海南、上海、大连、青岛，成了世界投资热点，大有整个世界炒中国之势。

小平南巡使中国掀起改革大潮，并波及了整个世界，外界称为邓旋风，使邓小平同志再次成为世界级热门人物，引起世界政治界、舆论界的关注。邓小平视察南方、视察首钢。会见十四大代表，都成为世界新闻舆论的中心。英国《金融时报》认为，邓小平在 92 年使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加快，出现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热潮，使中国改革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推选邓小平为 1992 年世界风云人物。

小平推动中国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小平在南方和首钢视察的讲话还没有正式传达和发表的时候，人们争先传阅，出现了大量的手抄稿。邓小平讲话公开发表后，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消化理解，召开各种邓小平理论讨论会，出版了各种邓小平思想研究专著，小平同志诞辰到来之际，许多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给小平写信，表达对小平的衷心祝愿。十四大期间，深圳和北京街头上出现了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四川 170 多名代表给小平同志送去贺卡，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片心意。此间，我国著名肖像画家李琦教授精心创作了反映邓小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肖像画，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崇敬心情。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小平爱戴之情的种种表达，都非常自然，没有个人迷信的痕迹，没有盲目崇拜的色彩，人们把对伟人的敬仰同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对中国前途的关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把伟大领袖亲切地称为小平同志，我们的总设计师，使得他和人民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这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造神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醒悟，走向成熟，实现自我超越。

邓小平推动了改革，改革大潮搅动了中国，中国震动了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9 月 21 日刊登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引人注目》。文章指出，今年中国再次引人注目。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照今年这样保持下去，中国的经济不超过 20 年就能赶上美国。

正在经历痛苦磨难的俄罗斯人更是翘首中国。《俄罗斯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正在打开所有的大门》，认为中国的经验是丰富的，在俄罗斯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考虑中国的经验是不可饶恕的。有些群众在集会上呼吁向中国学习，有的政治家提出要走中国道路。

香港《明报》认为，只要中国继续目前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终将成为经济大国。珠江三角洲一带成为亚洲第五小龙不难，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大龙也同样大有希望。

《世界论坛报》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已驱除了世界对中共改革政策摇摆不定的疑虑，国外资金和高科技投入，开始大量增加，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大陆的国力，将不需要如尼克松所预估的 50 年后可达美国国力的一半，而只需要 20 年便可达到美国国力的一半，在 21 世纪的前半期，就可成为世界四大经济主力圈之一。

中国在升值，中国在奋起，中国在改变自己的面貌，中国在改变她在世界各国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

邓小平掀起 1992 年中国改革大潮，以雄辩的事实向世界昭示，中国这一

东方睡狮正在醒来。  
睡狮醒来时，当惊世界殊。

## 第二章 思想冲破牢笼

假如人类想建立新时代，他们必须坚决地和他们的过去脱离关系；他们必须假设过去的一切等于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才能得到从事新创作的力量和兴趣。任何对过去的依恋都会瘫痪人类活动力量的奔放。所以，人类必须偶尔做得过火一些。

——费尔巴哈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马克思

## 2.1 掉脑袋与换脑筋

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包袱。思维定势严重，理性积淀坚固，古人、前人、死人、圣人，像梦魇一样缠绕着现今的中国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足见接受新事物之艰难；“死人事小，失节事大”，足见换脑筋之不易。十年浩劫，有成千上万人掉了脑袋，但要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清除“左”的影响，却难上加难。这就出现了“掉脑袋可以，换脑筋不行”的现象。所以，当我们迈向现代化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我们所缺少的东西，而是我们头脑里所已有的东西。思想解放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同时这一点又使我们这个民族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思想积淀层深厚，理性板结块坚固，思维定势强硬，思维形式精致。古人、前人、圣人、死人，紧紧地缠绕着现今的中国人。特别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弥漫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浸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曾经遭受多国侵略压迫的民族，具有较长一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遭受侵略压迫，不仅仅表现在领土主权、政治经济等方面，而且在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政治上改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心理、精神、人格上的压抑、屈卑、软弱等影响仍旧长期存在着。毛主席曾赞扬鲁迅骨头最硬，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并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精神值得赞扬，是因为它为数不多，物以稀为贵，人以少为尚。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在心理和人格上竭力消除受压迫、遭屈辱的奴性阴影。

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民历来占多数。马克思在论及19世纪法国人数众多的小农时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小生产者和农民占多数为社会基础的国民素质，必然带有主体意识薄弱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需要将帝王神化，以便论证“君权神授”，“受命于天”，而广大小生产者的存在又为这种神化提供了雄厚而又广泛的社会基础。1949年的那场革命，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人民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但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立即铲除，因此出现了树立偶像、盲目服从、个人迷信盛行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没有使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立即消失，也没有使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思想愚昧、盲目崇拜、头脑僵化的现象立即消失。

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落伍了，落后了几百年。我们现在是跟在别人后面，人家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我们是后工业国家；人家早就实现了现代化，我们是后现代化。落在别人的后面，距离又很大，就容易在心理上有压抑感，在人格上有自卑感，或者崇洋迷外，全盘西化，

或者自暴自弃，望“洋”兴叹，精神上萎靡不振，心理上，变态走样，难以支撑自己，难以自己掌握自己。

搞社会主义，我们不是第一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前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完全接受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我们把前苏联的模式完全承袭下来，并且坚持了几十年。他们附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当成一种真理，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才是社会主义，而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都视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一种教条式的、封闭式的马克思主义钳制了我们的头脑。

由此可见，政治和经济，思想和文化，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这种种原因和诸多因素致使我们这个民族逐渐陷入精神衰竭脆弱，个性呆滞死板，思想僵化保守的状态。当我们提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别人，不是来自别的国家和民族，而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我们这个民族本身；不是来自我们身外，而是来自我们脑海深处；不是来自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是来自我们所已有的东西。这就是旧的思维方式和积淀根深传统的思想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声音，像漫漫长夜里点亮了一盏灯，像回荡在深山峡谷中的呐喊，唤醒在沉睡的中国人，使我们开始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不易一下子放掉。我们头脑中的旧的思维方式积淀太深重了，不能一次转换。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是大逆不道，逆风千里。十年浩劫，是我们民族空前的大灾难，成千上万优秀人物在政治运动中掉了脑袋。然而，掉脑袋可以，从我们思想上否定文革的一套，否定“左”的东西，换一换脑筋却谈何容易。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恪守“存天理，灭人欲”，“死人事小，失节事大”，为了固守头脑中早已形成的一个“理”、“义”、“节”、“操”，一个信条，一个旧的观念，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掉了脑袋的事实，也不愿去转换自己的脑筋。所以，思想解放运动不能一次完成，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呐喊，需要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掀起一次高潮，邓小平同志都首先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一次提出解放思想，到首钢视察时特别强调了换脑筋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小平同志身先士卒，率先闯进这个近几年人们不敢涉及的禁区，对姓社姓资问题，对防止“左”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论断，使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天地。

要真正解放思想，一个基本前提是要使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思想领域还有许多禁区、误区，只有感到我们还有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思想解放才有动力。

马克思在呼唤德国人解放思想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东西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

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1992年，邓小平再次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使全国人民增加了解放思想的迫切感，也对我们自己原有的思想状态大喝一声，使其大吃一惊，获得了冲破思想牢笼的冲动。

## 2.2 不怕有“资”味

解放思想，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人们对此忌讳最深，争论最久。小平南巡讲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就是怕资本主义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问题。这就为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人们冲破这一禁区后，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胆子更壮了，头脑更精明了，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蛮得更潇洒了。有的企业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钱，感到特别痛快，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解脱和超越。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现有的资本主义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心中对资本主义的偏见，我们心理上故胜了“恐资症”，就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胜。克服了对资本主义的偏见，战胜了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感，这是思想解放的一大突破，是民族精神升华的显著标志。

改革开放，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解放思想，首先要冲破有关资本主义的禁区和误区。92年中国改革开放获得突破，首先是在对待资本主义的认识上，获得了思想上的突破。

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有经历完整的充分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跳跃，在社会政治制度上，使我国进入到了高级社会阶段。但，这种跳跃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带来社会经济基础的飞跃，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间所获得的生产力，我们不可能一下获得。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并把资本主义已取得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

然而，几十年来，我们不是学习利用资本主义，而是批判拒斥资本主义。虽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但人们的心目中，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却很深很固，既仇且恨。由于历次运动的大批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坏东西深深刻在人们的脑海里，现实生活中的坏东西、反面的东西，都称之为资本主义，自留地是资本主义，高楼大厦是资本主义，富有是资本主义，留长发、跳舞等也是资本主义。一方面把一切要反对的东西都划入资本主义范畴，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谈资色变，流行一种恐资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却虚幻出资本主义，然后大批资本主义，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主要任务，挖一条壕沟同资本主义隔绝，这是人为设置禁区。作茧自缚，自己为自己套枷锁，把自己同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对立起来，使得我们总是在原有的天地里打转转，不能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却有科学的态度。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就在这部著作中马、恩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进步作用：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本身在内），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历史功绩。

须知，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为自己确立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目标时，对资本主义作出了上述评价。而我们今天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有什么理由惧怕资本主义呢？

可是，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凡事先问一个姓社或姓资，对资本主义噤若寒蝉，视资本主义如洪水猛兽，谁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设下了重重壁垒。因此，要真正地进行改革开放，首先要在人们的思想中解除对资本主义的畏惧。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时，就十分清楚地看到，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一大问题。因此，每当改革开放掀起一个高潮，他都告诫我们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端正态度，冲破禁区。

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政策》的讲话中提出，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现在看来；这个口号不很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的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时明确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是科学，管理是科学，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些担心，搞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一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变不了，影响不了的。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获，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1985年以后，邓小平在多次会见外宾时，几乎无例外地都提到，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内搞活经济，活是活了社会主义，搞活没有伤害社会的本质；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决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或产生资产阶级。

然而，尽管小平同志三番五次、三令五申地强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要冲破这个禁区。可是中国人心灵上笼罩的这个阴影太深了，人们心有余悸，久久不能解脱。资本主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怪物，仍然是一个社会肿瘤。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在这禁区外面徘徊。不敢正视，更不敢触摸。特别是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后，对资本主义又开始异常警惕，倍加敏感，唯恐犯忌，资本主义的梦魇再次缠住了改革开放的手脚。

所以，小平同志在南巡和视察首钢期间，在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时候，他的思想首先闯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禁区，打消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消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感。

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这真是一针见血，一下子抓住了近几年改革开放处于徘徊游移状态的症结。

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这真是一语破的。一句话，驳倒了有关姓“社”姓“资”问题上的种种昏迷想法。

小平同志指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真是一语天然万古新。它在一切有关姓“社”姓“资”问题的无谓争端中划上一个句号，它使今后任何想再一次挑起姓“社”姓“资”争论的企图，变得苍白无力。

小平同志再一次肯切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小平同志在这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改革开放必须学习、利用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打交道，使我们常常闻到一些“资”味。

资本主义社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不能从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开始，不能以之作起点，必须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直接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闻到点“资”味，不仅难免，而且有益，有“资”才有“味”。

首钢利用美国的二手设备，建成几个现代化炼钢厂，使自己具备了生产千万吨钢的能力；购买美国加州钢厂的全部，产权，准备再建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基地；同香港、加拿大等外商联合收买香港东荣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占有其51%的股份，打开了东南亚及国际市场；购买秘鲁铁矿，使其在海外企业达到15家之多；建立十万吨级船队，漂洋过海，出入西方港口，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可谓“资”味甚浓。但是，这些做法却使首钢的钢铁事业获得了大发展，促进了我国钢铁事业登上一个新台阶，又何乐而不为呢？小平同志在视察首钢时说，学习首钢经验会带点“资”味，不要紧，现在就是给我带点“资”味，我高兴。

小平南巡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中国潮。外资、外商朝向中国蜂涌而至，“三资”企业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证券、股票、股市、拍卖等在中国遍地出现，特区、开发区、成片出租土地，这在文化大革命中会被认为是彻底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然而，1992年却出现了。它使中国改革开放上了一个大台阶，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增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种天大的好事，哪有不干的道理呢？

在历史上，封建主义最害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定的过程中，多次发生封建王朝复辟的历史逆流，资本主义通过几百年的斗争，才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较长，至今仍有许多封建残余，我们打开国门，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作为封建主义残余的对立面，有利

于批判、抵制、消除封建残余的顽抗。这是一个进步。

毛主席历来重视对立面的作用，他用“种牛痘”的比喻，说明对立面可增强人民的免疫力，认为把毒草摆在人民面前，可以让人民受到锻炼，他提倡在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时，要谈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革开放之初，刚刚打开国门，有人被“资”味熏倒了，成了别人的俘虏，干了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情。但这不能责怪改革开放，不能怪罪我们周围有了“资”味。而只能说，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使一些人丧失了免疫力和抵抗力。

丧失了免疫力和抵抗力，就会使一些人如同当年慈禧见到火车一样。一闻到“资”味，就如临大敌，惊慌失措，患了“资”味过敏症。前些年，东北有一位县委书记到深圳，见到一片高楼大厦就痛哭流涕，认为“文革”中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出现了。这是十足的“资”味过敏症。其实，这位县委书记看到的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极左时期虚幻出来的并且刻入了他脑海里的资本主义，在他的脑海深处，唯独资本主义才能富，社会主义就得穷。高楼大厦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就得住茅草房，这就是长期思想禁锢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形成的一种偏见，给人们头脑里留下的潜台词。再者说，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从逻辑上讲，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充其量也只能讲资本主义影响，或者资本主义泛滥，如果非要讲复辟，也只能讲封建主义复辟。看来，在长期封闭状态下，最基本的逻辑关系也会颠倒，最起码的常识也会忘掉。所以，只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资本主义接触多了之后，增强人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这种“资”味过敏症才会逐渐消失。

我们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西方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果总是把它拒之千里之外，不接触它，不认识它，也就不能超过它。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惧怕资本主义，当我们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会体验到饱尝“资”味后最终取胜的喜悦。现在，许多中国人在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后，胆了更壮了，头脑更精明了，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变得更潇洒了。有的企业家体验到，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上竞争，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钱，感到特别痛快，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解脱和超越。事实告诉我们，现有的资本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心中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只要我们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我们就会在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克服了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在精神战胜了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感，这应视为思想解放的一大突破，民族精神升华的显著标志。

## 2.3 再次清算“左”

毛泽东 1971 年南巡，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邓小平 1992 年南巡则击退了正在聚集的左倾思潮。“左”的特点是带有革命的色彩，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右相通。但“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市场广大，在现实上，最重要的是防止“左”的东西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不要让“左”的东西在决策层成为主导势力。防止“左”更需要一种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也。

“左”，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思想倾向，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存在的时间可谓久矣。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左”的东西都曾经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党和人民曾经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和代介清算它。当我们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阻力也是来自“左”的东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左”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和改革开放相互对立的。“左”就是僵化、保守封闭，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僵化，破除保守，冲破封闭。要改革开放，就要遇到左的反对和束缚，就要不断克服左的阻力。“不断清算“左”，同“左”的东西作斗争，冲破左的思想藩篱，将始终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破除“左”倾思想的束缚的过程。每当改革掀起一次高潮，邓小平同志都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突破“左”的束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对极“左”的突破。

但是，“左”的积习很深，不是一下子就能反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实际上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习惯于搞政治运动，在工作中左右摇摆，反反复复，始终不能纳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并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寻找根据，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进入 90 年代后，我们的改革开放遇到了新的困难，国际风云变幻，是外在压力；国内经济建设需要治理整顿，是内在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开始聚集，开始形成势力。

邓小平同志及时发现这种情况，立即进行反击。他开始南巡壮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左”的思潮的有力抵制。毛泽东 1971 年的南巡，揭露和摧毁了林彪反党集团；邓小平 1992 年的南巡；则遏制了威胁改革的极“左”逆流。张艺谋称邓小平讲话救了他一命，因为他拍的片子有争议，要让张进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班”。小平讲话后，不办班了，张拍的电影公映后在国际上获了奖。邓小平对社会上的“左”倾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毁灭性的清算与批判，使中国和世界耳目一新。

“左倾”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他们涂有“革命”的色彩，装出非常革命的样子，要么从本本到本本吓唬人，要么用大帽子整人。头脑不清醒者，往往被其革命词藻所迷惑，放弃正确的方向，陷入“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胆小怕事者，则被“左”的恐吓击退，退出改革开放的

大潮。前几年，“左”的思潮之所以有了一定的市场，也就是凭借革命的词藻，打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提出以巩固政权为中心的主张，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他们威胁说，要避免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复辙，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他们提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对于具有坚定的信念，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迷惑人心的同藻，如果不加识别，确实容易上当受骗。

“左”倾思潮的欺骗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呈现不同性质。民主革命时期，被压迫人民要起来革命，急于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有急于求成的心理，害了急性病；表现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翟秋白等人的“左倾”思想和盲目举动，其所以能够一时得逞，就是如此。他们的左倾思想导致革命损失惨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人们对这种左的思想带来的危害在道义上总有一种悲壮感，因为他们毕竟也是要想革命获得成功，心是好的，似乎这时的“左”具有某些“合理性”。到了建国初期，由于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历史暂短，缺乏经验，很不成熟，具有天真的浪漫的成份，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为此我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鉴于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这种“左倾”思潮还有一定的“可解释性”。在十年浩劫期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把我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带到了极度的混乱，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经济状况达到崩溃的边缘。这当然是与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分不开的，但一想到毛泽东的初衷也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人民江山万代红，对他的真诚信仰和良好动机似乎又有“可宽宥性”。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一开始的时候，由于人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改革开放一时想不通，有反感，有恐惧，表现出“左”的倾向，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几年之后，旧体制的弊端清楚地暴露出来，有的人为了维护旧体制的存在，以保住自己在旧体制中享有的特权，竭力为改革制造障碍，表现出“左”的言行。这种情况下的左，就不只是认识问题了，而是立场问题；左下再“幼稚”，而是变得“成熟”；不是盲动，而是自觉地同改革对抗。因此，这时的左具有“反人民性”。正是由于左的性质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及时地识破左，击退左，是关系到改革事业成败的关键。

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我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防止被掩盖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反右反左是要同时进行的。右，就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左，是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用僵化的教条扼杀社会主义生机。右，把改革引向歧途，失掉立国之本；左，反对改革开放，拉着社会倒退，堵死了强国之路。左和右都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从后果上看，左与右虽为“异曲”，但却“同工”。从根源上看，左和右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不发达，小生产的基础深厚，生产力水平不高造成的。囿于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局限于狭小的眼界，拒绝接受新鲜事物，拒斥改革开放，这就出现了左。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自己生活的天地一时达不到现代化的程度，就崇洋迷外，主张全盘西化，全盘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出现右。所以，从根源上看，“左”“右”相通。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谁如果过多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人认为他是左；反之，谁

过多地强调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人认为他是右。这实质上就是把反左和反右对立起来。这是一种误解。反左反右实质上是一个任务，都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因此，要真正做到同时反左反右，就必须在全党全社会高举一面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强化一种意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时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但这并不是说，反左和反右可以等量齐观。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防右更防左。这是因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具有深厚的土壤。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挖掉这种社会根基，左的东西有广大的社会市场。这样，防左反左就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的主要任务。

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市场广大，土壤适宜，在同左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时候，更需要注意政策，讲究策略，主要是从认识上解决问题，做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从现实上看，左的东西很广泛，批判左的时候一般都是泛指，而不是特指。如果特指一个人，就涉及到一个片，一个面。左的市场广大，许多人身在左中不知左，深受左害不恨左。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对左的表现人们不是很反感，而谁激烈地批判左，却会引起不少人的反感，批评者就会孤立冷落。由此人们得出一种处世妙法：左比右好；有的人则在行动上恪守一条不言明的信条：宁左勿右。

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要真正消除左的东西，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治“左”的灵丹圣药，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之后，挖掉了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左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从眼前看，防左、反左应该特别讲究策略。用强硬尖刻的词句骂一下，挖苦一下，讽刺一下，并不会有效果，简单地从组织上撤换调离，也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撤掉这个左，并不能保证上来的那个不是左。如果今天上边有人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政治运动，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恢复文革的做法，那么，社会上的响应者不会寥寥无几，因此，我们当前防左反左，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左的东西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不能让左积聚、集合，不要让左形成一种势力，不要让左挡住改革开放的脚步。《孙子兵法》中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也。

## 2.4 撕碎教条

教条，是一种误区，一种偏见，一种迷信，一种羁绊。一旦脑海里形成教条，使不易破除。当我们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把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几十年来，我们将此奉为经典，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延误了我们奔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 92 年思想解放的第二次浪潮中，我们摆脱了那种从既成的、僵化的、过时的、已有的传统出发的教条主义，从活生生的、眼前的、充满生机的、现实的实践出发，让实践做法官，清理过去的“红头文件”，审视过去的许多定论。撕碎教条，冲破框框，突破本本，我们就迈开了前进的双脚。

每一个时代，特别是历史性的根本变革时代，都要出现一个冲破原有教条的现实课题。原有教条，久受人们崇敬，沉积于人们心灵深底，成为人们思想的坐标或参考系。它是真理的标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要用这个标准加以衡量，加以品评，加以取舍。这个“真理的标准”，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是真的，又是善的、美的，是属于主体精神的，又是属于客体对象的。中国哲学所讲的“义”，就属于这种思想方法。“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理应如此。显然，义是主体的一种自我判定，并没有涉及客体的存在实际。但是，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活动中，义既是理性的知识，又是道德的善，还是情感的美。为义可以杀身，为义也可以灭亲，正义千秋，义是人们永恒的追求。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王国，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持续了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保守，“不敢为天下先”，“恪守祖制”。大臣向皇帝提出新的建议（谏），首要的也是最有力的根据是“臣闻”如何，表明他的思想不是自我的，而是依他的，不是创新的，而是原有的，不是独立的，而是先人已经提出或实行过的。在知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先秦时期就已提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一思想，反对只讲空话，不干实事，主张知行一致，但却限制了思想的创造功能，思想在指导行动中的价值和作用。知识或思想是容易取得的，因为它是现成的、既定的、古已有之的，困难仅仅在于执行这种思想，实现这种思想。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思想活动中，特别是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思想仍然固守、僵化、自足，无视世界的变化，也无视中国的变化，别的国家在不断地变革创新，中国却像一只滞呆的老牛，缓缓慢慢，斯斯文文，偶然有几只牛虻叮咬几口，也只能动一动，赶走牛虻。资本主义冲开了中国的大门，既无力抵抗，又无能与之竞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巨雷，震醒了中国，中国人才以一种新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本人用中国古代语言，简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是”是找出它的规律。

我们党的七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一个真理：党的成败得失，荣辱兴衰，概皆取决于能否实事求是，能否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办事。

建国以来，从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严重地脱离实际，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一直徘徊不进；国家的综合国力，一直得不到增长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提高。十年内乱，几乎使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以来的成就，即使是一个双目失明，四肢瘫痪的人，只要他能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也会温情地告诉你：“现在好多了”！“同十五年前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世界。”

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什么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会有如此鲜明不同呢？答曰：“教条之作祟也”。教条之危害大矣哉！

教条的基本特征，是从某种思想框架出发，考察外部对象，硬性地将对对象纳入思想的框架之中。它不是使思想遵循对象，而是使对象遵循思想。它要求把活生生的、正在或者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世界，屈从、俯就、听命于固定的、已经僵化、已经失去活力的思想世界。

教条不同于信条。信条既不接受实践的验证，也不阐明自己的道理，它只要求人们相信，在生活中遵之、行之、信之。例如，民间的风俗、习惯、禁忌，据之无理，行之依然。教条往往有自己的经验依据，也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因此，教条具有诱人的一面。它常常以历史的经验、理论的面孔，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是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随后推向农村，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活动的人，就要求原封不动地照之搬来，用于中国革命。结果，栽了跟头。

社会主义时期，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推行市场经济。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拥护，有人犹豫；有人支持，有人疑惑。反对者、犹豫者、疑惑者，尽管寥寥无几，但是，他们的思维轨迹，还在许多人头脑中有着思想活动地盘。这个思维轨迹，就是教条，它所运行的思想地盘，也是教条。从特点、进程、归宿，始终固制于教条，始终受某种思维定势制时。

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一旦形成某种教条，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要以这种教条为标尺，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就像电视机的接受屏幕一样，某一频道只能接受某一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不能接受另频道播放的节目。哲学上叫作“主体的认识图式”。主体在认识外部对象时，不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而是按主体原有的思想框架、定势、模式，去接受客体对象的。这里，既涉及主体原有的真理观念，又涉及主体原有的道德观，以及审美境界。

为什么我们习惯于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有所抵触呢？

近代的市场经济，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最初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迄今仍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经设想：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商品、货币、市场，将要消灭，社会将要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因此。不少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前提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核心。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不是仅指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主要的是指以个人为中心，发挥个人才能，尊重个人荣誉，实现个性自由发

展，发掘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和作用。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机制，以无情的手段，调动起有情的个人积极性。它以商品交换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动力，把人的才能挖掘出来，研究自然科学，向市场开战；研究社会科学，在竞争中取胜于人。它宣布了人的独立，同时，膨胀了个人，最后走向了个人中心主义。它无视人与自然的联系，使我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无视人与社会的联系，使人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是轴心，善良、仁慈、同情、怜悯，作为人的最高尚、最伟大的情感被冲淡了。助人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冷置一旁了。

市场经济有它的正效应，也有它的负效应。不愿撕碎教条的人们，随手可以拿出它的负效应，为自己头脑中的教条辩解。例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加剧了人们对私利的追求，金钱关系至蚀着被推崇的同志关系。无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建立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但是，它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职能和必然要产生的结果。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定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市场经济是就发展生产力讲的，它是经济基础，它与社会主义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需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改革和开放，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完善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一场自觉革命，自我实现，自我完成。

教条是一种习惯性思维，它不仅是思想的逻辑渊，在当前发展市场经济中所遇到的教条还有历史的存在沿革。

第一，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各个解放区被敌人强行地分割为大小不一的块块条条，割断解放区与其它地区横向的经济联系，逼使解放区的党、政、军、企业、事业一体化，把一切权力集中干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身上。在这种体制下，经济活动的方式恰好与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又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足自乐，与外界隔绝的习惯思想相吻合，不仅满足了解放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支援了革命战争。战争，商品交换极不发达，敌人又加以层层封锁，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亲自动手”，希望外援，但不把希望寄托于外援。革命战争第一，政府与人民，上级与下级，军人与百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政府既是政治权利机构，又是生产管理机构，既要管理生产，又要管理生活，从资源分配、生产过程、产品供销，都由政府一手操办。小生产者农民意识中的“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又极为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社会管理形式。它团结对敌，为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了功，历史证明，那时是必要的、有活力的。但是，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有人把这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名之曰“社会主义大家庭”。谁也不冒尖，谁也不致饿死，要富大家富，要穷共同穷。结果，不是先进带动落后，而是落后拖住先进。

按照教条思想行事的人，悲剧就在于：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证明是成功的、有效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运用到另一历史条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始终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因而，真理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彼时彼刻是真理，此时此刻也许正好是谬误。

第二，建国以后，我们曾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误作社会主义的楷模。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内外敌人，相互勾结，政治上、军事上，四方八面地挑起暴乱，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濒于危机。政府不得不把私人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国家直接管理或派遣国家工作人员经营管理，它不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经济手段，而是利用政权力量，通过行政手段，用强制的方法，管理经济。1921年，即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已经发现：“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接着指出：完成一般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同完成经济任务是不同的，完成经济任务“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的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一个小的国家里首先建立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随后，1921年1月，列宁又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企业以及租让制在苏维埃政权下存在。但是，列宁逝世后，列宁的思想和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扭曲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斯大林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起来，以为通过人为的计划，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盲目性、无政府状态，提出“计划就是法律”。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党通过国家机关直接插手经济，企业只不过是执行国家机关所制订的计划的工厂，党政的职责不分，政企的职责不分，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国家机关既管理行政，又管理经济，国家机关越来越大，国家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企业只不过是执行国家计划的附属单位。它的手脚被紧紧的捆在国家计划的机器中，只是这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它的运转只能服从整个机器。这样，企业就无法灵敏地、灵活地适应市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苏维埃国家在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中，曾经取得出色的成就，政治上顶住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独立自主地站住了脚，社会主义的追逐者就把它计划经济模式当作楷模。我们国家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从教条出发，全盘拿来，直接用于政治生活、经济管理、消费方式。

我们可以列出计划经济许多弱点和不足，它的本质弱点和不足，是压抑了人，压抑了人的创造，压抑了个人、企业、事业、国家机关的创造能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制一切，人只不过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社会角色，而不是一个正常人，只能按照既定的角色规定活动，不能按照自己的才能、个性、特长表演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教条之所以为教条，就是要求人们按照既定思想去思想，按照既定活动去活动。一切都是现成的，人何必去思想，何必去发掘自己的才能，创造新的业绩呢？

第三，建国以后，我们曾经以农业小生产者的观点，构思社会主义，用家长制方法，管理经济，干预社会生活，强调统一，要求集中。

农业小生产是教条思想滋长最适当、最广阔的土壤，在农业小生产活动中的农民，自己不能提出自己的思想，只能依赖或者接受别人的思想。如果说农民也有自己的思想，那就是按照祖传的、习惯的、常规的、久已有之的思想去思想。实际上，不是思想，而是教条。它所企求的是整齐划一，比肩并列，一家一户就是了个生产单位，从生产到消费都是自我封闭的，与世隔

绝的。

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没有特点；就不能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农业小生产却是家家一样，户户相同，衣、食、住、行等等生活资料，几乎全部由自己生产，生产资料也基本上是自己生产的。社会交往极少，商品交换只是偶然发生的。这就规定了农民的保守、愚昧，落后，不肯竞争，不愿出头，“不敢为天下先”，不为祸首，不为福先，更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

农民的这种思想意识，与斯大林时期计划经济的样板，两种教条，一拍即合，再加上建国前解放区的经验，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式的教条。它的表现，主要可以归结为几点：

第一，不分地区、资源、人力、技术的不同特点，强求一律。农村中的人民公社，要求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工农兵商学化作一体，五脏俱全，各色皆备。实际上，是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自然经济的扩大。一大二公，大则大矣，公却空矣。因为抛开私，抛开个性，抛开特点，公只能是外加的、强制的，是硬性的给予，而不是自我的寻求发展。

第二，国家用经济以外的行政手段，甚至个人意志，管理经济。国家向企业、生产单位和地区直接下达生产指标，企业、生产单位和地区按照国家规定上交利税。在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既没有自主权，又没有自主钱。计划是国家制定的，生产者无权重新安排和重作调整，对于资源、能源、人才、技术，也无权过问。这样，它就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资金是国家分配的，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的兴衰，一概由国家包了下来。企业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是自上领取的，经营的盈亏损益，由国家承担。企业的效益与利益挂不上钩，职工的收益与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挂不上钩。企业没有花钱的支配权，企业对自己的职工只靠政治热情（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有效的），以为抓好革命，就能促进生产。结果，政治口号满天响，生产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干快、干慢，都是一个样。同一行业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发自内在的经济运行的需要，而是来自外在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社会不是以经济为杠杆，而是以政治为准则，勉强使之发生联系，它与现代社会性的大生产，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脱节，越来越陷于孤芳自赏。

第三，国家既有直线式条条，又有横跨式的块块，控制不同行业，控制不同地区。从事生产的单位，纵向他讲，有婆婆压着，横向他讲，有族长管着，脑筋被紧束着，不能自由运用，四肢被捆绑着，不能自如活动。上面的婆婆和当地的族长，什么事都要管，什么事也管不了。它只是笼统地规定：要这样，不要那样，至于如何才能“这样”，如何才能“不要那样”，他就不去管了。不过，一旦你“如何”起来，他就要管。生产单位不能自我作主，只能是国家机关的附庸。

附庸也有附庸的好处。生产管理者、企业家、事业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讨好上级，取得首长的欢心，就可以庸庸昏昏，安坐交椅。对上求宠，对下卡压。这是我们国家产生官僚主义的现实根源。有人把我们国家当前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种种不正之风，归根于旧社会的遗迹，外来思想的腐蚀。其实，主要的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在宏观上要求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微观上要求一切听命，一切服从，抹煞了个体、集体的积极性，否认了个体、集体（企业）、国家之间矛盾统一关系，以国家机关意志、愿望、需求，捆住

了人们的手脚，也捆住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产生权力崇拜，以追逐权力为上，不正是官僚主义的征象吗？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就是冲破官僚主义最有力的社会机制。市场是无情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规律，把最优秀、最突出、最有竞争能力的人选择出来，庸庸碌碌，慢慢腾腾，不动脑筋，按照素有常规进行思想和活动的人，就会被市场经济摔在一旁。它鼓舞先进者，带动落后者，使先进者首先富裕起来，而不是使先进者与落后者共同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快、好，而不在于“不让一个人饿死”，在于它的目标一致，这种一致是个别性、差异性与整体性、统一性相互联系的一致，而不是齐头并进，按照机械的方法，线性相加，豆腐干式的一致。它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容纳个别性、差异性、多样性于自身的统一，不同地区、不同资源、不同人才、不同技术，将以不同特色，斑斓独特地表现自己，而不是以往设想的小而全，大而全，人人一样，个个相同，你我不分，都在大锅里盛饭的统一。

第四，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是以往从教条出发的又一个表现。既然社会主义是“有饭大家吃”，没有剥削，没有失业，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就显得并不重要。谁也不必冒尖，谁也不要出头，只靠消耗体力和时间的简单劳动，“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就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生产发展。时间和效率，企业经营和企业效益的关系，就必然要被忽视。时间并等于效率，也不等于金钱。在同一时间内，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知识素养、思想方法，都与劳动效率有着联系，都参与着经济效益的创造。“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口号是片面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也就是撕碎以往教条的15年。1992年，显得尤其突出，尤其光辉照人。小平同志号召解放思想，换脑筋，也就是要坚决冲破各种教条的束缚，坚定果敢地按照实事求是的路线办事。换个脑筋，就是扯碎教条；从实际出发，就是取消教条。

脑筋是用来思想外部对象的。“换个脑筋”，就是用新的思想去代替旧的思想，用新的思想去思想已经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新的外部对象，用新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撕碎教条，独立思考，就是独立地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课题。

只要人在世界中活动，人就在思想着自己的活动对象，目的是使自己的思想与自己活动的实际对象，相互一致，相互同一（一致），使自己的活动达到预期的目标，不致失败，不致受到客体对象的惩罚。

脑筋的本质、功能、作用、价值，就是思想。思想从形式上看，是属于主体的，从内容上看，是属于客体的。思想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始终存在着矛盾，而且不断产生着新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对象出发，找出它的规律，预测它的未来，把握它的发展趋势，并为之积极努力。

思想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滞后性，表现为固守教条，不能适应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着的实际，思想落后于实际，这就存在着一个换个脑筋，解放思想的问题；另一种倾向是超前性，超前性可以表现为无视实际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放荡不羁，浪漫为快，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其一例。它是幻想的，甚至是空想的。抛开实际历史的进程，妄图一步登天，思想与实际脱节。然而，思想超前性的本质，应该是指思想从实际出发，

掌握实际事物的规律，洞察它的发展趋势，抓住时机，果断行动。从当前的、直接的感性对象出发，但又不停留于感性对象，而要对感性对象加以理性的考察，发掘对象的本质，因为，只有发掘出对象的本质，才能把握对象的规律。规律是现存的，又是超越现存的，因为规律来自现存，却又超出现存。规律指向未来，预示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规律把人们引向理想境地，激发人们的浪漫情怀。现存的东西与理想的东西，当前存在的东西与人们所企求追逐的东西是一致的，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又是我们的情趣向往。现实与理想，实际存在与浪漫驰骋，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我们的理想才不是空的，不着边际的，只有不停留于现实的实际存在，望眼未来，才有理想，方可浪漫。离开当前的实际，任性走马，是一种天真的浪漫；囿于当前的实际，没有浪漫，不敢奔腾飞驰，思想就要僵化，行动就会灰里灰气。思想具有超前性，就意味着思想具有超越当前，飞奔未来的价值和品格。

其实，现实并不是仅仅属于客体的，浪漫也不是仅仅属于主体的。现实与浪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体的思想活动内容，又是客体的实在活动法则，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统一，达于统一。这种统一，是在主体的自我需求下，通过主体的自我活动实现的，但它在客体的对象中，有着自己的外在根据，主体与客体，主观思想与客观对象，不是前者是“主观的样子”，后者是“现实本身的样子”，否则，现实与浪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就永远也不可能统一。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思维的红灯：第一，仅仅斥责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发牢骚，出怨言，指出周围生活的不应当处、不合理处、不能令人满意处，顶多不过是一种机智，而不是一种思想，因为它随手可拾，不需要花用多大力气；第二，撇开现实，用主观的意愿、理想、情趣，或者应当的、合理的、愉人情欲的、令人向往的非理性的指向，去顶替现实，是虚幻的、梦愿的，顶多不过是一种书生意气。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无可讳言，灾难、悲痛、不正之风、官僚主义、抵制改革，甚至乘改革之机，侵吞掠夺，等等，抚手可拾，是悲叹还是正视？是哀痛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理性的考察。两眼茫望长空，以为尘世的一切，尽都微不足道，不是真正的思想，而是茫然的、朦胧的，仅仅属于内在世界的主观欲求或幻象。真正的思想，是从现实出发，从现实中钩取出理想。列宁说：现实在开展中表现为必然性，现实的进展和成熟，也就是理想的实现和完成。现实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并不拒绝理想，泯灭浪漫，而是以伟大的理想，诱人的浪漫为精神动力，展现自己。现实是能够飞动的鸟，浪漫是鸟的两翼。

思想滞后性的特征，是从思想出发，以别人的思想，框定自己的思想。它表现为教条。思想的超前性的特征，是从实际出发，以客观存在的实际，为思想的对象，它表现为灵活地、灵敏地反映实际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滞后是不可取的，须当警戒斥拒。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难以完全避免。超前是可取的，须当努力争取。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活动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总结，反复地思考。

在实践活动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既无闲情，又无雅致，成口埋头于阅读文件、处理事务之中。对自己的工作单位，对周围的情况，对国家、对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知道的很少。相反，他们脑筋里装满了材料，像老大婆的针线包，要什么有什么。为了证明某一观点有据可凭，他们可以随手拿出现成材料，

作为论证的根据，也可随时拿出另一些材料，反驳这种观点。他们的脑筋是材料库，可以随时放进，也可以随时取出，唯独不能产生新思想，不能利用材料制造思想，不能通过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材料，炼就出自己独立的思想成果。只有“**实事**”，不能“**求是**”。只能用“**实事**”论证或反驳外来的某种观点和看法，不能经由“**实事**”，探索出“**实事**”中的内在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实事**是从实际中来的，思想却是从别人的头脑中来的。具体点说，是从本本、条条中来的。这是教条思维的一大特色，也是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带来的思想习惯。

邓小平南巡时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事**”是经常变化的，作为“**求是**”的脑筋，也必须随之经常变化，亦即经常转换，我们不能以过去求到的“**是**”，纵向地承袭；也不能以别人求到的“**是**”，横向地照搬。纵向承袭，横向照搬，都抹煞了主体的作用。主体的思想功能，主体的自我创造，都要陷于教条，都不能从教条的泥潭中爬出来，都要被教条紧紧地捆住自己的脑筋，在现实生活中缺少活力。

1992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冲破了条条、框框、本本的束缚。过去，人们一直把“**红头文件**”视为不可更改的，92年许多政府机关都在清理“**红头文件**”：过去，有许多禁令、陈规，成为限制人们行动的框框，92年改革大潮一来，这些框框立即垮掉；过去，诸如市场经济等理论，在奉为经典的本本里是查不到的，92年改革的实践突破了本本的局限，建立了新的理论。

撕碎了教条，冲破了框框，突破了本本，我们这个民族就会轻装上阵，大踏步地前进！

## 2.5 反叛儒教

黑格尔说过，人死于习惯。中华民族要迈向现代化，就必须同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势力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告别过去，就不能走向未来。不丢掉本我，就不能创造自我。敢于抛弃，才有建树。然而，传统的习惯势力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了几千年，我们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同几千年的旧习惯、旧传统决裂。所以，思想解放是一场精神上的暴力行动。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而且要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决裂。1992年，改革开放之花，遍开神州大地，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社会行为、新的评价标准，不断涌出，不断地摇撼着传统观念。保守的人愕然，开拓的人，力图抛开传统，各是所事。如何看待与处理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创新，原有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就成为当代中国亟待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邓小平1992年的历次谈话，回答了这一问题，改革开放的中国，选择什么思想？怎样选择？

### 首先是决裂

马克思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个巨大的保守力量，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传统压抑着人的思想，瘫痪着人的活力。如果依恋传统，倾慕传统，人的活动，只能止步。因此，活动于自己时代的人，首先是与传统决裂，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保守力量决裂。费尔巴哈说过：“假如人类想建立新时代，他们必须坚决地和他们的过去脱离关系；他们必须假设过去的一切等于零。”这话有点片面，也有点肤浅。但是，在新时代即将来临，旧时代即将逝去的历史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偶尔越出常规，偶而作得过火一些，是在所难免的。与过去脱离关系，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是一次重大的精神暴力行动，它对过去的传统，不肯安份守俗，不肯俯首就范，更不肯循规蹈矩，而是冲击，在冲击中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

传统观念不仅反映在过去学者的著述中，思想家的论证中，更多地是反映在人民群众的思维活动中，或思想方式中。例如，由孔子、孟子所奠定的儒家思想，它适合小生产者的农民意识，能够满足封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需要，又与天然朴素的宗法制度相为吻合，就为中国人普遍地接受下来。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锤炼，精巧细致，又与人们的血缘感情联系着，人们不仅在思想上承袭着它，而且在感情上眷恋着它。儒家思想在中国，就像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在欧洲一样，不仅在人们的思想层面上，而且在人们的情感底蕴中，久受敬畏，习被推崇。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存在对象，一切思想观念，都要用这种思想，加以衡量，加以品评。合者取之，违者拒之。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经济上表现为个体的小分散，政治上表现为集中的大一统。经济上小分散的社会支点，是自然经济，政治上大一统，其社会支点是皇权至上。它反映在思想上，一是自足性，自我生产，自我满足，

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万事不求人”；二是封闭性，从生产到消费，始终独立运行，彼此联系少，相互往来少，商品交换更少；三是固守性，生产对象固守，生产手段固守，生产行为固守，劳动产品祖辈相同，产品消耗方式世代一样；四是缓慢性，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而生产积累很少，即使有了积累，也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将所积累的资金用于别的生产部门，而是用于购置农田，仍；日分散经营；五是散漫性，生产者之间，由于各自经营，彼此隔绝，相互散离，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整体性的社会联系，“各人自扫门前雪”，除了遵循自然节令外，几乎没有也不需要生产活动中的社会纪律。“交了粮，自在王”，是自然经济下小生产者农民的一种生活样式，也是他们的思想样式，不必关心市场供需，更不必引进外来产品和新的科学技术，自己消耗自己的产品，就足够了。生产者的个性，个人的主动性，个体的积极性，被抑制住了。人被抑制，物也就得不到开发利用。人的精神被捆绑着，人的手脚也只好被捆绑着，不敢也无法对物开战。人不能尽其才，物也就不能尽其用。这种社会状况和思想状况，正是封建大一统，皇权至上所需要的。皇帝一言九鼎，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愿望就是人们的行为指向，他的情感就是人们的追逐向往。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更不允许人们自己制定自己的思想。小生产者的农民除了按照常规和习惯，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外，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自己的思想。

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冲破这种传统的思想方式，相反，它助长了人们的依赖心理。一切唯上，一切听命。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能力，被有形和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了。1992年，是我国商品经济扩大发展的一年，是市场经济开创建立的一年。它动摇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惊人的变化。

——“官本位”观念开始淡薄，弃官经商，弃官经营企业、事业的人，尽管为数不多，但并非个别；

——“跳槽”现象出现，一些科学技术专家、技术工人、青年教师，甚至大学教授，抛弃原来的工作单位，到涉外单位、公司、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另谋职业或者开创自己的新事业；

——“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的产品全由国家包揽下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市场经济却逼使企业主动地去适应市场需要，使自己的产品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企业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皇帝的女儿也愁嫁了。

——“自己推销自己”的人才市场出现了，人不再是棋盘上的棋子，听由摆布，人开始自己选择自己的职业，显示自己的才能了。这就逼使人提高自己的素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凭本事吃饭。迎逢上司，拉关系，凭人情，靠照顾，越来越行不通了。

——“猴子吃老虎”的空前奇观出现了。灵活机敏的猴子乡镇企业，呈几何级数繁衍生殖，把手脚尚未放开，困在半开半闭笼中的老虎国有企业吃掉了。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是，市场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质不优，不管是产品还是人，都要在竞争中失败。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拍卖，潇洒地“死去”，生气地“活来”，关、停、并、转，正在推动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拍卖、兼并、破产，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激励措施之一。

——对“下海”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儒家重义卑利，孔子提出：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对君子喻之以义，对小人喻之以利；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以为农业是务本的，商业是逐末的，在思想和政策中，始终贯彻“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文人学士轻卑商业，提出“文不以商”，“士不理财”，老百姓也瞧不起经商，认为“无商不好”。商，在中国人的思维形象中，是奸诈巧骗，市井小人所干的勾当，以致自以为高尚圣洁的人以“手不沾钱”为无上光荣。照中国的传统思想看来，人的社会行为，一旦与钱联系起来，就要掉价，就要失落做人的资格。但是，1992年，人们下海经商，以能够灵敏地反映市场动向（不是阶级斗争动向）灵活地适应市场需要（不是政治路线的需要），当作展示自己才干，施展自己才华的新舞台。

——教授卖馅饼之事，引起纷议。议者或叹我国分配制度中的体脑倒挂，或斥教授不务本职，或谓教授有余力可以著书立说，也可以兼课讲学，为何去卖馅饼？议者是非，姑置一旁。但是，连卖馅饼的教授自己，也发现“转变我们知识分子头脑中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旧观念尤其不易”。为图遇不到熟人，第一次卖馅饼特意拉到了远离学校的大钟寺，那张“学习馅饼启事”广告，是夜深人静时在校园内四处张贴的。观念的转变确实难。不过，这位教授和他的老伴，还是利用星期日卖馅饼。教授卖馅饼，这一观念的转变，可谓大矣。至于我们在政策上是鼓励还是抵制，在社会生活中是提倡还是反对，那是另一回事，问题是观念的转变。

1992年的中国，冲破了那种文温尔雅，“君子无所争”，不敢试，不敢闯，不敢冒尖，不敢承担风险的传统观念，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思想要求，向传统的思想观念展开了拼搏，出现了决裂。

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提出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没那么回多。试、闯、冒，引出了1992年思想观念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只是一个开头，还同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段距离。但是，人们旧有的观念变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行动已经冲开传统观念的枷锁了。

### 撕裂自己的心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在自己时代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思想是被把握在人们头脑中的时代。但是，人们的头脑不是一块空地，任由自己的时代施工建筑，而是一块高低不平，珍芜并处的杂地，既有金石，又有泥沙。它要抵抗新的时代建筑，新的时代建筑又须采用它的原有材料，供自己使用。为了使用它，为了建筑自己时代的思想，必须首先清除这块杂地，把“一切已死的前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的思想、意识、观点、理论，加以理析。

马克思曾经提出，“那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东西，是一种不撕裂我们的心就不能从中挣脱出来的枷锁。”使心（精神）从枷锁中挣脱出来，是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向传统观念，向我们头脑中“先在的思想”，向我们的主体意识，开战、冲击、攻破、占领，是一次灵魂革命。马克思用“撕裂我们的心”，加以形象的表述。撕裂我们的心，将心中的病瘤取出来，我们的心就会适应新气候变化，健康地跳动起来。这是时代的精神课题，也是时代的实践课题。

主体意识，积久沉淀，就会变作信仰，不问其所以然，只行其当然。

中国传统意识的特点，是事先规定一个思想准则，要求人们在这个思想准则规定的框架内，运用自己的思想。“要如此做才对”，它的否定句是“要不非如彼做才对”。要如此，不要如彼，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如孔子所倡导的“复礼”，就是要“如此做”，“克己”，就是不“如彼做”，“克己”是为了“复礼”，“复礼”必须“克己”。孔子用“克己复礼”表述这一思想，因为，人的物欲、情欲、趣愿、知求，向人以外的对象、事物、存在攫取自己的需要，并且取胜它，是人的自在需要，无需引发。孔子也已看到，“吾未见好色如好礼者也”；思想的职责是克制它，使之复于礼。作到“在家无怨，在邦无怨”，“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施”，礼是外在的非我的规定，却要变作内在的自我肯定，人的自由丧失了。一切循礼，还有什么人和人的自由呢？道家反对非我的外在的礼，但主张“无为”、“不争”、“不欲”，“以辅万物之自然不敢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不为欲所累身，不为情所动心，不为物而挂怀，比儒家用有形的礼规范人、束缚人，确实是自由多了。但是，这种自由是把人消融在虚无之中，与儒家思想殊途同归，都是否定自我，否定自我价值的实现，否定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用人与礼的关系融化人，道家用人与世界的虚无融化人；儒家要求人齐于礼，道家要求人一于道；儒家要求人主动地去适应外部世界的需要，抛却个人自我，“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是穷是达，是进是退，尽当听命于外部世界的安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99·善天下”。客体、环境是一种必然力量，始终凌驾于主体自我之上，自我的价值和作用，只不过是学会顺从它，适应它，至多是利用它，思维的进程是客体压制主体，使主体俯就客体，主体在客体面前等于零。道家似乎相反，它要求摆脱一切客体对象的压制或束缚，逍遥飘荡，悠闲自逸，是穷是富，是酸是苦，甚至是生是死，概不挂于心。“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物不能结之，情不能束之，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可视而不见，这似乎给了人最大的自由。实际上，还是把人（主体）贬为零，因为主体对客体，只能适之，顺之，任（时）之，应之。

人是一个有需要、有情感、有意志、有追求的存在实体。第一，人有权思考世界；第二，人有权要求世界。可是，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儒、道两家，却把人的权利剥夺了。人只能按照他们所制定的道、礼、仁、义、理，去思想、去行动。儒家是求人的有为的，但所求的是自我的外在束缚；道家是希望从无为中求得有为的，但有力的结果却是无为，使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安时顺世，逆来顺受。至于佛家，干脆宣布，人的一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任何自我需要的满足的，人的物欲、情感、意志、追求等等自我需要，只能等待来世，用幻想的满足来满足现世的不满足。

剥夺人的作人权利，集中反映在剥夺人欲。儒、道、释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以某种思想、理论、观点，控制人欲，甚至绝灭人欲：荀子提出：“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汉代的董仲舒要求“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及至宋代；朱熹直截了当地制订出那个公然敌视人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中国哲学确实有一种牺牲精神，但是，这种牺牲精神不是牺牲于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牺牲于他人的思想的摹本。至于自己，是无所作为的。“无所作为”这一成语，在古代中国，含有赞美别人

崇高，自己微弱的意识，是褒义入是表示谦虚。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谦虚是美德，骄傲是恶浊。自己无所作为，因而，人是渺小的，人的外在存在，如天、道，理等等却是伟大的。因而人对外在存在，只能顺从，不能有所作为。

入顺从外在存在，是通过人的自我意识，达于天人合一。从殷商时代的敬天、畏天，通过占卜，求向上帝（天），以决自己行动的疑虑；到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再到董仲舒的“为人者天”，“人本于天”，一直到朱熹以抽象推理的形式，推出天理，天理之上的太极，都是要求人、人的思想和人的行为，与人的外在存在“天”的运行秩序，“天”的意图愿望，相为一致，达于天人合一。不论唯物主义地解释天，还是唯心主义地解释天，结果都是让人适应（顶多是利用）外部必然。如果人的作用，仅仅是适应和利用外部世界的必然，人还是必然的奴隶，还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否定。

否定人的自我价值，是为了建塑人际和谐，达于“安定”、“太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太平盛世；民不安，犯上作乱，叫作“乱世”。对乱世，人应避乱求安，苟全性命于乱世。中国古代，考核官吏政绩，评价君主功迹，不管他所治下的人民贫富苦乐，只要安定就是好的。“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是好君主所为，乱是坏君主所作，治乱是评价统治者贤愚是非的准绳。

国家社稷以安定和谐为目标，社会生活中的君臣上下、父母儿女、夫妻兄弟、亲戚朋友、，以及普遍的人际关系，都以和谐相处为美德。孔子提倡仁，主张“君子无所争，心也射乎”。就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只有在体育竞赛如射击。才可有所争，其实质也是求得和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所讲的立和欲是就所立和所欲的终点讲的，而不是就所立和所欲的始点讲的，不是欲本身，而是欲目标。立与达，在孔子那里，是说自己欲求怎样，也让别人怎样，我自己不欲怎样，也不要以之施诸他人。最后，齐一地达到欲的同一，这就取消了差别，混灭了个性，排除了竞争，压抑了人的自强意志，千人一样，万人相同，使社会平、安、均、和，这就是以和谐为价值目标的必然结果。人，自我，不是作为实体，独立地发展自身，而是作为关系，融化于关系目标之中，以整体取代个体。它所着眼的不是起点的一视同仁，而是终点的整齐同一，不是起点的平等，而是终点的平等。起点的一视同仁，起点的平等。即人人都有所欲的权利，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能够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的。至于终点，却可以是不平等的，所达到的欲，不论程度或者质地，必将是不平等的，不尽相同的。孔子追逐的人欲，不是欲的始点，而是欲的终点，不是起跑线上的平等，而是终结线上人与人之间的最后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在差别、矛盾、斗争中实现的，而是在平安、均等、和平中完成的。实际上，是否定人欲的，是否定人的自我价值的。它的目标不是赞扬人和人欲，而是平和人和人欲。

中国思想家一直把人欲看作是可咀咒的东西。老子说的最为明白，“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只要看不到可欲的对象，人心就不乱；只要人们无欲静处，天下就会安定。

没有人欲，天下太平，最高统治者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统治人民，“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民无知无欲，也就不会争夺犯上，彼此和谐，其乐也融

融。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理想画图。

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否定人，否定人欲，贬低人，提高强加于人的外来思想。它要求人与人相安无事，实现天下太平。这种思想，作为观念形态，拓展在各个思想领域，并且蕴埋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就像弗洛伊德所指出，潜意识慢慢潜入无意识或超意识层次，意识受它的机制控制，然而意识又意识不到，意识以自我意识到的完全正常状态为潜意识提供的指令作证。这可称为“先存在，后论证”，用以推理和论证的理智或理性，成为信仰或深深积淀的情绪或人格心态的工具，人们全然不知，却在顽固执行，正为马克思所说：它是“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信仰的东西”。

因此，撕裂我们的心，从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来一个精神上的暴力行动，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 市场经济的思想选择

思想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植根于现实的基地，但它却是从前人的、外域的思想出发，以之作为思想资料，或者改铸，或者过滤，用以回答现实问题。

建立和形成市场经济的思想需要，我们可以举出千条万条，中心是人，尊重人的物欲、私利、荣誉、权利，发挥人的才能、技术、智慧、本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冒险精神、强力意志，把人突出起来，由人及物，使人向物开战，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中的物，屈服于人，为人服务。

规律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重复性。如果规律是一次性的，过去了，就已变成了历史，就不再重复出现，人们研究规律，研究历史，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探求历史规律，历史给予我们的，顶多不过是知识，历史规律告诉我们的，只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历史现象的内部机制，不是思想，也不是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这种研究，就像我们观看电影纪录片一样，前一个镜头一闪，后一个镜头跟着出现，前一个镜头一过，后一个镜头接踵而来。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是历史资料的鉴赏，历史事件的比肩并排，不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商品经济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它的基本内容有二：第一，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逐步成为生产活动中的主要形式；第二，由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生产转变为在生产 and 消费活动中彼此相互联结，相互牵制的社会性大生产，那种既生产自己的生产资料，又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自己生产自己消耗自己产品的经济形式，通过商品交换，逐步被商品经济所代替，商品生产成为生产活动中的主要形式。这就形成了近代的商品经济。

如果说自然经济是“自吃自”的经济，商品经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经济。商品经济不仅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且使“地适其宜，货畅其流”。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跃进。它的思想基础，是尊重个体特点，崇尚个性创造，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以个体或个人为起点，挥其所长，发其所具，把个人特点，地区特长，通过商品往来，引发出来。以农业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封建时代，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国家是两离两合的。经济上，个体完全独立，与外界隔绝，孤立地从

事生产活动；政治上，却要从整体出发，自上而下地实现绝对统一。这种统一，是自外的，整体与个体，统一与差异，国家与个人，是强制的、机械的统一。商品经济却要求把个体与整体，差异与统一，个人与社会，自内地发生联系。尽管它在初期是以个体为起点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必将导致个体与整体的联系、统一，相互制约，彼此联结。

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两种经济运行形式，是在同一思想引导下进行的。不过，商品经济是从微观主体生产的直接目的反映生产运行特点的，市场经济是从宏观的资源、配置、环节反映生产的运行特点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都是以商品交换的方式，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两者的思想着眼点是同一的。

我国正在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选择什么思想？否弃什么思想？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质优，才能在市场上找到销路，拓展自己产品的销售市场，发展自己的生产，增加自己的积累，提高自己的利润。反之，就会被市场所淘汰，这是市场经济最有力的激励机制，最优化的社会制约。假冒伪劣产品，可以逞雄一时，却不能维持长久。破产、兼并、拍卖，时刻威胁着每一个企业，工作和职员工资的上下浮动，甚至被解除，其也时刻地面临着威胁。这就逼使工人、职员、生产的管理者，尽心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发展生产，改进并提高产品质量。以小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慢慢腾腾，因循守旧，不能满足市场的不同需要，不能适应市场的千变万化。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无情法则。不敢试、闯、冒，稳稳慎慎，按部就班，就不会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会有新产品，当然也不会开辟市场，占领市场。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当然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像“大跃进”年代，空喊几十年超英，几十年赶美。我们不提倡，也不鼓励那种空喊高速度，但是，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退。还是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做到这个要求，必须着眼于市场经济，因为，扎实、效益、稳步。协调，不是来自主观思想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市场需要。计划来自市场，方针、政策、方法，也来自市场。无视市场和市场需要，我们要陷于盲目，陷于蠢动。因此，迅速地、及时地捕捉市场信息，机敏地、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是生产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否则，眼睛只是盯着自己的工厂、企业、事业，不看中国大地，不观世界风云，闭门造车，就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插手生产，管理生产，而是协调各个生产部门、各生产地区的生产安排。我们所说的政府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或政府机制转变，就是指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个转变，也必须着眼于市场。生产力须倾听市场的呼声，反映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必须解放自己，发展自己，以利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上层建筑中的政府，政府须倾听生产力的呼声，归根结蒂，还是听从市场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不是排除计划，而是要求计划适应市场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使计划与市场相为统一。一切由政府统筹经营，统一安排，“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显然无法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闭塞生活，也无法适应。

市场经济既在调动着个人、集体、企业的积极性，又在调动着政府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国家的积极性。生产者不是听向仰上，而是自我创造，自

我发展，政府不再仅仅言是称否，包管一切，而是把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加以调控。微观搞活，宏观控制。但是，宏观的控，必须以微观的活为前提。为样，生产者必须换个脑筋，政府也必须换个脑筋，把计划经济体制下铸造的脑筋，换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脑筋，就如邓小平所说：脑筋一活了，想的面就宽了，路干也就多了，就更好了。脑筋活，在于多想，想的面宽；多想，想的面宽，脑筋也就活了。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只凭支付时间，消耗体力，结果一定是慢慢腾腾，看不见新的气象。小生产者宁肯平静安稳地渡过一生，也不愿在激烈竞争中取胜一时，不为福始，也不为福先，脑筋就不可能活，它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计划经济的强制，却难以接受市场经济中的行动自由。

市场经济是自由活动的经济。这种自由，不是任凭兴之所致，放荡不羁，它要求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作出贡献，并为社会所承认。但是，社会承认是一个不确定的标尺，必须由国家的法律商定。这就涉及产权。产权又是与利益相连的。职、权、利，必须直接挂钩，否则，就不能维护和保持生产者的积极性。只是尽职尽责，完守完责，不敢保护自己的权，忽视自己的利，是农业小生产者的一大弱点，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一弱点，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独裁，剥夺农民劳动成果，鱼肉平民百姓。全国统一、地方统一的计划，其所以能够在—个阶段内通行，没有受到多大的社会阻力，也与我们传统思想中“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无争、无为、无我，甚至忘我的心理需求有关。在中国人的心理情愫中，不论遇到任何不幸，任何灾难，任何冤枉，宁肯不争不斗，也要求得身心平衡，甚至即使身受损失，也要追求心灵的安逸。“生则顺世，歿则休矣”。安于现状，不敢也不愿为自己的权限、利益斗争，它必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唾弃。

市场经济不怜悯弱者，只青睐强者，不恩赐停滞后退者，只支持前进创新者。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思想要求。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当然，不是一概抛弃。

### 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思想的本质是创造，思想的价值是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就是创造原来未曾有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气象。创造的大敌，是模仿、照搬、移植，创造必须通过人，人的思想，人在实践中的理性冶炼。因此，创造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创造性的思想往往一闪而现，但却是在长期的实践磨炼中，不断思索的精神成果，是思想追逐的思想成果。

创造基于不满足，基于对幸福的追求。创造有两个原则，一是思想的自由，思想不受外来思想的干扰；一是理性与德性的结合，并把两者的结合当作追求幸福的工具。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政党，如果满足于现状，自我陶醉于现有的一切，自我满足，昏庸度日，就不会有任何创造。中国人往往以“知足者常乐”慰藉自己。其实，“知足”是一种不知足的自我愚弄，“常乐”是一种不常乐的精神虚幻，是一种自我嘲讽。它既限制着人的自由，又束缚着人的理性和德性。把幸福和快乐置之于人以外，世界以外，“常乐”和“知足”只能是空的，只能在精神王国中荡游。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曾说：猪在污泥中取乐，人却不能像猪一样，满足于

污泥中的生活乐趣。苏格拉底承认：猪不苦于忧虑，无烦无恼，但人不应该像猪一样：自我满足。所以，边沁才说：“宁肯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不做满足的猪。”功利主义的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前提却是以个人利益作为整个利益大厦的基础。

世界永远不会满足人，永远不会满足人的需要、利益、情趣、向往。一旦世界满足了人，人不再有需要、利益、情趣、向往等等冲动，人就不会再有创造。创造显现为创造欲，人失去了创造欲，社会就不会有发展，人类就不会有进步，世界将陷于死寂，人间将失去生气。

如果外部世界已经满足了人，人何必去创造呢？坐享其成足矣！

创造的对象是客体存在，创造的工具是主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工具，创造中国革命，是思想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它不是模仿、照搬、移植马克思主义于中国，而是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的结果，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不是思想的直接搬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敌当前，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别无选择。那个时期，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尽管也存在着利害矛盾，但是，在对敌斗争中，利害是共同的、一致的，彼此的利害矛盾，降为其次。意志统一，步伐整齐，凭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军事热情，战胜了敌人。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还存在着潜伏的或明显的敌人，但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了。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出来了。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不同个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各个不同的利益需求。一切统一，一切按照集中的意志，一切遵循整齐的步伐，无视个性，无视特点，无视差别，就要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建国以来，一度实行过的计划经济，把计划当作法律，终遭失败，即其一例。市场经济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经济，把意志统一，步伐整齐当作首位，就会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注意个性、特点、差别，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尊重集体的利益和权力，并不是个人中心主义，也不是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政府权力，而是把个人、集体、社会、国家，当作一个既存在着矛盾又存在着联系的系统。同一中存在着差异，差异就融容于同一之中。市场经济是充分发展差异的，但又要以调节的手段，抑止差异的恶性滋长。这种调节的手段，可以是舆论的，教育的，伦理道德的，法律威慑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不允许个人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但是，它必须为个体，以及集体，提供活动余地，使人，生产力，不是自外地依存某种思想，而是自内地创造自己的思想，使思维由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在革命战争年代，两军对峙，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种思想曾经是正当的，曾经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现在，已经过时了。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人们纵向地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要求人们横向地吸取当代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优秀成果。那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闭门自守，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思想，发展自己的经济，自我堵塞，自我与世隔绝，就难以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难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难以迈开走向现代化的步子。

计划经济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经济，尤其是对国营经济，被笼子关的更为严实，更为牢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2 年，笼子被打开了。但是，仍然半开半闭。被关在笼子里的国营经济这只老虎，仍然需要吼叫，需要挣扎，需要发挥自己的威力，在竞争中取胜。这就需要自我思想，自我设计，自我规划，自我行动，自己创造自己的思想，自己转换自己的生产行为，摆脱素有的思想框架，实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要创造自我，就要先丢掉本我，即深藏在意识深底的潜意识。敢于抛弃，才有建树。告别过去，才能走向未来。我们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就要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陈旧的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要有一种反叛精神，要勇于撕碎自己的心，敢于用精神上的暴力行动完成解放思想的历史任务。

## 2.6 不争论是一大发明

思想解放的标志，不是看想了什么，而是看干了什么。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同时伴随伟大的历史行动。靠争论，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也结束不了，“两个凡是”至今也不会认输，深圳就依然是一个边陲小镇，承包制至今仍不能实行。干、做、实践，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思想和对象的统一。“干”包含“想”，“做”包含思考，实践包含理论，而“想”则不能代替“干”，思考不能代替行动，理论不能代替实践。“干”高于“想”，行动高于思考，实践高于理论。行动是对一切问题的最好回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就是要反对一切现存事物，使一切现存关系革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不争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发明。

解放思想靠什么？不是靠语言，不是靠争论，而是靠实干，靠实践。所以，不争论是一大发明。

解放思想的标志是什么？不是看想了什么，而是看干了什么；不是看说了什么话，而是看做了什么事，所以，行动，亿万人民的行动，是思想解放程度的主要标志。

1992年，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主要是因为全国人民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改革开放做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搞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先争论一番，各方面都取得一致意见之后才能行动，那么，我们就将一书无成。如果靠争论，两个凡是的观点现在也不肯议输，文化大革命现在也结束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还要照常执行，工作重点也转移不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如果靠争论，深圳特区现在也建立不起来，深圳将依然是一个边陲小镇，目前建成的现代化城市简直不可想象。如果靠争论，首钢的改革经验就不可能形成，首钢这个特大自然企业也搞不活，首钢就不能在世界上崛起。深圳和首钢的改革经验都向人们昭示出这样一条真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他们真抓实干，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认准了就干，没有时间去争论；干了，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有时间也不争论。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干什么事情都要先等文件，文件来了先领会精神，领会不一致就要争论，由于观点各异，往往争论不休，结果大家空发议论，无谓争吵，消耗卜引司，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糊涂化，结果，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江山依旧，面貌未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搞承包制，在沿海建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但小平同志允许有不同意见，允许看，但不争论，现在看来这种做人效果很好，实为一大发明。

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历来就存在着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古代，人们生活在“小国寡民”的社会里，小生产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交往，因此，人们喜欢坐而论道，或述而不做；三思后行，或只思不行。中国传统思想讲自我修养，讲修身、正心、诚意等等，求诸己，讲精神自我的内在超越，就是让人们只停留在精神的脑海之中，

限制人们的行动。这种影响一直沿袭到文化大革命，还出现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说法，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捆绑着人们的行动。中国历史上不乏许多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但缺乏改天换地的伟大行动，缺少伟大的冒险家、企业家、革命家。论道者多，行道者寡。

整个中国哲学史，一直贯穿着知与行关系的大讨论。宋代朱熹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王守仁则提出“知行合一”、“以知为行”的观点，到了明末清初工夫之提出了“行高于知”、“行则知之”的观点，到了近代，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知难行易”。知难行易，这是针对中国缺乏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提出的，目的是唤醒国人，为自己的权利而行动，而斗争。因为，自己懂得了自己的权利，也就便于或易于自己的行动。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夺去，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孙中山分析了造成这种结果的认识论根源，认为这是被“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错误思想迷惑所致，他认为这种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颠倒知行关系，不去厉行的思想，其毒害之烈之深，比清朝帝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重认识轻行动看成是“中国积弱衰败”的思想原因。大敌当前，必须打倒。于是他提出了“知难行易”之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思想于迷津”。孙中山充分论证了一切真知都来源于行动，认为一切真知虽然包含有“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的智力活动，但归根到底是以“千百年之时间”的“行”来取得的。孙中山指出，一个国家要富强起来，必须力倡行动，只要依据科学，勇于实践，其事无不成。美国用140年时间，日本用50年时间成为世界一流富强国家，我们中国如果能“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世界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捻熟，筹之有素”，制定出革命和建设的计划竭力付诸实践，“不过十年”，也可以成为世界上的富强国家。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实践第一，倡导在干中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也是在指出实践高于理论，行动高于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干，做，实践，是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是理论见之于实践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任何行动都包括了思想、认识、理论，实践的过程就是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所以，实践的品格高于理论的品格。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是坚持实践第一，把行动看成是人类最高素质的表现。历史不是用语言、理论创造的，而是用行动创造的。只有想法而不行动的人只能产生空论或思想瘟疫。

关于实践的思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的范畴，使唯物主义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使实践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在哲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大革命。以往的哲学都是企图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要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是要用实践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用实践来阐释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问题，用实践来把握现存世界。实践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又是人类之谜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不争论”这一大发明，正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时候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他呼唤要通过武器的批判达到思想解放，因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他要求思想解放，解放要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先进的理论一旦变成了群众的行动，

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同时伴随巨大的人类行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因为有人类社会进步这一整体行动而载入史册的。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有启蒙，而且有救亡，有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壮举。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我们目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五四”精神的继续；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启蒙和救亡这两大主题，那么，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则是把这两大主题完全统一起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许多人争先“下海”，既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又是投身现实的表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思想解放的标志，又是全国人民的主体实践。1992年，全国上下全面地行动起来，12亿人民同时投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这种形势面前，过去那种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显得滑稽可笑；学术界那场中西文化使用关系的讨论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那么长的争论显得没有必要；古代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在本国发挥作用的讨论也失去意义；那种一味强调树立忧患意识、满腹牢骚、空发议论的现象已失去存在条件。行动起来，投身实践，真抓实干，才能赢得时间，抓住机遇，把希望变为现实。不争论是一个强国富民的伟大发明！

### 第三章 国门洞开向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体。整个世界都有日益增长的共同体意识，人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共同的命运和需求。

——诺曼·卡曾斯夫

以半球众国之联合，其规模体制，与大地大同几无异矣，但尚有两半球对待之体耳。夫既能半球相合，亦何难于全球相合乎！

——康有为

### 3.1 大开放的格局

1992年，我国形成大开放的新格局。国门洞开，敞向世界，这是近代以来最彻底最全面的开放。中国对外开放时则强盛，而且越强盛越开放；中国闭关锁国时则衰败，而且越衰败越封闭。强盛与开放，衰败与封闭，是两对紧密相联的伴生物。唐朝与清朝的盛与衰，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脚。我们今天打开国门后，失去的只是落后、愚昧，英得的将是重新崛起的现代文明。

早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就及时提出，中国要实行大开放。这种大开放首先意味着是全方位的开放，不只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其他国家开放。我国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是从那里来；二是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大开放之所以要面向整个世界，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资本更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的通用化和普及化，使得这种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世界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也不管是先进的还是后进的国家，经济上各有短长，因而需要互补。中国只有向整个世界开放，才能扬长避短，博采众长，更好地实现高速和协调发展。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仅能够吸取不同类型国家的长处，取长补短，而且还能够使我们的经济避免对某一方面或某几个国家的依赖，从而使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运用自如，掌握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权，不至于受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与摆布。这也是中国人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珍贵经验。

全方位大开放同时意味着多层次的开放。在各种地区的开放中，分别实行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7月，国务院确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授予两省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较大的自主权，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又先后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湾地带等。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最大的经济特区。至此，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带的开放格局。

1992年，我国的对外开放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春风，再不只是东南沿海的几枝独秀，而是形成了新的态势。1992年6月，我国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市、县，即黑龙江省的黑河、绥芬河市，吉林省的辉春市，内蒙古的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新疆自治区的伊宁、塔城、博乐市，广西自治区的凭祥市、东兴镇，云南省的河口县、畹町市、瑞丽县，宣布正式开放。同时，这些沿边市县镇所在的省会（首府），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昔日边境贸易的星星之火，而今正形成沿边开放的燎原之势。在我国2.2万公里的内陆边境上，东北、西北、西南三大开放带已初步形成。几年前那种仅仅由边境地区参与的、零散进行的易货贸易已逐渐发展成为以边贸为先导、以内地为依托、以高层次经济技术合作为重点、以开拓周边国家市场为

目标的沿边开放新态势，初具规模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在东北开放带，以满洲里、黑河、绥芬河、辉春四个沿边开放城市为龙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省区正在形成一个具有纵深背景的大开放区。在西北开放带，中国最大的内陆省区新疆，目前已在 5400 多公里边境线上开通了 8 个通商口岸，自治区适时提出了全区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6 月 23 日，中哈（哈萨克斯坦）国际列车首行“第二座欧亚大陆桥”，西去的铁轨把新疆人的开放意识和营建大市场的宏愿引向了中亚地区。在西南开放带，云南省目前拥有 17 个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同越南边境也互相开辟了二十多个贸易点，全线开通的边贸和经济技术合作使大西南这片昔日对外开放的死角变成前沿。

对外开放不仅伸向沿边地区，而且伸向沿江及内陆地区。1990 年 4 月，中国政府宣布开发和开放浦东，进而带动长江流域地区的发展。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 5 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给予它们享受开放城市的政策待遇。至此，长江沿岸 10 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并确定长江流域六片地区为全国重点综合开发区。这样，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加快长江沿岸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构想初步形成。有人很有诗意地形容说：中国的东海岸，宛如一张拉满的弓，万里长江像一支利箭，直指太平洋。

国务院又在 1992 年 8 月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 4 个边境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 11 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一是扩大开放城市对外经济合作的权限；二是支持开放城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造老企业和开发现代农业；三是鼓励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四是具备一定条件后，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兴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随着沿江（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的开放开发，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已初步形成，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边经济开放区——沿江及内地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具有不同开放功能的梯度推进格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不限于工业领域和农业领域，而且包括第三产业。1992 年，国务院作出决定：引进外资，加快发展中国的第三产业。这一决定引发了新一轮的海外商人的投资热。

开放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此全方位、深层次的大开放初步形成。

于是，肯德基来了，比萨饼来了，麦当劳来了。国外的大银行在上海、深圳、海口、大连等城市，相继开设分行。据报道，仅深圳一地就开设了 15 家国外的金融机构，外国银行驻华各类金融机构已达二百六十余家。日本人佰伴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率先步入中国的零售商业，与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沪正式合资兴建大型零售商场。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区也将推出合资商场，中国新兴的房地产业，深为海外看好，已有二百多家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运转。

香港台和公司投资 10 亿美元的 6 条高速公路，明年可望在广东境内竣工；韩国的一家政府机构韩国土地开发公司已同天津达成协议，为中国建造一个工业投资区；香港巨贾李嘉诚和郭鹤年已经签署了三份意向书，其中包

括在北京王府井修建购物中心和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修建一处投资 1.3 亿美元的楼群。

中国的大开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在一个更为深邃的层面上展开。向国际规则靠拢，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国际经贸竞争中不断增强实力，抢占制高点，已成为开放地区的共识。“保税区”已在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破土而出，沿海一些省份也在跃跃欲试，中国的股票正在进一步走向海外，以股权形式形式吸引外资的新思路将进一步拓宽；继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内地扩散之后，高科技产业已日益成为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热点。

中国的大门已经向全世界敞开，大开放正在把中国推向世界。

### 3.2 大开放的深蕴

真正的开放是全面的、积极的、深层次的开放。我们不仅引进设备和资金、技术和知识，而且还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先进的思想观念。我们打开国门之后，还要打开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六门，还要打开思想领域的大门。不但要吸引外资，利用外国技术，而且要敢于吸收和借鉴一切当代世界的文明成果，用以冲刷我们身上的病疾，冲破我们的旧体制。

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在空间上形成了大开放的格局，相继形成了沿海开放战略、沿边开放战略和沿江开放战略等三大战略，扩及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等领域，而且在开放的层次和内蕴上逐步提高，从引进机器设备到资金人才直至管理和经营方式，形成了深层次的开放。

当初，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开放形式仅仅限于引进全套机器设备，后来发展为举借外债和创办“三资”企业，广泛开展同国际大财团、大商业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大规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1979年第一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诞生起，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走完了它的草创期，成为工业企业家族中富有活力的新成员。至1991年底，全国已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近4.2万家，其中已投产开业的约1.8多万家。1991年12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家向境外发行特种股票（B股，）超越了我国对外借款、吸引直接投资的筹资模式，开启了股票市场对外资开放的大门。从引进机器设备到引进外资，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深化。

第二步深化是引进技术和智力。中国的“三资”企业是从服务型，劳动密集型起步的，如今转化为以生产技术型、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为主，技术先进型项目、产品出口型项目已占相当大的比重。深圳等地的产业革命正在悄悄进行，电子、生物、光学等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正在蓬勃兴起。改革开放以来17000多项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加快了我国追赶世界的步伐。

智力的引进则是对外开放的飞跃。十多年来，中国先后聘请了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万名专家。这些操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迥异的洋专家，给开放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武汉市柴油机厂聘请德国专家格里希担任厂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也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首钢等企业向全世界招聘人才，显示了中国大企业的魄力和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制，乃至新的观念，则是对外开放的深层底蕴，对国有企业带来冲击。上海国营拉丝模厂与外商合资，外方资金、技术尚未到位，仅实行了一套新的政策和管理，前后就判若两厂，由此产生了震动全国企业界的“斯米克现象”。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有多有少，产品能大能小，市场能内能外，这种全新的机制已经进入数万家“三资”企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样板。

熔引进设备、资金、技术、人才、智力和先进管理方式为一炉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达30平方公里，成片转让外商开发。这一举措曾引发一阵风波，招致“丧权辱国”、“引狼入室”的非议。开发洋浦一度搁浅。1992年8月18日，海内外所关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30平方公里土地的转让合同正

式签字，国人终于跳出了“姓社姓资”的怪圈，江苏省江阴县华西村甚至兴起了一场“语言革命”，对普通话和外语优秀者增加一级工资，促进对外交流，发展经济。根深蒂固的闭关锁国意识，植根于小生产狭隘观念，在开放的大潮中开始了深刻的嬗变。

中国领导人吸取历史教训，学习各国经验，自 1978 年实行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外贸出口发展速度大大加快。1979 年至 1991 年，我国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 15.1%。我国出口贸易在世界上的地位由 1978 年的第 32 位，上升到 1991 年的第 13 位，1992 年的第 11 位。1992 年前 10 个月出口总额达 651.54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1992 年，全年对外贸易总额超过 1500 亿美元。

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78 年，我国出口的大部分是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制成品出口不到 47%；1991 年，制成品出口提高到 78%，技术进口 1991 年为 35 亿美元，技术出口为 13 亿美元。

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根本改善。1978 年底，我国外汇结存仅为 1.67 亿美元，1986 年底也只有 20.7 亿美元，1991 年底达到 217 亿美元，加上银行的外汇头寸，超过 420 亿美元。

大量引进外资。至 1991 年底，我国已累计签定外商投资项目 42027 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 523 亿美元，实际使用 233 亿美元，已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 1.7 万多家。1992 年 1—9 月，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27808 个，协议外资金额 306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4 倍和 3.3 倍。另外，我国还借用国外贷款，至 1992 年 9 月底，实际使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等优惠贷款 582 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稳步发展。1979 年底至 1992 年 6 月底，累计签定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 220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30 亿美元。1992 年底，在国外执行合同的人员有 10 万人左右。

引进智力和人才工作显著。1990 年至 1992 年 9 月，共聘请各类外国专家 8 万多人，其中随引进技术设备合同或根据政府间双边、多边协定来华工作的外国经济专家约 6 万人。在此期间，我国还从国民经济各部门选派了 5.3 万多名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国外实习培训。

海外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 1991 年底，我国经批准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共有 1683 家，投资总额达 33.5 亿美元（包括外方）。海外企业投资地区遍及五大洲的 106 个国家，涉及资源开发、贸易、工程承包、机电加工、运输、保险、医疗、餐馆等多种行业。

中国正在从开放中走向复兴。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道路就不会太遥远了。

### 3.3 中国回到世界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只有敞开大门让世界涌进中国，才会回到世界的怀抱，才不会成为地球上的一个“孤儿”，世界才不会再考虑开除中国的“球籍”问题。中国不拒绝世界，世界就不会丢弃中国。中国怎么对待世界，将决定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

对外开放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大家庭，摆脱了闭关锁国状态，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现代化，谁都不愿当世界的孤儿，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只有普遍的交往，“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每一个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受世界体系的影响，因而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参照系来考虑自己的发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各个国家间世界性交往的进一步强化，任何国家要自我发展，实现现代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通过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广泛交往和合作，适应开放的世界新环境。

马克思还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世界的开放性本质和“世界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必然趋势。

列宁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关起门来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也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历史也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只能落后挨打。各国间的交往与开放，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闭关自守的政策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保守意识，正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病灶之根。

曾经有过古老灿烂的优秀文化，也有过汉唐盛世、万邦来华的开放景象，但明代以后，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华民族固步自封的社会心理状态，逐渐使国家、民族弱不禁风，使曾经是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在以后的五百多年中一蹶不振，倍受侵略和蹂躏。

15世纪，当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西方列强推行海外扩张、开展海外贸易的时候，明朝的皇帝却屡下禁海令，对私人海上贸易采取种种控制和摧残，虽然也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景，但那不过是为了展示中央帝国的富有，安抚夷蛮，赏赐皇朝财物给荒蛮逸民，没有任何经济贸易的迹象。明世宗下

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对素以通番为生的海商施以严刑峻法。“沿海之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士农工商”，“商”排在末尾，对它严厉排斥。这些荒谬的政策，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外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

清朝初年，禁海令更为严厉，规定“寸板不得下海”，严禁海上贸易。为贯彻闭关政策还发出“迁海令”，强制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 50 里，越界者立斩，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朝政府规定：1. 限制通商口岸，外商只能在对外贸易口岸通商贸易，而实际上外贸基本上限制在广州进行，史称外贸的“广州体系”；2. 限制中国商民出入海疆，商民必须经申请具保、核准、发给执照，才能凭照出海；3. 限制外商的居住和行动，在广州设立商馆专供外国人居住；4. 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严禁粮食、五金、硝磺、史书和地理图籍等出口。

当然，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仅仅是一种表象，其内层深处乃在于封建统治者的夜郎自大和愚昧无知，以中央之国自居，天子大智大德，恩泽海内外，惠及天下万民。1793 年，乾隆皇帝在答复乔治三世的使节马戛尔尼请求建立两国正常外交关系所说的一番话，最能代表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这种愚昧无知。皇帝指出，英国派员来华实属无益之事，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行毕集，无所不有……然而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种对西方愚昧无知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必然在西方侵略面前应战无力，节节败退。从 1842 至 1895 年之间，清政府在五次对外战争中，都以失败告终，被迫割地赔款，开放沿海口岸和内河港口近一百个。这是对中央帝国的莫大讽刺。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后说：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闭关自守，中国的发展未来取决于开放。鉴往知来，“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以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当然没有什么发展还有其它因素，有我们的错误。”

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同志强调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利用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博采天下之长，为我所用，方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对外开放是工业文明的标志，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在世界各国连成一片，全球市场早已形成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把自己与世界市场分隔开来，只会成为世界的“孤儿”。

要强国就必须开放，开放则兴，封闭则衰。世界各强国发展史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五六百年前曾经是欧洲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岛

国。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惊醒了这个沉睡的国家。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大批的英国学生，医生、商人、牧师和科学家到欧洲大陆求学。英国政府也利用欧洲大陆国家对进步人士的宗教迫害，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能工巧匠涌入到政治稳定的英伦岛国。从此，英国的毛织、呢绒、印染等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成为欧洲手工业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产业革命也是在对外开放中进行和完成的。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促使英国从手工工场向大机器生产的过渡。到 19 世纪 40 年代完成产业革命时：英国工业产值已经占世界总产值的 39%，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额的 21%；经济实力远远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 19 世纪末以来，大英帝国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对外国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以“非英国发明”的堂皇理由而加以排斥。这种引进技术上的保守做法使英国工厂设备陈旧落后，产品竞争力下降。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再下跌，如今成为西方七国中倒数第二的国家。

德国在近代初期虽然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德国人并没有听之任之。他们积极学习英国办工业的办法，学习法国办技术教育的办法，广泛利用外国新技术和新机器，从英国进口机器和招聘技工，从而加快了德国工业的发展。至 1870 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达 13.2%，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20 世纪初，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加紧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购买专利，技术进口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生产和外贸的增长速度。1950 年到 1970 年的 20 年中，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 3.4 倍，对外贸易增长近 11 倍，技术进口增长 57 倍。1971 年至 1979 年，引进技术专利费用达 152 亿马克，仅 1976 年进口技术费用就达 20 亿马克。此外，德国还大量吸收外资。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私人投资增多，1961 年外国私人投资为 3 亿马克，1973 年增加到 69 亿马克，增长了 22 倍。到 1976 年底，外国在德国的私人投资累计达 630 亿马克。如今，德国经济实力名列世界前茅，主要得益于外国新技术、投资和对外贸易。

美国从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其工业奇迹般地跃居世界第一。到 1913 年，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美国独立后，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是技术工人和机械师移入美国，把欧洲的科学带进美国，这种移民是一种天然的技术引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 30 年代，大约有 2000 名欧洲著名的科学家因逃避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迫害而迁往世界各地，其中绝大部分迁往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为逃避战乱纷纷逃往美国。1940 年至 1945 年，迁往美国的外国移民中，每 10 人就有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1951 至 1961 年，美国聘请了二万多名外国科学家。从 1949 至 1973 年间，先后移居到美国的外国科技人才有 22 万人。引进人才和智力是美国强大起来的主要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也曾闭关锁国，险些因此而灭亡。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实行“朱印船制度”，规定日本船只驶往海外须持有“朱印状”；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五次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及日本人与海外交往，取缔天主教传教，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实行严密的监视。这种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日本在外族入侵面前几乎陷入全面的危机，但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而在地球上消失。他们于 1868 至 1873 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他们提倡“洋才和魂，脱亚入欧”，放弃闭关政策，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日本，又一次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主要依靠对外贸易、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议会民主。

亚洲的“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的兴起也同样表明了这样一个铁的法则：开放则兴。在 50 年代，“四小龙”都曾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采用提高关税、进口管制和多种汇价等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内部市场。这虽然对发展本国工业、改善国际收支逆差，曾收到一些效果。但是，单纯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以内部市场为基础的，因而，经济发展也就受到内部市场规模和资源的限制，也就不能有效地利用别国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科技成果，经济难以进一步发展。同时，实行这种战略必然要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质量得不到保证，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削弱，消极阻碍作用日益暴露。到 50 年代末，台、韩、新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出现停滞现象。它们从 60 年代初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放宽贸易保护政策，减少关税，放松外汇管制等措施，从这时起出现了经济上的腾飞。它们取得的业绩已广为人知。据统计，“四小龙”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台湾 1991 年为 8012 美元，香港 1991 年为 14406 美元，韩国 1991 年为 5855 美元，新加坡 1991 年为 14814 美元。

对外开放，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人才，这是各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开放，再开放，这是时代的潮流。中国已经汇入这股潮流之中，这股潮流使中国回到世界。

### 3.4 全球意识的觉醒

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开始，到倡导变法改良的“康、梁”，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无一不自觉地号召培养国民的世界意识，唤起人们向往世界大舞台的世界意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和永恒价值，这就是世界精神。对这种精神的觉醒便是世界意识，这正是我们民族所需要的，它会给我们民族的崛起带来动力。1992年，中国的改革大潮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彻底醒来，需要伟大人物的呼唤，需要市场经济的撞击，需要全球意识的增强。强化全球意识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期工程”，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先决条件。

大开放的格局，大开放的深蕴，使中国走向世界，使中华民族进一步唤醒了全球意识。

中华民族沉睡了几千年，靠什么才能把她唤醒？1992年，中国的改革大潮告诉我们：靠代表人民意志和时代要求的伟大巨人，靠激励人民才智的市场经济体制，靠日益走进中国的整个世界，靠中国人民日益增强的全球意识。

有了全球意识，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短处；才能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才能冲刷我们民族身上几千年形成的痼疾。

每个人都有被自己的生活阅历，文化因素积淀成的心理结构，形成自己的性格。民族是大写的人，也有自己的心理结构和自己的性格。权衡中国文化传统的得与失，反思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期工程”。

在数千年封建传统积淀成的心理重压之下，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条件下，我们的民族性格逐渐形成了一种封闭、保守、排外的民族自我中心倾向。

民族自我中心倾向是一种被强化了了的民族优越感，从自我依恋和自我欣赏的情感出发，把自己的民族看成世界的中心。民族自我中心倾向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各民族都有持自己的文化透镜来看待世界的现象。这种倾向帮助人们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一致性，但容易发展成为对本民族的偏爱和对其他民族的偏见。我们的民族自我中心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地理中心倾向。这种倾向总认为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其他民族居于四方，所以才有中国之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风光秀丽、人杰地灵，被认为是得天独厚的先天自然优势，滋生了一种地理条件优越感和眷恋乡土的心理。第二，文化中心倾向，从古人的“华夷之辨”、“道德礼仪之邦”、“四海之内莫不服王化”，到现代格外强调中国开化最早、文化最发达。世界第一多，都体现了这种心理。第三，权力中心倾向。古人以为中国是万邦之首，“天朝大国，四方来朝”。现代又出现了世界革命中心论，把中国比为“世界革命的井冈山”。

我们的民族自我中心倾向是民族的历史环境与文化优势养成的。中华民族是在一个大陆性半封闭的地理环境的摇篮中长大的。在这种隔绝状态下，和四邻相比，中原大地有着明显的地理优势，形成了优越于从事游牧渔猎的四邻的农业文化，并通过文化优势战胜、征服和感化、熏陶了四邻的其他民族，终于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由于隔绝的有限空间取得了比倒优势，在

缺乏其他文化比较中冲击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我为核心的世界观念。地理中心，得天独厚，自然成为文化中心；文化的优胜力量，使人们确认自己也是权力的中心。

从民族自我中心倾向中滋生出妄自尊大和自欺欺人的心理倾向。妄自尊大的倾向有两种表现：（1）追求国粹。既然文化优越，必然凡属中国特有的便是最好的。（2）盲目排外。追求国粹的反面是，凡不是中国特有的便是不好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不是老祖宗首先提出来的，听起来也格外刺耳。踢足球输给了香港同胞，也要拿外国人出气，甚至对中国人移居海外，也视为自弃王化的叛国行径。

自欺欺人的心理倾向的典型是集体阿 Q 心理，主要有四种表现：（1）精神胜利法。在现实中妄自尊大，碰了壁，便转向儿子打老子式的自我安慰，用精神上对别人的蔑视来维持自尊地位。比物质文化比不过，便杜撰出“精神文明第一”。贫穷，释之为“安贫乐道”；富裕，反成了“骄奢淫逸”；愚昧，释之为“厚重淳朴”；有知识，反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专制，释之为“加强领导”，民主和自由却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2）比祖宗，发明电子计算机的是欧洲人，不是我们，这不要紧，我们祖先发明算盘的时候，他们的祖先还只会数指头呢。日本人研制悬浮列车，立刻有人考证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申农提出信息论，也有人下笔万言，论证康熙早在几百年前就提出了系统的信息观点。（3）以长比短法。到了在祖宗那里也阔不起来的地步，就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中国穷，美国也有要饭花子，也有棚户区，有娼妓，有失业，有污染，有爱滋病，等等。我们的工业化还不发达，仍不失天下第一的泱泱大国之风。（4）好面子。即使一切自欺欺人的法主都失效了，还剩下一个面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宁可饿死。对外援助，不从自己的实力情况出发，要摆出老大哥的架子，让自己的人民勒紧吐皮。天大的困难，也要强调形势大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粉饰太平。

妄自尊大和自欺欺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盲目排外的心理基础。时至今日，把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盲目排斥的作法，还大有市场，这不能不说与我们民族的自我中心心理倾向有关。

这种民族自我中心倾向，严重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而闭关锁国状态又强化了这种民族自我中心倾向。这种相互作用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使中华民族的大门迟迟不能打开。而每一个革命的先驱都是在呼唤中国人的世界意识。从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开始，到倡导变法改良的康、梁，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无一不是自觉地号召培养国民的世界意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启动中华民族的大船、驶向现代化彼岸的时候。也是反复强调要树立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走进中国，要站在全球的角度认识中国，要使中华民族回到世界大舞台。

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平与发展，这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意义和永恒价值，这也是一种永恒的世界精神。对这种精神的理解、认识、觉悟和共识，便是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是任何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奋起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它会给落后的民族带来崛起的动力。

在大开放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世界意识，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性突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发展史上的一场精神大革命，是中华民族迈向 21 世纪的先决条件。

#### 第四章 改革挺进纵深

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马克思

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马克思

#### 4.1 转换经营机制：首钢活了

国有大中型企业能否搞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问题、改革的取向问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问题，因此，也是当前改革的难点与焦点问题。首钢作为我国企业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单位，坚持公有为本、承包为本、人民为本，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企业本身获得了无限发展的能力。首钢经验证明：只要摆脱高度集中的旧的计划体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就能搞活，而且还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首钢改革过程中的最大阻力就是旧体制，首钢经验不能得到大面积推广的原因就在于旧体制的束缚。首钢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这就是首钢崛起的时代意义。

1992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它标志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由试点转入全面推行，我国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就是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健全企业经营行为，使企业能够在宏观调控下，从政府的“怀抱”扑向市场的“海洋”，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转换机制实际上意味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首钢总公司（首钢）作为我国企业改革最早的试点单位，由于实行承包制，转换了企业的经营机制，使首钢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大企业，成为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样板。

请看下面一组首钢的数字：

钢材产量：1991年431万吨，比1978年增长2.66倍；

销售收入：1991年91.43亿元，比1978年增长5.33倍；

利税总额：1991年29.26亿元，比1978年增长6.76倍，年均递增17.08%；

实现利润：1991年23.61亿元，比1978年增长6.89倍，年均递增17.2%；

企业资金利税率：1991年61.16%（按固定资产净值计算），比改革前提高1.38倍，比全国全民工业企业的12.4%高3.9倍；

人均企业国民收入：1991年3.6万元，为全民工业企业的5倍。

到1991年底，首钢已发展成为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的特大型企业，拥有7大公司，103家工厂，41家联营厂，25家中外合资企业，8家海外合资企业，经营钢铁、机械、电子、矿业、建筑、航运等15个行业。1991年，首钢有90多种产品行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创汇2.1亿美元，其中钢铁以外产品已占42%。

1992年5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说：“路啊，是历来明摆在那里的，走得快，走得慢，走得好，走得坏，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首钢两条都对了。”首钢的方向就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企业的方向。

在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面仍达三分之一以上，企业叫苦连天的情况

下，首钢却连年出现有效益的速度和有速度的效益，显示出生机一片，无限活力，这种鲜明的对照难道不是一种启示吗？

首钢究竟靠什么法宝获得如此一枝独秀的成就？一句话：靠承包制，通过实行承包制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的企业经营机制。用首钢人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承包为本达到人民为本，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首钢靠承包制转换了企业的经营机制，使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使企业从政府的“怀抱”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海洋”，摔爬滚打，不断进步，成为汪洋中的一名游泳健将。

首钢承包制主要内容是：第一，实行上缴利润 7.2% 递增包干，超包全留，欠收自补，明确国家（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第二，超包留利按 6：2：2 比例，分别用于企业发展生产、集体福利和工资奖励，保证企业发展后劲和职工生活水平随企业效益增长而逐步提高。第三，承包期长，从 1981 年包到 1995 年，有利企业规划长远的发展目标，避免短期行为。第四，实行全员承包，承包主体是全体职工，而不是经营者个人或领导班子。承包后，企业有了自主权，国家对首钢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体制的轨迹，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首钢实行了内部承包制，把企业对国家的责权利关系，层层落实到人。内部承包制的核心是：“包、保、核”。“包”是按照职责分工，承担落实到人的任务；“保”是成千上万共同劳动的协作、协同；“核”是对包保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同分配挂钩，并辅之以纪律，做到赏罚分明，同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严格管理同主人翁积极性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首钢又对领导体制、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进行配套改革，通过企业对国家的承包和企业内部层层到人的承包，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承包体系，形成了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不断多创再多创的企业经营机制。

依靠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以下好处：（1）它跳出了单纯依靠财政拨款搞活企业的框框，走出了一条国家给政策，企业自己创造，多创多留，逐步搞活的新路子；（2）它使企业迅速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主动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不断优化产品结构；（3）它可以合理界定并理顺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得益的关系，使新旧体制转换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减少到最低限度；（4）它可以适应我国企业之间现有机构成、原材料调价、人员素质等方面千差万别的状况，使每个企业都能在现有基点上不断前进；（5）承包本身具有多种可以调节的经济手段，包括包干基数、递增率、承包期、留利分配比例、挂钩比例等等，可以运用这些手段进行调节，贯彻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6）在市场发育不足的情况下，承包制可以弥补价值规律对生产调节作用的不足，加速市场发育过程。随着市场发育的成熟，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承包制也会克服目前“一对一谈判”之类的缺陷，达到规范化；（7）承包制明确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本身就尽可能地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而且，随着企业活力与实力的增强，不断发展跨地区、跨行业，甚至跨国经营，就会冲破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加速政企分离的过程；（8）承包制促使企业不断追求高效益，必然不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把先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五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后，七月份，国务院下发 40 号文件，正式批准进一步扩大首钢自主权，包括投资立项权、外贸自主权和资金融通权，十

二月份，首钢成立了华夏银行。首钢在 1992 年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至十月份，钢产量完成 444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0%，钢材产量达到 35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29%，预计全年销售收入为 126 亿元，实现利税 39 亿元，实现利润 32 亿元，出口创汇 3.5 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增长 37.85%、33.29%、35.59%、66.6%。首钢在今后的发展中，将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规划北京地区首钢钢产量 1994 年达到 1000 万吨，还将用 5 年的时间在山东济宁地区建成年生产 1000 万吨钢模的齐鲁钢铁基地，成为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

首钢改革的成功实践，不仅对搞活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意义。（1）首钢改革是首钢人解放思想、敢闯、敢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两个基本点结合起来的成果；（2）首钢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改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力探索；（3）首钢改革，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高速度、高效益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4）首钢改革，依靠承包制转换了企业的经营机制；（5）首钢改革，实现了劳动者当家作主，一切依靠群众自己创造，冲破了一切“等靠要”的旧的思想观念；（6）首钢改革，通过按劳分配，使职工走向共同富裕；（7）首钢改革，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性，正确处理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得益的关系以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实现了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良性循环；（8）首钢改革，实现了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发展战略，使企业向国际化经营；（9）首钢改革，加强了职工智力的开发，提高了职工的素质；（10）首钢改革，实行了生产科研一体化，加速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11）首钢改革，实行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12）首钢改革，保证了党在企业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总而言之，首钢改革对于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次有力的探索。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首钢改革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和希望。

## 4.2 上层建筑改革：兵临城下

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要求上层建筑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同时意味着对上层建筑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上层建筑机制、体制问题是旧体制一切弊端的总病根。在整个改革的进程中，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审时度势，对上层建筑进行适时适度的改革，否则就会贻误改革时机，葬送改革成果，触发社会矛盾。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我国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首钢改革成功的经验表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关键在于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确立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改革政府管理企业的方式。政府管理部门必须从过去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来调节经济，指导经济运行，本着“宏观管好，微观放开。”的原则，做好规划、协调、服务、监督，不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可是目前的状况仍然是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造成“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和“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扭曲现象，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政府机构的主要问题有：

(1) 机构多，层次多，人员多，领导多的四多现象极为严重。目前国务院有 42 个部委，19 个直属机构，8 个办事机构；16 个由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共 85 个。国务院的非常设机构有 85 个，机构臃肿重叠，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行政效率极低。人员多也是我国政府机构的一大特征。据统计，1979 年，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为 1500 万，到 1991 年底，“吃财政饭”的人员已近 4000 万。人员多，领导也多，官兵比例失调、官多兵少，有官无兵的现象在政府机关广为存在，机构严重超编。目前，我国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局)级机构平均每个省超过中央编制部门规定的机构限额 16 个左右，全国地区。地级市和县平均分别超限 20 个，15 个、10 个左右。

(2) 行政经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份额不断加大，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据统计，1980 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为 66.8 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5.5%；到 1990 年，已达到 333.5 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9.7%。行政管理费在 10 年中以年均增长 17.4% 的速度上升，大大超过了同期国家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11.6% 的速度，真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3) 机构职能配置不合理，条块分割严重，政企不分普遍存在，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建国以来，国家始终未对各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分析界定，尤其是未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各政府部门职能进行理顺和合理配置，结果机构设置过多，职能分工过细，职能交叉重叠现象严重，一个企业往往有几十个“婆婆”管着它。如企业生产技术改造，既有上级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管理，又有上级专业主管部门管理，这种职能机构既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又造成了政府部门间的扯皮推委。而且各政府部门为便于管理企业，硬性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构，配备人员，导致政企同构，政企不分，

企业机构与政府机构同步膨胀。政企同构又使政府干预企业更直接、多样。再加上条块分割严重，不仅行政效率难以提高，而且企业也只能面向政府而难以面向市场。

企业没有多少经营自主权，而政府部门集中掌管着奖金、物资、分配以及项目审批、产品进出口等大权，这是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发生困难的关键所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上层建筑机制，改变企业办事天天围着政府机关转的状态，已经到了关系到我国改革成败的关键时刻。改革已进入了向旧体制的最后堡垒突破的攻坚战，兵临城下，势不可挡。

上层建筑机构和结构的改革，首先应当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变官本位为“人民为本”，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其次，上层建筑的机制和结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三，政府机关也要实行责权利相结合，使政府机关每个工作人员不仅要有权，而且要有责，并严格考核，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实行赏罚分明的考核制度，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政府应该管什么？企业应该管什么？

对政府来说，“宏观管好，微观放开”是一条根本原则。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政府部门必须解放思想、放下架子、简政放权，从抓微观、办企业中解脱出来，管好宏观。

宏观方面要管理的事情很多。诸如：培育和完善市场体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打破地区、部门分割和封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区域布局规划，调节和控制经济总量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多方筹集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交通运输困难、邮电通讯不畅等老大难问题，为企业生产经营排忧解难；建立和发展经济信息、咨询、诊断、技术培训等各类社会服务组织，为企业经营决策、技术进步和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加强内部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务；承担社会职能，办好社会公益事业，解决企业职工的生老病养和职工子女的入托、上学、就业等困难，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和沉重负担；加强审计检查，运用经济杠杆、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促使企业遵纪守法。

微观方面的事，让企业自己去办，赋予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学会游泳，发展壮大。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这些都涉入到上层建筑里的改革，邓小平讲，这是上层建筑的机制、体制改革问题。

作为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邓小平在提出改革的时候，自然也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就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除了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任务和方针外，这篇讲话还提出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的著名论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改革干部制度等方面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2年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宪法，对国家政权机构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更加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从1986年到1987年，邓小平多次对政治体制改革发表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

——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第一，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第二，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精简机构，这同下放权力有关；第四，提高效率。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的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我们中国大陆就不这样搞，我们还是搞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制度。

1992年，当改革大潮新起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上层建筑体制改革问题，再次成为这次大潮中的焦点问题，精减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立即成为改革的主要议题。这是因为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体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增长与活跃，经济体制的革故鼎新，必然会向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当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模式时，就等于宣布建立在计划管理体制之上的上层建筑也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建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模式。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庄严宣布：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阻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在，全国涉及3400万机关干部的精简计划已经制定，中央政府的精简方案已经出台，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将分步实施，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已经开始，旧体制成为被包围的城堡。

### 4.3 确定改革目标：市场经济

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就没有改革的行动。然而，我们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我们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在经过 14 年的艰难探索之后，我们终于认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模式。1992 年，把这一目标模式写进了十四大报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这是中国改革进程的里程碑，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我们从哪里来？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来。

我们到哪里去？

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去。

199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庄严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此，中国的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国这条大船将从传统的封闭的港湾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

市场经济，历史的选择。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中国，才能使中国走向富裕和文明；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生产，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经济，它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后者是与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的经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较有效的方式，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供求变化。价格信号和竞争功能，较好地促使资源从效益较低的地方、部门和企业流向效益较高的地方、部门和企业。之所以改革十多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全国快，而沿海地区的广东又比其他地区（如上海）发展得快，是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度不同。广东 14 年来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2.6%，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广东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全省经济的大发展，我们再放眼世界，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独霸世界，60、70 年代日、德经济的复苏与腾飞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无不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由于长期坚持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窒息了经济活力，难以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这是社会主义之所在这些国家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国农村改革为什么能够取得很大成功？如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农民经营自主权，使农户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乃至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城市市场，如果没有农副产品价格和流通的逐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异军突起？如果不是依托在改革中形成了的包括原材

料、产成品、资金、劳务、技术和信息等在内的市场，如果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组织和生产，乡镇企业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蓬勃发展。

经济特区为什么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如果没有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一句话，如果不是率先让市场机制发挥主要的调节作用，放手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特区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满生机。

首钢为什么能飞速发展，前景广阔？如果没有国家赋予首钢的承包制，明确划分企业与国家的责权利界限，给首钢以相当的经营自主权，首钢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为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特大型企业。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建立起工业基础之后，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它的决策过于集中，基本上用行政指定分配资源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  
求，压抑了经济的活力，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事实无情，历史无情，我们只能正视现实。因此，进一步把市场取向的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集中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成了我国 9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方向。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必然趋势，已被历史无可选择地推到我们的面前。

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经常教导我们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

然而，改革以来的实践打破了这种理论教条的迷雾。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著称，邓小平同志在 92 年初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一历史性谈话冲破了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姓“社”姓“资”的理论怪圈，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这一突破是颇有勇气的，也是颇为曲折的。我们不妨作点回顾。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也就必然要求改革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应当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82 年 9 月，十二大报告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

1984 年 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始进入角色。

1987 年 10 月，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计划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

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

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对于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推动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一理论提出来之后，对于究竟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的理解很不一致。对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命题，有的强调“商品经济”的一面，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有的强调“有计划的”一面，继续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虽然大家都同意计划与市场要结合，但有的人认为计划是主要的，市场是次要的；有的强调市场调节是第一性的，计划调节是第二性的。实践中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因形势变化而有个同，有时偏重于市场，有时则强调计划。由于担心市场搞多了会引向资本主义，所以对改革的“市场取向”，往往发生疑虑，甚至有时斥之为资本主义，致使改革迈不开大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命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没有最终明确计划与市场谁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或主导性方式，因而难免影响人们的认识，模糊改革的目标。

邓小平同志 92 年初南巡谈话使我们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引导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一个更新的境界，一个更深的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

——它明确了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市场经济活动是基础性的，市场机制起着主要的作用。计划主要是补充市场的不足，矫正市场的缺陷，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远景目标，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协调的环境。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现有的计划体制。

——它明确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基本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彻底摘掉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跳出了姓“社”姓“资”的理论怪圈。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们都只是手段。

——它明确了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吸取发达国家依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先进经验，努力改善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它明确了改革的范围。改革不能搞单项突破，而必须全面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改革必须有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市场主体——企业，完善市场组织——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定市场规则，转变政府职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有力地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就能与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靠拢，就能够比较好地加入到国际社会分工与市场竞争体系中去，加强同国际经济活动的衔接，使经济贸易往来按国际惯例办事，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使我国能够跻身于经济发达国家行列。

——它突破了市场经济必然以私有制为基础，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

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然市场经济既不姓“社”也不姓“资”，那为什么还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这并不是说市

市场经济本身姓“社”，而是说，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有它的共性，也有个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的基本特征，如：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的覆盖之中，市场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市场的运作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来实现的；参与市场的主体（即各类企业）都具有进行商品生产和经营所应拥有的全部权力，是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对市场并通过市场对企业进行调节；此外，还要有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科学、严整的市场法规和反应灵敏的市场信息。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我国的国情特色，因而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第二，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成分为补充，不同所有制形式可以用不同方式组合经营，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的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第三，在分配制度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同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四，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长处。第五，社会主义国家还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注意商品交易和市场竞争中的职业道德。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

第一，要抓好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特别是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采取不同方式理顺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大力培育市场，健全市场体系。不仅要发展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而且还要培育资金、劳务、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各种要素市场。要坚决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状态，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特别要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尽快建立能够灵敏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正确发挥资源配置导向的、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体的价格信号系统。还要建立一套规范的、科学的市场规则和管理制度。

第三，改革宏观管理体制。要建立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关键在于精简政府机构，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金融体制、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都要进行全面改革，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企业改革、市场改革和其他方面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都难以真正深入。

第四，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

社会主义中国的航船开始冲出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港湾，驶向市场经

济的汪洋大海。

#### 4.4 前无古人的事业：第二次革命

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站起来；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要使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富起来。政治上站起来为经济上富起来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经济上富起来则为政治上长久地、坚定地站起来提供保障和支持。站起来之后富起来，这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也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比较起来，自我革命、自我更新、自我否定，是第二次革命的显著特点，也是第二次革命的最大难点。第二次革命已经进行了14年，花费的时间超过了“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用的时间之和，作为改革对象的旧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因此，完成第二次革命，任务更加艰巨，道路更加漫长，意义更加伟大。

近代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封建军阀的割据，以及这两种势力的集中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凶残压榨，使社会生产力一直处于笨拙、滞呆、停顿，甚至倒退状态。人民生活日趋恶化，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消灭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势力，解放了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但是，由于历史的思想的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为生产力迅速发展提供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没被充分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所设置的重重阻力，还在堵截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智慧，惊人的胆力，提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举国欢庆，盖世瞩目。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新的、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这场革命，仍然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它基本上是靠扩大市场的作用开道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市场的作用每扩大一步，改革开放就加快一步，经济发展水平就再上一个台阶，人民生活就得到一次新的改善。我国的改革是靠市场的作用“发”起来的。

与计划经济脱轨，走向市场经济，本身是一场革命。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则是“看得见的手”。当今世界各国，都是两手并用。市场并不排斥计划，计划也不否弃市场，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导向，计划经济以政府为导向。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却把市场经济视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一概拒斥；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概要由国家的经济计划，取代市场。它必然突出权力、意志、愿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政府用直接的强硬的“看得见的手”、人格化了的意志和愿望，捆住生动的、灵活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于是，出现了权力崇拜、个人专断。现在，在改革的大浪潮面前，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冲击下，公开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在各级政府、各个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尽管寥寥无几。但是，他们之中，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利令智昏、占取权位、逐谋私利者。后一种人占据了领导地位，就要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阻碍、反对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收益以其效益为准绳，计划经济则以权力为准绳。权力大，收益大；权力小，收益小。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权分配。权力不仅标志着个人的社会地位、荣誉、人格，而且标志着个人的富有程度，智慧才能。权力越高越大，越受到人们的崇敬，越能以自己的意

志和愿望，堵截历史的客观进程，计划经济的社会机制，把人们引向权力追逐，人们不是看市场的行情，而是看权势人物的面情，本是以自己的创造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获取社会报酬，而是以迎奉吹捧上级，讨取上级的欢心怜悯，获取权利，谋得利益。

改革必然要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发生冲突，有的机构要精简或撤消，有的政府权力要削弱或转变，有的人官位要丢掉，有的谋利渠道要被截断，遇到消极抵抗，甚至迂回反对，是不可避免的。其例之一，是强迫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由他们管辖的企业为他们服务。成立翻牌公司，变换形式，权力经商；其例之二，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造成市场分割封锁，贸易壁垒重重，关卡税收林立，分平竞争，多元化全方位的市场体系遇到阻力；其例之三，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造成市场的信用危机，破坏市场的经济秩序和道德伦理。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竞争的威力和潜力，最终不仅要使弄虚作假者失败，而且要使改革前程和民族尊严受损。以上所举三例，都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路障，这些路障，归根结底，都导因于权力。

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的对象不是手拿武器的敌人，而是手秉权力的同志和朋友。政府是改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和射击目标，政府工作人员是改革的动力，也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如果政府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进行廉政建设，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会促使这场自觉革命的成功，否则，这场革命将会遇到困难，甚或失败。

马克思曾经预测：“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社会的绝对方面”高居于社会之上，力图世代相传不变，这是封建时代皇权至上的思想，这种思想，要求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得遵照皇帝的旨意，皇帝是“社会绝对方面”，皇帝以下的人，只有听话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更没有自我行动的自由。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政权，集中一切，统管一切。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会成为这种妄图永恒不变的“绝对方面”。它能自觉地革自己的命，自我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仍然保持着革命的旺气、革命的朝气，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不消灭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私有制，无产阶级就得不到最后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国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政府的权力机构首先从经济领域然后以经济为中心进行政治体制的革命。不过，这种政治体制的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也不是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敲锣打鼓，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而是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变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产品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由小生产转化为社会性的大生产，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不是一有商品，一有商品交换，一有市场出现，就是市场经济。只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和生产运行基础性调节机制时，才可称作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经历了大约四、五百年，其间有泪有血，有痛苦有悲伤。小生产者农民离家弃舍，颠沛流离，小手工业者抛弃自己的手工工具，四处寻找工作，贫困、失业，乞丐。娼妓，疲惫不堪的体力消耗，饥寒而死的尸体横躺街头随处可见。由于卫生条件恶劣和工业污染的孳生，引起了传染病的流行；由于城市里住房拥挤，破旧危损，人们露宿街头，偷盗、凶杀、抢劫，曾经

泛滥社会。人们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逐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搞市场经济，企图不遭受任何痛苦和损失，任何社会灾难和人间不幸，一帆风顺地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太现实的。但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建立市场经济的，并且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绝不改变，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以自己所掌握的国家作后盾，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是可以减少社会灾难，减轻人间不幸的；痛苦和损失，也可以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但是，第一，公有制要同市场经济结合，就得改变原有的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经营机制，寻找在市场经济中自己的实现形式；第二，国有企业在进入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它原来独享的政策资源，将逐渐失去，只能与其他经济成分一样平等地参与竞争；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生产、销售、价格，必将放开，必将退出计划经济的渠道，这就迫使企业必须自己寻求市场经济的渠道；第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不是以欺诈、贿赂、回扣为竞争手段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排斥计划的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既要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文明成果，又要排除它的私有制属性，既要达到现代水平的市场经济，又要具有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有两大特点，第一为等价交换，等价交换为有独立利益追求的企业所接受。但是，补偿各个企业的个别消耗，却不是等价的，就是说，在等价交换中，社会只承认社会必要劳动的消耗，不承认不同企业的个别消耗。这就逼使各个企业以社会必要劳动力目标值，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竞争机制，竞争机制不仅给企业提出了外在的压力，逼使企业改进产品，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逼使企业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因此，市场经济的动力，是人，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才能，给人作人的权力，是对人的一次大解放，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历次社会革命都是解放人，这次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全格局的解放人，把人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奴隶，解放为主人，解放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

有史以来的中国，尤其在封建社会，人只不过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是政治家体现自己意志，完成自己愿望的一种手段。人，一旦进入市场经济，其价值、作用、智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显现出来。市场选择着人，人也选择着市场。通过选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也就反映出来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施才、用才、尽才的社会机制。社会主义制度是防止以至最后消灭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法则，将把人置于真正的平等地位，使人变成真正的人。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革命，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创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 第五章 经济搭上快车

商务盛，则交涉得手，国势自振，其明效若此。

——张之洞

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善民之大径，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其中矣。

——康有为

## 5.1 经济中心的时代

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为12.8%，进入快行轨道。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建设迈了一大步，上了一个大台阶。1949年以前，我们是以战争为中心。与敌人生死搏斗是生活的重要内容。1949年以后，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政治运动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真正在实际中完全实现。1992年，我们真正迎来这个时代，中华民族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刷新了生活内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变化。

1992年，我国经济猛踩“油门”，搭上快车，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无前例的高速度，这是全世界注目的高速度。

农业全年农业增加值5,808亿元，比上年增长3.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2%。主要农产品产量中，粮食总产44,258万吨，比上年增产740万吨，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甘蔗、烤烟产量创新纪录，分别为7,252万吨、314.2万吨，比上年增长6.8%、17.8%，蔬菜、水果再获丰收，全国造林面积8,897万亩，比上年增长6%，畜牧业比上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猪牛羊羊肉出产2,933万吨，比上年增长7.7%，牛奶501万吨，增长7.8%。渔业生产再创历史纪录，全年水产品产量1,546万吨，比上年增长14.5%。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非农产业经济比上年增长36.9%。

工业和建筑业全国积极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改革向广度、深度发展，市场机制明显强化。加上投资需求迅速回升，有力推动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0,116亿元，比上年增长20.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占国内生产总值42.3%。其中，集体所有制增长28.5%，“三资”企业增长48.8%；非国有工业增加值的增量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61%；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七个省区新增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60%；全国国有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4%，大中型工业增加值增长15.5%。轻工业增加值5047亿元，比上年增长20.9%，重工业增加值5069亿元，增长20.7%。

全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1,392亿元，比上年增长18%。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经济效益全面回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20.4%；房屋竣工面积一亿平方米，增长2.5%。企业亏损面由上年的15.9%下降为13.9%；资金利税率由15.5%上升为6%，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带动了建筑业的迅速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其中，国有单位投资5,106亿元，增长40.7%，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1,233亿元，增长76.7%；居民个人投资1,243亿元，增长5.1%，在国有单位投资中，基建2,911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更改1,419亿元，增长38.6%，商品房485亿元，增长93.5

%，其它 291 亿元，增长 22.1%。其中，中央项目投资 1'892 亿元，增长 24.7%，地方项目完成投资 3,214 亿元，增长 52.2%。这些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33.6% 上升为 38.2%，其中运输、邮电业投资比重由 14.4% 上升为 16.4%。

1992 年，全国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基建项目 115 个，大中型项目单项工程 120 个；限额以上更改项目 121 个。基建新增生产能力：煤炭开采 2,065 万吨，发电装机容量 1,233 万千瓦，石油开采 1,513 万吨，天然气开采 15 亿立方米，铁矿开采 125 万吨，木材采运 22 亿立方米，水泥 190 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运营 476 公里，铁路复线交付运营 323 公里，电气化铁路 939 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 4,526 万吨，新建公路 2,376 公里。

国内商业和市场物价流通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购销两旺。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0,8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9.8%）。消费品零售额 9,613 亿元，增长 16.6%；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 1,281 亿元，增长 9.5%。在消费品零售额中，城市 5,3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9%，农村 4,227 亿元，增长 12.8%。

生产资料市场购销两旺，全年全国物资供销企业购进生产资料 5,5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7%，销售 5,891 亿元，增长 39.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23.5%。

1992 年，提高了粮食购销价格，出台了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等基础产品和部分公用事业的价格改革项目，不少城市放开肉禽蛋、蔬菜价格，扩大了市场调节的比重。在生产资料销售中，市场调节部分已上升到 70% 以上，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市场调节部分已上升到 90% 左右，社会市场物价总水平涨幅在宏观调控的目标之内，但城市物价涨幅较大，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涨幅偏高，在 6.4% 以上，其中 35 个大中城市达 10.9%，零售物价在 5.4% 以上，其中粮食 24.3%，服务价格涨幅 13.4%。

对外贸易 1992 年出口总额 85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8.2%，进口总额 806 亿美元，增长 26.4%，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已上升到 80%，进口中，国内紧缺原材料及机械运输设备明显增加。“三资”企业出口大幅度上升，出口额 17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1%，其所占出口比重由 16.8% 上升为 20.4%。

1992 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 68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5 倍，实际利用外资 188 亿美元，增长 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 575 亿美元，实际投资 111.6 亿美元，分别增长 3.8 倍、1.6 倍。92 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 8.4 万个，比上年增加 4.7 万个。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金额 6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5%，完成营业额 28 亿美元，增长 18.5%。旅游外汇收入 39.5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8.7%。

人民生活 1992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 1826 元，增长 18.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84 元，增长 10.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5.9%。全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 3,8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职工平均工资 2,677 元，增长 14.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5.3%。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1,54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437 亿元，增长 26.8%。居民购买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的意识逐步强化。

由国家管理的生产资料价格、交通运输价格由 737 种减少到 89 种；工业指令计划缩小到 16.2%，东南沿海区已低于 10%；新增规范的

大型生产资料市场 20 多家；新发 1,200 多亿元的债券和股票；综合改革试点县已达 350 个；新批准开放了 5 个沿江城市、18 个省会城市、13 个沿边城市，先后批准 34 个口岸开放；为了“复关”，降低了 3,371 种进口产品关税，取消了进口调节税。

我们无意于再开出一些数字清单，仅这些已足够了，数字是冷冰而枯燥的，而卡实却是活生生的；现象也代替不了本质，但准也不能抛开对现象的分析而能得出实质性结论。我们从以上所举事例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在世界经济发展只在 2% 以内徘徊时，正显示出中国经济已搭上特快列车。

勿庸讳言，我国经济运行仍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财政窘状仍无根本改观，在建项目过多，通货膨胀压力很大。但“发展是硬道理”，特别对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没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便没有综合国力的增强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明乎此，“发展”几乎调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当我们抛开这些僵冷的数字，走进火热的生活时，我们感觉到的是兴奋、惊喜、赞誉和一丝困惑。真实的感觉只是昭示了一种存在及现实，粉饰太平将会失却理智，逃避现实则会停止思维，情感的欢愉也不能代替理性的痛苦。当我们把笔端触向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时，无论是对成绩的肯定还是对存在问题的揭示，都是极为苍白的。我们只希冀这点点墨迹，能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侧面，展示出经济中心时代到来的强烈信息。

## 5.2 全民族的狂热

大跃进时期，全民大办钢铁，想在几年内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狂热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幼稚；十年浩劫，对阶级斗争、个人崇拜的狂热，表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愚昧。1992年出现全民族的经济狂热，表明我们这个民族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愚昧走向文明。和以往民族狂热比较起来，经济狂热是一个历史进步，因为它毕竟使我们从天国回到人间。但是，在这次狂热中，教授卖馅饼现象令人尴尬，造成逻辑混乱和角色错位；官商借机泛滥，令人发指；腐败没有及时铲除，国人担忧；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等现象相继出现，完全与我们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宗旨相悖。这一切都在呼唤，我们必须迅速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秩序。

在我们迈入经济中心的时代，整个社会生活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情绪围绕经济建设燃起了一团火，出现了全民族的经济狂热。

开展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拍卖热，各种各样的“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下海、经商、练摊、做生意，成为人们最普遍的热门话题。官员下海、艺人下海。作家下海、教授下海、博士下海，各行各业的人士纷纷争当赶海的弄潮儿。商店、公司、企业、市场，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犹如雨后春笋成批涌现。张贤亮下海。刘晓庆下海、“刘三姐”下海，海潮逐浪高。青年人经商、中年人经商、老年人也经商，经商者与日俱增。工农商学兵变成了工农兵学商。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民主革命时期是你死我活的战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场，现在则变成了亿万人民参加经营的大市场。

座落在北京颐和园后面的中央党校，素有“马列花园”、“中共血库”之称，在这座大院里，每年要有数千名中共高级干部在这里培训，这座大院的三个门口昼夜二十四小时有军人持枪守门，门口不时有中央各部委和省市高级干部乘坐的高级轿车出出进进，三个门口均不挂任何牌子，院内肃穆庄严，壁垒森严，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屏声静气，中央党校成了一个神秘的大院。可是，1992年，这里的神秘气氛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走了。宽敞的大礼堂和课堂里开始举办各种形式的展销会，从各省市运来的产品、商品、展品涌进中央党校，厂长、经理、推销员也来到这里，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占领了过去的教室，商品交易、市场竞争打破了宁静的校园，叫卖声与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短短几个月内，中央党校院内建立了好几个“跳蚤市场”，成立了十几个公司，有的公司居然把生意做到了莫斯科。

人民大会堂，这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堂、殿堂。自从50年代末这座雄伟的建筑物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后，一直充满神奇的色彩，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举行重要活动、召开重大会议外，普通人对她只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如今，人民大会堂成了对外开放的场所，迈向市场，卷进了商品经济的海洋。除了接待游人供人们参观外，还通过租借等形式，承办各种商业活动，由封闭型管理变成开放型管理，由消费单位变成赢利单位，过去每年需要国家财政拨款几百万元，如今每年上缴国家几百万元，1992年，总收入3000多万元。

北京大学，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古老学府，曾以知识的殿堂在世界赫赫有名，在中国首屈一指。今天推倒南墙 600 米，提出“沿边开放”新思路，兴建以高科技为主的市场一条街，用新的校园格局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中国的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个单位、每个角落，都在接受滚滚热浪的冲击，每个人，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不管是已经下海，或是准备下海，或是不想下海，都在接受海风的阵阵袭击。全民经商的浪潮惊涛拍岸，整个民族都被卷在大潮之中，这是全民族的狂热。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全民族的狂热。“五四”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威胁和丧权辱国的封建王朝的腐败面前，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绪，点燃了全民族对外反侵略对内反腐败的熊熊烈火，引发了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爆发了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这次大革命，对中国社会震动之大，触动之深，影响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这是因为它是整个中华民族以全身心的投入而形成的伟大运动。建国之初，我国曾经有过大跃进的年代，这也是一场全民族的狂热，人民群众在刚刚获得解放，做了国家主人的时候，有一种极大的热情，冲天的干劲，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要把生产搞上去，全民动员，大办钢铁，大办农业，要在几年时间内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次狂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幼稚性，表明我们对经济建设规律的缺乏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陌生，对我们进入新的生活领域缺少准备和必要的知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全民族的狂热，几千万红卫兵涌向北京，天安门成为“小红本”的海洋，全国大串连，全民每天都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晚都做“三件事”，老少都背“老三篇”。十亿人口连续十年的政治运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次全民族的狂热以反修防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为出发点，结果演成一场全民族的大悲剧。十年浩劫，十年内战，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把中华民族带入空前的灾难。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个人崇拜，树立偶像，封建余毒残渣泛起，极左思潮达到极端；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倒退。比较起来，1992 年，我们国家出现的全民族的经济狂热，是我们民族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因为这次狂热，毕竟是在脚踏实地从事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开始务实，开始办实业，我们开始从天国回到人间。

狂热，是情绪的凝聚，是情绪的燃烧。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社会进步，都是通过整个阶级、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情绪凝聚而实现的。然而，情绪燃烧后的狂热，往往会失去理智，对事物缺少深思熟虑，对社会造成危害，产生不合理现象。1992 年，中国出现的全民族经济狂热，人们在欢呼经济中心时代到来的同时，也为在这次狂热中出现的许多其他现象忧心忡忡：在下海大潮和经商热扑面而来的时候，翻牌公司乘机大量出现，官商这一怪胎相伴而生；教授卖馅饼现象令人尴尬，第二职业冲击正常工作秩序；腐败现象没有得到遏制，令国人担忧；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相继出现；市场经济被权力扭曲，缺少法制规范，等等，这一切都与我们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宗旨相违背，同改革的真正含义相矛盾。因此，许多人在大声问到：我们的经济还能热多久，我们的改革还能搞多久，我们的社会要向哪里去？这些问题的提出，都在呼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迅速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秩序。

### 5.3 发展是硬道理

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时告诉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唯有发展，我们才能继续改革，才能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立足。

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面对12.8%的发展速度，有人恐慌，惊呼“过热”。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婆婆当惯了，企业生产什么，发展速度多快，都由长官意志决定。现在放开手脚，快了一点，打破了过去头脑中的计划，似乎就失去管理职能，因此，就有些慌乱，就要防止过热。

12.8%，是病态，还是常态？站在旧体制的角度看，超过了以往的预定的速度，是病态。站在新体制的角度看，旧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就是常态。需要指出的是，前几年的经济过热现象也是由于旧体制没有及时改革的原因造成的。

在经济发展中，怕快不怕慢，怕热不怕冷，怕活不怕死，这是小生产者的行为方式，是计划管理体制的习惯特点。不改变计划管理体制的领导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不能适应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要求，就不能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就不能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各地经济发展时，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龙腾虎跃的场面。各地政府似乎已使出浑身解数，或谋求龙头老大的地位，或不甘落伍，欲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说来难以置信，这一局面的出现也仅仅是观念的变化，或许观念更新是人们认识自我、解放自我的契机。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歌词，它与欧仁·鲍狄埃的名字联在一起。悲壮高亢的旋律是先辈们的愤怒与呐喊，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全靠我们自己”划上了醒目的终止符，他们的血肉之躯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共和国的旗帜在飘扬，悲怆的旋律在回荡，失去锁链的人们惊喜若狂。他们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但遗憾的是，人们精神的解放却阴差阳错地表现为新的迷惘，种种难以置信的行为犹如一只迷途的羔羊，人们几乎以全部的热情（甚至表现为一种狂热）却有意无意地营造着小生产的天堂。这是一场古老而悠久的梦，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以各种不同形式来圆这场梦。《诗经》里的“乐土”梦，孔夫子的“大同”梦，陶潜的“桃花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等等，先辈们都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有饭同吃、有田同耕、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

共和国的成立，客观上能够使“梦想”成为现实，但严酷而沉重的现实惊醒了人们，它无情地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愿望是幸福，途径是劳动，但成果却是贫困。更为严重的是，人们似乎已安于贫困，并把贫困的根源归结为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这是封闭社会中人们所能进行的唯一思维。在容忍共同贫困的情况下，表现为民族创造力的泯灭和普遍的心理不振，中国人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改革的春风复苏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他们才开始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打破“大锅饭”，宣告了新世纪的到来。地方和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职工也不再吃企业的大锅饭。作为一级政权机关，地方政府摒弃了“等、靠、

要”的观念，开始独立自主、富有创造性发展地方经济。

或许人们在担心，中央政府逐渐会丧失其权威性，并因此而形成“诸侯经济”的局面，或许这种忧虑是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现象的分析，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市场经济是独立自主、平等的经济模式，进入市场的各利益主体的地位必须保证，就此而言，它是民主经济，很难设想，没有各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就中央统一政策而言，很难照顾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是削足适履以保证统一政策的施行，还是因地制宜以发展地方经济？答案是最明显不过的了。

1992年，各地经济发展无疑是最为火爆的时期，这不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而且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发展实践的充分肯定。人们在思考，如何在更短的时间使经济迈上新台阶。

小平南巡时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主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良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分析所做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正确把握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建国以来，我国有过高速发展、效益较好的时期，也有过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时期，成功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正确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的是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经济破败不堪，社会生产混乱不堪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国家治理好绝非易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较快地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使全国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谱写了共和国最初年代的辉煌篇章。当时，我们面临的任務是多方面的，要完成民主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任务，要荡涤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要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敌人的破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党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在完成了各项任务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稳定。这是发展中的稳定，是在经济生活得到妥善解决基础上的稳定。

正是由于建国初期我们正确处理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才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勃勃生机。令人惋惜的是，我们没有把这种局面保持下去，5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重大失误，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用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失去了原来较好的发展势头，失去了大发展的机会，也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和条件。所以，紧紧抓住经济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获得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唯一前提。

在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显示出对比关系。社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必要的稳定与协调，暂时的相对平衡，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不是无条

件的。而发展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稳定和协调都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是实现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如果把稳定从发展的链条上摘取下来，隔绝开来，甚至把稳定看成是和发展对立的东西，这便是一种误解。这就容易使人们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使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丧失开拓进取的意识和能力，丧失大发展的千载良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巡视的重要讲话，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发展速度出现了一次大飞跃。

12.8%，这个速度是病态还是常态？站在旧体制的角度看，超过以往预定的速度，就认为是病态。于是，有的人感到惊慌，大声呼喊，要防止过热。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婆婆当惯了，企业生产什么，速度有多快，由长官意志决定，现在放开了手脚，快了一点，打破了过去所谓的计划，似乎剥夺了某些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因此，有人就有些慌，就提出了防止过热。但是，如果站在新体制的角度看，旧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我们的社会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出现12.8%的速度，这就是常态。这种高速度、大发展，同大跃进时期不顾客观规律盲目蛮干，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指出的是，前些年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旧体制没有及时改革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经济要发展，要上新台阶造成的。面对我们民族大发展的机遇，在有可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敢迈大步，不敢登新台阶，这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思想反映，这是旧的计划管理的体制形成的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改变计划管理体制下形成的领导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不能适应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就不能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就不能有效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5.4 第五条龙

1992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全国进入经济挂帅的时代，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再一次走到了新世纪的门槛，一个不屈的灵魂正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不但可以不被开除球籍，而且增强了成为亚洲第五条龙的信心，看到了太平洋世纪的曙光。中国能否成为亚洲的第五条龙，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1992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我们无意对这一年评头论足，只需勾画出基本格局及其转变的侧面，而仅是这一点便足以让国民激动，让外国人瞠目。人们对这一变化的基本评价，宣告了我们又走到了新纪元的门槛。

历史永远记载着50年代前期的辉煌，英明的共产党人和勤劳勇敢的炎黄子孙，面对昔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封锁和高压的局面，他们没有退缩，毫不畏惧，用事实告诉世人：一个不屈的灵魂在创造着人间奇迹。

没有痛苦、没有走过弯路的民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民族。问题在于，不是在挫折中消沉、颓废，而是在惨痛的经历中奋起。中华民族又在失败中崛起。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国人以其饱满的热情在构建一幅“理想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利用了这股热情和干劲，这是对民族精神的亵渎。人们感觉到的不只是自己追求理想途径的失当，更有被愚弄的屈辱，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令人难以容忍的了！！

1978年，一场恶梦终于被惊醒，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新纪元的开始。我们并不害怕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烂摊子。尽管它使我们不得不拖着沉重的翅膀，我们所面临的唯一选择是一个字：干！而不是怨天尤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已从濒临崩溃中站了起来，一步、两步、三步……艰难而英勇地向前走。

或许我们没有经验，或许共和国再也经不起大起大落“抽筋”似的折腾，或许改革本身便是对利益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以极不情愿的姿态对待改革，或许改革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它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总之，改革充满着艰辛。它荡涤着每个人的灵魂，中华民族面临着超越自我、解放自我的艰巨任务。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其进程与结果不但改变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重塑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更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东方睡狮梦醒之日，便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之时。无怪乎一些专家预言，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们没理由固步自封，更没有资本沾沾自喜。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再次给了中国人一次机会，这足以让中国人了却心愿，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所作的也仅仅在于成为一名命格的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不致于被开除“球籍”。

1992年，又是极为平凡的一年，历史只会把这年作为参照系，回溯或是展望。

150年前，《南京条约》签定了，中国丧失的不仅仅是白银，更重要的是机会，受到重创的不是经济失去独立性，而是民族心灵的屈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中国人必须确立的观念，它是人类和生物进化的规律，“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但中国上个世纪的巨变毕竟不同于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它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冲击，“以夏变夷”的修复机制再也维系不了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明智的政治家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西方先进的技术、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救国图强”成为其活动的轴心。他们能够虚心地学习西方，引进技术，开办工厂，创办新式学堂，改革政治制度。不管这些作法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是完全彻底的还是遮遮掩掩的，是封建政府的卫道士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开路先锋，他们都试图从“侵略者”的武库中寻求解放自己的物质及精神武器。甲午海战的惨败告诫人们，仅靠物质、技术改革并不能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百日维新”六君子的鲜血惊醒世人：专制政府不可能使中国步入现代化，而通往富强之路是用鲜血铺成的。

站在1992年的门槛，150年后的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怕是最伟大的预言家恐怕也不敢自信地勾划那个时代的蓝图。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当这位东方巨人从睡梦中醒来，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眺望未来时，或许我们的种种设想已是极为苍白而无力的。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今天。

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指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犹如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力兴奋剂；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勾划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一年，各部门、各地区积极性空前高涨，改革开放步伐全面加快，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中华民族增强了成为亚洲第五条龙的信心，看到了太平洋世纪的曙光。

## 第六章 理论获得突破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

思想活跃而又怀着务实的目的去进行最现实的任务，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情。

——歌德

## 6.1 计划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以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提出的社会主义要取消商品的设想为依据，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存在商品，不能发展商品经济；认为有计划按比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理论教条。继商品经济论之后，提出市场经济论，这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经济规律内在要求和改革进程必然趋势的统一。明确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使改革向纵深发展，更加接近我们的最终目标。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万占常青的。”似可补充说：“理论是扼杀生活之树的，生活之树却永远不会被理论杀死”。就是说，理论一经形式，往往会变成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定式；一有新思想爆闪，它就板起面孔，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衡量新思想，框定新思想，使新思想不能自由发展；它的作用，仅仅是用原有思想框架新鲜思想，使新思想套入原有思想格式之中。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在思想痛苦、挣扎、冲杀中，杀出一条血路，突破原有的思想定式，为新思想开创一条新路，而逐步形成反映自己时代的新思想的。新思想是在拼刺和冲杀中成长起来的，新理论是在眼泪和血路中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在思想痛苦、挣扎、血泪、冲杀中，在反复斗争中，通过长期的历史较量和人们亲身的比较鉴别，为实践所证明了的，为人民所接受的。

早期的资本主义，扮演着双重角色。一、它神话般地促成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二、它给社会又带来了灾难。资本主义早期，农民抛家离土，流落城市街头；手工业者扔掉自己的手工工具，与农民一道，圈入劳动后备大军。社会秩序混乱，乞丐小偷遍起，失业导致贫困饥饿，贫困饥饿引出人间悲剧。暴发户资产阶级却花天酒地，纵欲横行。“初夜权”在封建时代是封建主的一种特权，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则依恃金钱自由具有之。初期的资产阶级以金钱作杠杆，施虐善良，残害无辜，社会道德沦丧，人间感情泯灭，人们身上被榨着血，眼中只能流着泪。资本“它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是人类社会转型期普遍出现的社会灾难。灾难引起悲愤，悲愤激发行行动，行动要求理论。在资本主义尚处于诞生的阵痛时期，就出现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种种丑恶，空想美妙社会的种种幻景。中心内容是否定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否定金钱的作用。乌托邦人用金银制造便溺容器，用贵重金属制造镣铐锁链，谁犯下不名誉的错误，人们就给他戴上金耳环、金链子、金戒子、金盖头。对金钱的呵责，对货币的鄙薄，目的是要排除市场制度。这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早期市场经济的本能反映。以他们看来，只要人们不为金钱所动，借助禁欲主义和平均主

义，实现了公有制，产品社会迅速丰裕，人们的利己之心将会自动消失。后来，直到 19 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付立叶、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内容上有了进展，言词上更加激烈，思想上更加明确；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更加具体，更加细微，更加显得切实可行。但是，都排除市场制度，都从道义上抗议金钱对人的控制，都希望建立一个平等、互助，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损人利己的公有制社会。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是，他们统统是从道德上批判资本主义，并从道德上构幻未来的社会主义图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恩格斯曾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付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他们的道德观，并且继承了他们的道德观，但是，没有沉溺于如空想社会主义所陷入的道德世界幻想之中。他们力图从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中，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及其所遇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中，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经济制度的变迁归之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提出实现所有制关系的社会化才能适应生产力社会化，思路是正确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实。但是，一旦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所占有，实现了公有制，是否还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公有制能同市场经济并存吗？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上的。他们讲过，社会主义能够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物质资源，调节和平衡生产进程，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是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这种社会生产组织，不需要商品、贸易、货币，只需要通过行政的手段，采取指令的办法，进行实物分配。

一种经济体制能否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看它能否提供更高的生产率。以预定计划作为基本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提供较之市场经济更高的生产率。这就迫使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不得不从实践中接受教训，重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利弊得失，并寻找两者的结合点。

市场是以商品为前提的，商品是以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讲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列宁当年提出“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

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不是与计划绝然对立的。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还很远很远，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的作用，在生产和分配活动中，概由政府预告制定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行，不仅要损害生产者、企业、事业的积极性，而且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因为，计划经济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缺乏信息机制，二是缺乏激励手段。它否定竞争作用，否定社会制约。如果政府掌握足够的供求信息，并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作保证，实行计划经济也许是有效的，但是，这是无法办到的。特别像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文

化又落后，实行计划经济，理论上可以设想，实际上难以行通。实践也证明：当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至于激励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决策由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中央计划机关集中作出，并通过各级政府组织起来的全体社会成员加以执行，这就要求社会各个成员没有自己的特殊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个人没有自由，个人像装入麻袋中上豆一样，任由他人运转。但是，事实上是不可做到的。即使是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的中央各个部门、地方各级政府，也会因“利益”而发生纠纷，相互扯皮，扭曲计划，偏离目标，消耗不可计数的人力、物力，却难以达到计划经济所追逐的目标。再加它无视竞争机制，社会制约，必将把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引向僵硬，陷于笨拙。

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下农业小生产者的产品经济而讲的。在自然经济下的农业小生产者，不是为出卖而生产，而是为自己消耗而生产。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不是作为商品，到市场上交换，而是作为产品，糊口养家。它只能在自己的家庭范围内，自我生产，自我满足，在社会范围内，没有竞争也不承担风险。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使用同一工具、同一操作方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随着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重复生产，圆圈式的循环往复。因此，生产停滞，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者愚昧保守，痴呆孤寂，世世代代，生产力只能停留在大致同一的水平上。

我们可以设想，能否继续维持这种田园风光，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但是，历史不允许。近代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踢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商品经济冲击着中国原有自然经济下的产品经济，农业凋弊，民族工业又难以抵挡资本主义先进的工业商品入侵，古老文明的中国，陷入灾难、痛苦、呻吟之中。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看到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国过去没有出现，现在也没有出现，即使出现了，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各国那样，认为在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展社会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后，商品经济将立即取消，也只是一种设想。而且存在着一个理论缺陷，它是从成分——收益分析中作出计划经济结论的，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的缺陷是只有生产成本，没有交易成本，它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技术特征。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内的、区域的、国际的）表明：人们之间进行交易活动，是要付出一定费用的，其中包括信息费用、相互合同费用，检查监督费用和防止投机费用等等，可以统称为交易费用。以计划手段为主，调配社会资源，无视交易费用，实际上，它付出的交易费用，是不可计算的。

能否不付交易费用，仅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资源呢？实践证明，政府没有这种能力。政府如果用强力手段，调节社会产品，只能产生专制主义，压制生产力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制约，调配生产资源，导引生产方向的。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无形的，却是最有力的；是不加强制的，却强制着生产发展趋向，调配着生产资源；是不直接支配人和人的行为的，却在实际上支配和摆布着人和人的行为。因为，利益吸引着人，驱使着人，没有人的利益，就不能调动人的活动积极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在

经济领域中的集中表现。十四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它从发展商品经济入手，逐步地建立市场经济，形成市场制约。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都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措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容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冲破自然经济下的产品经济，追求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它是社会生产发展中不同的两个质的阶段，前者所要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是发展商品生产，进行商品交换，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通过贸易，以货币形式，交换各自产品，它是一种双向的或多向的直接联系；后者即市场经济是以整个国家、一个国家周围的经济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为制约的，国家、经济区域、整个世界，都是小大不同的系统，各个系统彼此相互联结，相互依存，每一系统又是自己系统本身，它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制约，所谓独立，指在商品交换中是以平等为前提的，所谓联系，是指在生产与交流中谁也离不开谁。

和平、进步、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本质。市场经济是这一本质的经济表现形态。地球是一个村庄。

严格地讲，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机制作用，还微乎其微。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着商品经济，逐步建立着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或者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丰富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可能出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出现两极分化，出现剥削，出现资本主义早期曾经出现过的种种社会丑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发展生产，显然是第一位的。但是，片面突出效率，仅仅以效率作为收入分配的准绳，必然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招致群众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社会只能作出有原则的妥协，甚至牺牲社会利益；另外，片面强调平等，突出“大家富，我也富”，必将降低效率，助长游闲偷赖，不肯上进，“搭便车”和经济不振现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权衡选择，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是国家领导人需要更加悉心地掌握的一种领导艺术。

当代中国，各级政府的某些腐败，社会风气的种种恶化，金钱至上，人情淡漠，卖淫、偷盗、抢劫，等等，使生活在建国初年或者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革命者痛心疾首，感慨气愤，这是正当的。有人把当前中国上述种种不应该存在的现象，仅仅归之于旧社会的遗迹，归之于西方文化的毒害，这是不公正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难道它只有良好的一重性吗？只能给人带来幸福美满吗？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措施，一种经济形式，只给人带来善，不带来恶；只给人带来美，不带来丑。人们只能“两利之间择其大，两害之间择其小”，不能要求尽善尽美。这是我们不愿接受的，但是，必须接受。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带来的种种丑恶现象，需要政府运用法律的、行政的、意识形态的（例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民主与集中的联系）等等加以调节。中国已经建立并坚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能力调节、解决的。在社

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开放中，它将逐步被抑制，逐步被缩小，逐步限制它的危害，但是，要求完全消灭它，是不可能的。起码，当代中国是这样。

## 6.2 猫论——摸论——富论——特色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即猫论，科学地界定了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也就是充分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摸着石头过河”即摸论，被一些人误作经验主义，实际上，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这一理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行之有效的改革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富论，既是对平均主义的克服，又指出了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它是把中国人百年富裕梦变为现实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特色论，是指引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概括和实践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这一理论，主要内容有三：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第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目标。为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提出许多方法，择其要者，约有几条。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人才的取舍标准，不是依据他们的出身、成份、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或者过去的功过，个性的特征，而是看他们在实践中的表现，看他们行动的结果。凡是对完成当前任务（战争年代是对敌斗争，现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或有利于完成当前任务的人，都要使用，都要支持，都要信用，甚至是消极的力量，也要经过我们的努力，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那只白猫曾经偷吃过鱼缸里供人赏目的鱼，并且摔破鱼缸；那只黑猫在洁净雅致的客厅里拉过粪便，至今令人作呕；那只黄猫长得丑陋，令人看了生厌；那只花猫生性暴烈，不时抓人手脸。不同的猫都有不同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只要能抓住耗子，全都是好猫。为了抓耗子，全都应该喂养它们，保护它们。因为猫的职贵就是抓耗子。相反，不会抓耗子，只会叫，而且叫得很响，或者只会温顺，求得主人欢心，主人指东向东，指西向西，这只猫就毫无价值。城市里家中所养的猫，确实不会抓耗子，也不必去抓耗子，但那只是玩物，只供人赏心怡情，而不是猫的天生职能。

“猫”论是马列主义政党的战斗策略，也是方法论。中国的工业落后于现代工业，文化更为落后，仅靠少数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单枪匹马地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仅要团结华夏各族人民，而且要团结世界各国、各个不同民族的人民，建设我们的国家，繁荣我们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经济成就，国人共仰，全球瞩目，中国的形象，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睡狮已经醒来，而且正在跳跃飞奔。这样一个大好机遇，我们还要把自己的国门闭紧，围墙筑高，躲在屋里，闲庭信步，冷眼向洋吗？誓言多少多少年超

英赶美，豪情满怀，自我欣赏，空言大话，满纸雄心大志，唯我独尊，唯我革命，对他人一概冷笑置之，怒目斥之，不仅要失去朋友，而且要失去同志。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段疯狂的、唯我独革的历史，正是这样地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惊醒过来，才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猫”论是这个新时代的方法之一，它的理论根据是党的统一战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战争中，我们曾经极为有效地运用过，毛泽东曾把统一战线总结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以后七、八年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冲昏了像毛泽东这样伟大人物的头脑，开始骄傲了，开始淡忘或者放弃统一战线了，“猫”也就受到斥责了。其实，“猫”论只不过以形象的比喻，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它反对以人废言，以人废行，主张以人的行动效果，判定人的行动价值。

反对“猫”论，是唯成份论的逻辑推导，实际上，它是封建时代以等级身份，划分人的行为规范的思想再现。君就是君，君要像君的样子，臣就是臣，要像臣的样子；父就是父，要像父的样子；子就是子，要像子的样子。像阿Q那样的身份，是不准革命的。“猫”论要求敞开革命大门，谁愿意进来，不论他是什么人，过去有过什么言论和行动，都欢迎走进这个革命大门。不以人弃言，不以过去的“劣迹”弃人。

“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进，曾被人们斥之为经验主义、爬行主义，走到哪里算哪里，是一种无思想的思想。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知与行，即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思想既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思想产生于行动的需要。需要是有目标的，现实生活不能满足人们自己的需要，人们才去行动，以求达到自己需要的满足。人是为达到自己的需要目标，而去行动的。至于怎样才能达到，却没有现成的路，需要自己去走，走自己的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平铺在那里。在北京长安大街上走路，只要遵守交通规则，遵规蹈矩，就可以通行无碍，那是因为过去有千千万万人走过，甚至付出过血泪，凝结成法规，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走，无碍地走。如果是在荒野泥沼，杂草乱石中走，在过去没有人走过的地方走，尽管方向明确，目标既定，也得看看、试试、摸摸，探探，因为那里既没有明摆着的路，也没有供人走路的交通规则，要求人自己为自己走出一条路。把我国的改革比作“摸着石头过河”，河水的深浅，河水下面的泥沙碎石，鱼虾藻草，我们还不摸底，这就需要摸一摸再走。贸然下水，无忌过河，不是失足倒身，就是被河水淹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走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既没有脚迹可寻，又没规则可循，只能靠自己走。其实，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世间一切伟大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没有走过路中走出来的。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尽管那条路别人走得成功，自己再走，并不一定也会成功，思想的功能是创造，思想的作用是指导人的创造性行动。没有创造，没有新东西提供给世界，人的行动就只是动物般的行动，就是没有思想的行动。而思想是在行动中产生的，并应行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不是从头脑中想出来的，也不是从逻辑推演中引导出来的，更不是从装腔作势的吹牛中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的行动目标；干，就是行动，就是走路。干就要寻找路子。社会主义是方向，寻找路子是方法。方向对了，还要寻找方法，“摸”论就是寻找方法的一着。

“富”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在经济落后的我国，显得尤为尖锐，尤为突出。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不动摇，使国富也使民富，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中心，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是“富”论的核心思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虽然说我们现在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期间，我们不仅把贫穷视为光荣，而且把贫穷视为资本。一穷二白，为写最好的文章，为画最美的图画。人们欣赏夸耀自己的，也是出身贫苦，没有知识，没有较高学历，似乎愈贫穷，愈无知，也就愈革命，愈有革命本领。贫穷可慕，富裕可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草”的谬论，应景而生，适时而出。那个没完没了的“忆苦思甜”，使人们安于贫穷，安于现状，不仅抑制了人们的竞争心，追求更高生活目标的上进心，而且抑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因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精神可以休息了。人一旦失去了物质追求，也就失去了精神追求，物质上赞赏贫穷，精神上必将陷于贫穷。生产力发展缓慢、下降、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改善，倒有降低，甚至恶化。扭住发展生产力和消灭贫困，是“富”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富裕起来，没有人反对。但是，对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却众说不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起来，必然造成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那些原来处于社会下层，职业的社会评价也可能并不高，一下子发了财，就想以高档消费在社会上求得心理平衡。出现所谓“炫耀消费”，如用两万多元买一支口红，一万多元买一根皮带，动辄千万元一桌酒席，相对于那些尚还不得温饱的人和地区来说，令人惊奇，使人感叹。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激励了人，调动了人的能力，发挥了人的天才，同时，又造成了人们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这就必须社会的正式代表政府，通过宏观的经济控制，运用分配政策，加以处理。通过税收，资源调价，资源、技术和人才的相互支援，帮助尚处于贫困地区，促进富裕地区更加发展，是解决利益分配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采取的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反对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因为它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要防止乃至消灭两极分化，因为它会招致群众不满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政府决策机关的领导艺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可以带动其余大部分地区，由点及面，达到共同富裕。追求富裕的人，必须遵纪守法，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人格，必须恪守竞争道德，坑蒙拐骗，以假冒真，以劣充优，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

社会经常在平等和效率之间面临着重大的权衡，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甚至妥协。这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是手段、措施、方法，是为目标服务的。或许，这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它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痛苦挣扎中诞生的，是新的经济体制产生阵痛期的一种表现。

“猫”论、“摸”论、“富”论，是邓小平的方法论，它的理论基石，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我们的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无政府性，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将以统一的计划，集权的领导，调配资源，指挥生产运行，分配社会产品。斯大林和毛泽东，不仅加以完整化，而且付诸实践。排斥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以人为的主观设想、个人的主观愿望、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生产，决定分配。他们主观拟定的社会主义，不仅要使生产高度社会化，而且要使各个生产领域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齐一化。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按照同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自己的国家。个个相同，色色一样，组成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必须有一个家长，以它“为首”，号令一切，指挥一切。但是，各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自然资源的分布，技术和人才的格局，不尽相同，难以统一，更难集中，他们就用政府的权力，强使统一，硬性集中。它无偿地调配各国的资源、产品、人力、物力，出现了国际间的“一平面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两个阵营，社会主义国家把战争的威胁当作首要前提，把军备竞争当作头等任务，忽视了农业，忽视了日常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官僚主义滋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严重脱节。苏联的解体，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加以概括，并写入党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结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特色，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应该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普遍性的矛盾。但是，首要的、成为我们认识起点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离开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就是抽象性的、空泛的、无处着落的。邓小平的“特色”论，就是遵照唯物辩证法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联系提出的。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从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出发。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邓小平从理论上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 6.3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马列主义是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站在当代科学的巅峰，凝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精华，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愿望，代表了中国人民迈向新世纪的坚强意志，指明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

马列主义，同人类思想的历史发展一样，第一，是联系着的，马列主义的后继人不能抛开自己的先辈，独辟蹊径，另起炉灶；第二，是发展着的，马列主义的后继人，要按照自己所遇到的时代的历史课题，发展马列主义，甚至要纠正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错误论断。恩格斯曾经预言：我们现在以极其傲慢的态度纠正我们前人的错误，我们的后人将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远比我们现在纠正我们前人的错误要多得多。

如果把马列主义比作一条理论长河，这条长河离开它的源头愈远，愈往下游，河水就愈膨胀、愈丰富、愈具有特点、愈花样翻新。因为，河水不择细流，在游动中不断地有河水以外的水流涌了进来。马列主义的奠基人与其后继者的联系，不象运动场上接力赛跑那样，第一个手持接力棒者递给第二个，第二个再递给第三个……，形成历史的接递连传，而是在扬弃、创新、发展中的联系。联系中有发展，发展中有联系，坚持马列主义必须在发展中坚持，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

当代中国人学习马列主义，第一，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弄清，正本清源，掌握它的由来和基本原理的内容；第二，结合中国实际，把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历史实践中提出的课题，相互结合，如毛泽东所提出的，用马列主义的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第三，面向当代，面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不能停留于书本、过去，也不能停留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已经解决的历史的、理论的课题。新时期要求有新发展。

马克思在表述自己哲学的本质特征时，曾经写道：过去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用自己的哲学把世界改造成成为适合于人，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响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着重于人对物的实践，人对客体世界的改造。因此，它反对静止地看待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唯物主义已为人们一般地接受。但是，他们所接受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而且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因此，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把自己的注意力，着重放在辩证的唯物主义上面。至于马克思，照恩格斯的说法，其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一是剩余价值的发现，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生活于 19 世纪末期、20 世纪初期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都作出了自己时代性的贡献。为了回击当时盛行的唯心主义变种马赫主义，1908

年，列宁写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与恩格斯当年的注意力点，略有不同，着重唯物的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内，列宁研究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其中最杰出的贡献，是 1921 年 3 月在俄共（布）党的十大上，提出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曾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认为“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很快地就发现，对当时俄国，计划就是“官僚主义的空想”。1921 年 12 月，提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进而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列宁的这些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的，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没有接触到这个时代实践中提出的理论课题。可惜，列宁的早逝，使列宁的思想，没有在苏联得以实现。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把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向了顶端。苏联的计划管理体制，形成于本世纪 30 年代，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 年）开始，国家不仅向工业企业直接下达任务，而且向集体农庄直接下达指标，这些任务和指标，都具有法律效力，同时，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也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为联系的。第一，当时的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单一的公有制，有条件实行计划经济；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 1929 年至 1933 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33 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成功的。两相比较，显示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当时，也曾引起世界注目，特别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之震动，深为敬慕。

国内经济建设的成就，国外人心向往的赞颂，使苏联把他们所实行的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作出不切实际的估价。有一段时间，在理论上，不仅排斥市场，甚至否定价值规律。30 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50 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进行过某些改革，但一直到前苏联解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思想，是在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文化衰退、长期与世隔绝的文明古国中，产生的一种崭新思想。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解决了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提出的，经过许多人探求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实践课题，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有三个基本内容。

第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

第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第三，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办，力争外援，但主要要靠自己，外国人的指手划脚，可听也可不听。

毛泽东本人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必须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集中反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本人的实践活动。它与毛泽东思想有三重关系。

第一，继承。中国革命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真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积极的、有益的思想，仍须继承。

第二，纠正。继承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伟大的历史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没有这个纠正，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纠正并不是否定；更不是一脚踢开。纠正是扬弃，既有克服，又有保留；既有中断，又有联系；既有批评，又有继承。目的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真内容，拼弃毛泽东本人晚年的某些错误。它需要我们冷静地作出理性分析，并运用实践的后果，一一加以检验。

第三，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否认的，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中，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中，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人类思想宝库中永闪光辉的一个思想结晶。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以后连绵不绝的无数后代人，将永远会从毛泽东思想中探寻出发人深思的思想珍宝。

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形成的。他面对着新的时代，新的世界格局，新的中国状况；研究了新问题，提出了新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列主义，也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光照着神州大地，引导着炎黄子孙。邓小平理论，勾画了一个新时代，制定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它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一样，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在马列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 第七章 全民族的自我超越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马克思

在忍受苦难之中，一个民族的灵魂所获得的醒悟之深，是历史中的人们在千年万世的发展过程中，永远不会知晓的。

——史宾格勒

## 7.1 中国人升值

中国改革大潮把自己推向世界，当我们涌进世界大舞台，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中国的一切开始升值：土地升值，股票升值，知识升值，信息升值，精神升值。这一切升值实质上是中国人升值。改革开放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中国现实的超越，归根到底，就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超越。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从传统人走向现代人的过程，这是一场全民族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

1992年中国潮把神州搅动，12亿中国人民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演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整个中国，山在变，水在变，一切都在迅速改变。原来的面貌，最根本的是中国人在变！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一派龙腾虎跃的景象：物活了——江河里船只增多，运货的车辆加快，过去藏在深山老林里的竹子制成工艺品，远销五大洲；语言活了——新词，新话，新概念不断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脑筋活了——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案，新举措接连出台；最关键的是人活了——跳槽，下海，摆练摊，去特区，去沿海，去国外，人们再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职业，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人们开始重新估价自己，重新选择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人们都在萌生一种改变自己、实现自我的冲动。1992年，整个世界都把视线投向中国，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中国的地位在上升，中国的价值在上升，最根本的是中国人的价值在上升。

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把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切都卷入了世界市场。中国一切都要在激烈竞争的机制中得出新的价值判定。

土地在升值。全国各地涌现出大批房地产公司，国外许多大财团也纷纷投资中国房地产，炒中国地皮，中国地价猛涨。特区的地价在涨，沿海地的地价在涨，内地的地价也在涨。

1979年，深圳一村民出售住宅每平方米地价不到50元。今天，深圳国贸大厦每平方米地价超过了万元，外销楼价每平方米超过了两万港币。

1990年，珠海特区每100平方米地价8000元。现在每100平方米土地售价25000元。

1989年，德国一个投资者在北京郊区以每亩5000元低价购买一片土地，现在每亩已涨到了15万元。

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的地价楼价普遍大幅升值：深圳升值35%，珠海升值50%，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则升值15%。

股票在升值。1992年，中国成千上万的股民又是一个丰收年。许多前些年无意中购买股票的人，突然一夜间无意之中变成万元户、百万元户。1988年上海发行的面值100元的豫园商场股票目前市值已超过10000元；1987年深圳发行的发展银行股票，当年1万元的投资者，现在已收盗300万元。这种神话般的发财之道，在中国还是第一回，实属史无前例。

中国股票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强烈的吸引力，B种股票在海外十分抢手，承包商争相承揽，纷纷表示供不应求。深圳华丰电子公司部分日仰股票，股值2000万港币，在香港上市后，其中60%被台湾投资抢购。小平南巡后，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一次又一次上扬，一种专门用于大陆投资的中国概念股

更趋活跃。中国发行的一切股票都在升值。

知识在升值。前些年，那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现象，令人讥讽，令人担忧。1992年3月，珠海传出震惊全国的新闻——珠海重奖科技人员，奖金包括高级小轿车、豪华别墅，共超过了100万元。这一消息传出后，各地纷纷效仿，许多单位高薪聘用科技人才，使全国出现人才大战，许多省份组团远征欧美招聘留学生，一些乡镇企业用特别优厚的待遇，招聘科技人才，有的优待给个人25%的股份，北京卢沟桥的农民招贤条件是三居室的住房、轿车一辆、奖金15万元。现在，“最穷的像教授，最傻的是博士”，这一流行口号已逐渐消失。

信息在升值。市场经济最需要信息，信息就是效益，信息就是金钱，信息就是生命。情报、资料、数据、消息、软件等等，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单位所重视。电话、电视、邮电、通讯、报刊等行业越来越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有没有电话，成了人的地位高低、价值大小、身份轻重的象征。谁能获得信息，耳目灵通，谁见多识广，外语好，善交际，谁就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视交流、交往、交换。人们开始增强信息意识。华西村为鼓励农民学普通话和英语，做出规定，学会普通话增加一级工资，学会英语增加二级工资。他们认识到：语言是人类交往的桥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建一座四通八达的语言立交桥，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观念在升值。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与社会生活内容相适应的是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精神状态。现在人们崇尚新思潮，新时尚，新事物。谁能跟上市场变化，敢在市场竞争，顶住市场压力，在竞争中获胜，谁就受到大家羡慕。谈论经商、做生意、谈论市场经济规则，不再被人嘲弄。那种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怕风险，不怕失败的精神正在蔚然成风。这一切都在说明，时代精神在升值。

在大变革时代，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中国的一切都在赋予新的内容，都在打上时代的烙印，都在悄悄升值。而上述这一切在升值，其实质是人在升值，是中國人在升值。一切变化，都是由人的作用引起的。中国的变化，主要是中国人的变化。在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自我超越。

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思想家都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衰落而哀叹，为中国人长期处于昏睡状态而惋惜。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就曾经这样写道：

一个人数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这的确是一个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这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哀情。今天，我们这个民族正以自己的变化告慰九泉之下的伟大导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中国人正在改变自己的形象，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当代精神同自己的过去告别，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正在潇洒起来。鲁迅曾经为自己的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92年中国潮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正在摆脱不幸，奋起竞争。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中国人民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一反传统几千年，反叛世代代相传的保守思想，从精神上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更新。勇于丢掉长期视为神圣的旧体制，敢于破坏自己昨天建立的东西。坚决抛弃已经养成的习惯，能够否定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现代化过程就是现实的中国人对现实现实的超越，归根到底，就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超越。

换了脑筋的中国人，正在重塑自己的民族性格，敢冒险的胆量开始大起来，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是中国人的进步。

今非昔比的中国人，正在谱写着自己的民族的新历史。

黑格尔在论述法兰西革命时说：这是一次光辉的日出。一切能思想的生物，都欣然地欢迎这一新时代的到来。高尚的热情充满了这个时候，全世界被一种智慧的热忱所浸润，仿佛神意同尘世之间的调和现在才达到似的。当我们面对 1992 年中国改革所发生的伟大变化时，我们也找到了这种感觉，虽然现在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是新时代的到来已为期不远，中华民族可以满怀豪情地张开双臂，去迎接自己民族的壮丽

## 7.2 改革呼唤改革者

改革大潮涌来时，也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改革，假改革、利用改革，玩弄改革、反对改革等各类现象，都会打着改革的旗帜。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都应该以改革的神圣名义，反思一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言行和各类现象。改革是改革者的行动，革命是革命者的灵魂。伟大的改革要有伟大的改革者，新的革命要有新的革命家。改革过程是铸造改革者的过程，是呼唤革命者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识别惟是真正改革者、真正革命家的过程。当改革最终将旧体制消除时，人民群众也会把站在旧体制的立场维护旧体制、阻挠改革的丑类、败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 14 年的路程，在这个时候再提出什么叫改革，似乎有些荒唐。其实不然。今年五月份，邓小平到首钢视察时就提到，现在都在说改革，究竟什么是改革？把这一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只要回顾一下 92 年改革中出现的情况，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改革的名义下具有各种不同现象，展现出不同的思想、面孔、行为选择，价值目标。

既无改革的要求，又没有改革的能力，但全国上下都在搞改革，为了追赶时髦，只好向别人模仿抄袭。别人干什么，我就于什么。别人怎么讲，我也怎么讲。看到个体市场可以讨价还价，就让国营百货商场取消明码标价，允许顾客议价，认为这就是改革了。别的单位允许搞第二职业，我也宣布允许搞。不分析本单位的情况，不顾及本行业的特点，盲目号召搞第二职业，结果影响了第一职业，第二职业也就无从谈起。别人出租土地，我也出租，不讲效益，不作论证，尽快抛出去，好向上级和外界有个交待，以此证明我也在搞改革了。别的地方在搞开发区，我也划出一块地，挂上开发区的牌子，这就算跟上了改革的形势。在他们看来，今天和昨天不一样，这里同那里不一样，现在同原来不一样，就是改革。其实，真正的改革需要智慧和创造，需要科学分析和独立思考。这种盲目地照搬照抄，千篇一律地机械模仿，与真正的改革相去甚远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改革是政绩的表现，为标明政绩，就要在改革方面多做文章。真的改革搞不了，就搞形式主义，虚造声势，捧场作戏，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开各种会议，搞各种活动，办各种“节”，产生各种“热”，劳民伤财，不见效益。纸上谈兵，笔下生花，套话满天飞，靠秀才杜撰本单位的开发战略，靠笔杆子写出本单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结果是报纸有名，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虽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但是，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就使自己站到了改革的前列。自欺又欺他人，自骗又骗他人。

要改革，就要涉及到利害关系，就会使一部分人失去特权和私利，但是，改革是大势所趋，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口喊改革，暗中反对。你说要放权，他说要慎重，先做调查研究；你说要精简，他说稳定是前提，先做方案设计；本来可以一步到位，他提出分步实施；本来一年可以完成，他还在搞五年计划。时间让他们磨光，精力让他们耗尽，锐气让他们夺走，再好的改革方案一到他们那里都成了泡影。他们想用扯皮战术缠住改革的脚步，拖垮改革者的意志。表面上他们也在动，也在做，实际上是在向改革搞对策，无异于玩

弄改革，破坏改革。

改革会有风险，有挫折，有失误。改革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分阶段、有节奏地进行。有时有新政策出台，上新台阶，大踏步地前进；有时则需要顾及各方面的接受程度，要缓冲一下，或需要清理环境，进行治理整顿。但是，不论在什么阶段，都要推进改革，促进改革，不能倒退，不能逆转。有的人则在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立即回过头去，向旧体制复归；当中央提出要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他们立即杀回马枪，走老路，提出要搞新的集中，新的权威。明明是回潮，倒退，复旧，如鲁迅所说，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却偏偏要加上一个“新”字，并戴上“深化改革”的桂冠。

在“左”的轨道上生活惯了，现在一下子煞不住车，只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对待改革，像文化大革命一样，借用改革，运动群众，随心所欲，偷塞私货，把基层和群众当作改革对象。改革遇到困难，就转嫁危机，公开提出为了度过改革难关，人民要过几年苦日子。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不顾及人民的接受程度，认为改革就是要使一部分人失业，甚至采用鲁莽行为，要用所谓“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来砸“三铁”。这种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改革的办法，与改革的真正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切身利益早已同“左”的一套溶为一体，骨子里就反对改革，只是由于天下大势所迫，不得不表面上也拥护改革。平时专门挑剔改革者的毛病，抓住一点失误就大做文章。他们寻找各种机会，企图改变改革的方向，东欧剧变，他们开始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要以反和平演变、巩固政权为中心；苏联解体，他们提出要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六·四”风波后，他们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多一个“三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名存实亡。当改革高潮到来时，他们又摇身一变，本来“左”得要命，也开始起来反“左”，口号震天价响，文章氏篇大论，企图混淆视听，蒙混过关，守住自己的阵地。等到风口浪头一过，他们又重整旗鼓，继续向改革者发难。

凡此种种，都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有的是对改革的利用，有的是对改革的嘲讽，有的是对改革的玩弄，有的是对改革的反对。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改革真义，为改革正名。

首先，应该明确，目前所进行的改革，其直接对象是建国后沿袭了原苏联模式而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我们的改革就是要革除这个旧体制的命。

第二，高度集权的旧体制有它形成的历史原因，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旧体制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体系和上层建筑机制，越来越成为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按照邓小平的话，这们旧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所以，从更深刻的层次上看，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体系和上层建筑机制。

第三，当我们完全摆脱了高度集权的旧体制，调整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然带来政治上的高度民主，经济上的空前繁荣，文化上的全面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由愚昧走向文明，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化，整个中华民族得到振兴，传统文明古国获得新生，这是一场新的革命。1949年那场革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政治上

获得了翻身解放。这次革命要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经济上的充分发展，才能保障和巩固政治上的地位，使中国人民获得新的更彻底的解放。所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这次改革是一场更全面、更伟大、更深刻的社会革命。

由此可见，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社会大变革；是洪秀全、索有力、孙中山、毛泽东等前辈未竟事业的继续；是跨世纪的历史工程；是人类实践的空前壮举；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所以，我们的改革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对于改革这一神圣的名义，不能滥用，更不能盗用，任何褻读和法污这一神圣名义的行为，都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这次改革的实质和目的是要彻底解放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是判断真假改革的唯一标准。那些没有触动旧体制、没有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机制，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列为改革的范围。只有真正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改革的行动，只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才能获得改革者的殊荣。每个关心中国改革前途的中国人，都应该在改革的过程中用这一标准判断事物的是非，检验人们的行动。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中国人，都应该在改革的神圣名义下反思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言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假冒伪劣商品，也出现了假冒伪劣的改革。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同时，更主要的要识别假冒伪劣的改革。

要改革，就要有阻力。正如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邓小平文选》，第 142 页）。所以，要改革，就要克服阻力，就不可避免地要磕磕碰碰，伤筋动骨，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咒骂、抵毁、反抗，特别是当改革进入关键时期，要向旧体制的要害处动手术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不敢触及实质性问题，不敢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总是不疼不痒，四平八稳，恐怕伤了和气，让改革方案谁都能接受，谁都能满意，其结果必然是一条陈规也改不了，一个机构也动不了，一个人员也减不了。一到关键时刻就退缩了，一动真格的就手软了。这无异于取消改革。这只能让中国人民如同一百年前一样，继续沉浸于渴望中国富裕的梦幻之中，继续深陷于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自我否定。这就要求在旧体制这个机器上运转多年的同志，要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敢于丢弃在这个旧体制上获得的官位和权势，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顺乎历史潮流，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为革除旧体制的命做出自己的贡献，投身于功在千秋的改革大业之中。既没有投身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又没有实施改革的能力，只会用形式主义装潢门面，其结果只能是贻误改革过程，让人民坐失良机。既不想为改革作出真实的努力，又不想失去改革者的荣誉，只靠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其结果只能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既改变不了自己在“左”的轨道上滑行的惯力，又要在改革的过程中守住自己的阵地，保住自己的私利，死心塌地逆潮流而动，其结果只能是断送改革前程，成为千古罪人。

当改革潮流滚滚到来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各种声音，各种现象，各种脸谱，这不足为怪。问题在于，每个人，每个中国人，每个关注改革前途的中国人，都应警醒的眼睛，清醒的头脑，密切注视改革的进

程和命运。改革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只要改革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人民就不要忘记，改革仍然存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两种可能。那么，每一个人就都有力改革争取好的前途，好的命运，好的可能的责任，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人民正逐渐增强改革意识，强化主人翁的责任感。醒来的中国人民必定会珍惜主人的地位，行使主人的权利，选择改革的契机，把握改革的进程，完成时代的使命。

改革是改革者的行动，革命是革命者的魂灵。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旧体制的弊端和要害已经清楚，现在的关键是要对它实施根除手术，真正的改革者，应该付诸行动，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奋力前

### 7.3 九死一生的机遇

历史上，中国已失去了几次发展自己的机遇；每次丧失机遇都要等待几百年，因此，眼前的机遇是千载难逢的。为了抓住机遇，让中华民族崛起，中国革命的先驱几经血雨腥风，献身革命，因此，眼前的机遇是九死一生的机遇，我们再也不能丧失了。抓住机遇的根本条件在于要有抓住机遇的内部机制，这就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旧体制的消亡、新体制的诞生。旧体制——该消亡的还没有消亡，还有很大的能量，还在变换形式，同新体制抗衡；新体制——该诞生的还没有诞生，还处于胚胎之中，还很弱小，还处在旧体制的围追堵截之中。我们的改革犹如爬在陡坡上的汽车，不进则退。中国当前要特别防止改革滑坡。到了改革关键时刻，就要根除旧体制的命。旧体制则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时刻更需要有雄浑的胆略、果敢的措施，迅速结束旧体制。改革还有九曲十八弯，还有千难万险，千折百回，千辛万苦，还要准备付出代价。我们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选择，为了民族的利益，真正的改革者决不能退缩。

时间：20 世纪末，21 世纪初。

空间：太平洋海岸，中国。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空：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是一个宝贵的时空：它会使沉落的民族重新升起。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空：它会决定中国的生死存亡。

这个时空，之所以特殊、宝贵、关键，就在于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空前大发展的机遇。

机遇，机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而言，这两个字与生死同义。

机遇，chance，是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机遇不是呼之即来的宠物，也不是停留在码头等待客人的轮船，更不是任何人都可摘取品尝的果实。它赐予人，文向人提出挑战；它会使某一地区和民族获得偏爱，但又提出苛刻的条件；它不以我们的意志而到来，也不以我们的意志稍纵即逝。抓住它，就会从困境中崛起；失掉它，就会遗恨千古。

在新旧世纪之交，世界热情地把机遇“奉献”给中国，时代把叩响新世界晨钟的使命交给了中国人民，历史又一次考验中华民族把握机遇的能力。

92 年邓小平南巡，视察首钢，三番五次地指出，中华民族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92 年刚过，1993 年之初，邓小平又一次向国人呼唤：

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

这是总设计师在唤醒我们的机遇意识。

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机遇不多，但是，不是没有。它曾经几次来到我们的身边，然而都被我们拒绝了，不是机会不照应我们，而是我们丧失了机会。

明末清初，正是世界形成统一市场的时候，也是中国实力强盛、科技发达、对外开放的大好时机。美国的未来学者金格里奇在《机会之窗》一书中指出：公元 1400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探险王国。那时，他们的

舰队比欧洲任何舰队都强大得多，他们到过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和马达加斯加探险。若能继续下去，也许他们已在非洲之角击败葡萄牙，并在大西洋沿岸与其相遇。这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郑和下西洋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中国人以十足的探险精神和更大的规模对外开放，中国就会强盛发达起来。然而，面对当时国内矛盾激化和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侵略威胁，明末清初的几代帝王开始推行“海禁”政策，从主动的对外开放政策逐步转变为日益顽固的被动的闭关锁国。中国失去了进入全球化文明世界的历史性机会。

1895年，康有力在北京“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使中国人认识到，当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力倡改革，要求国家全面变法。但是，这个变法运动由于流血失败而靠终，中国又一次失去了走向先进文明社会的机遇，进一步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

进入本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国际国内环境又一次为中国提供了大发展的良好机会。可是，我们却又一次关上国门，政治运动频起，最后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使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历史又一次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后面。

我们中华民族，每一次失去自己的发展机遇，都要等待几百年，上述几次错失良机，使中国落后近百年。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机遇，抓住它，就是完成几百年前中国人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机遇难得，怎样才能抓住它，靠什么抓住它。历史上痛失良机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抓住机遇主要靠我们这个民族要有一个容忍改革开放的机制。这个机制是机遇安身立命之处，这个机制是捕捉机遇之网。当我们今天要下决心抓住机遇的时候，必须真正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切实解决我们的社会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鲁迅说过，中国人不但不为福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部不容易有改革，可见，由于中国传统所具有的强大的保守势力致使我们的社会缺少容忍改革开放的机制，致使中国长期停滞不前，有了发展机遇也会眼睁睁地丢掉。

当社会缺少改革开放的机制时，改革者的命运总是伴随着血和泪，总是以悲剧而告终。从2000年前的商鞅、1000年前的王安石到100年前的谭嗣同，改革者先后在血雨腥风中走上了断头台。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康有为维新变法，都没存逃脱被镇压被扼杀的、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悲惨结局。每当历史上的改革家壮烈地倒在血泊里、变法运动中途夭折时，都正是中国大发展的机遇同我们失之交臂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抓住机遇，这是生死存亡的选择，这是九死求一生的机遇。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畏艰难，勇于在困境中奋起的民族。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失败，并没有中断中国的改革之路，中华民族越挫越奋，在落后中崛起的意识越来越强。谭嗣同等六君子头颅斩断后，还有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李大剑等人的出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后，还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兴起。中国改革的先驱一直在激励中国人的觉醒。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曾赋诗言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的狱中绝笔成了千古绝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作为改革先烈，他用生命所做的

最后呼喊，永远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回响，永远激励后人的改革精神。先辈改革者的鲜血正浇灌着当代中国人的改革精神之花，以往改革曲折悲壮的历史正激励我们完成今天的改革大业。尽管人们清楚地知道，今天和昨天一样，改革者的头上仍然高悬一把利剑，时刻都有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责难甚至牺牲，但是，真正的改革者将仍；日会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行。我们这一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四年之久，比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用的时间还要长，然而我们所要革除的旧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改革之路还会有千难万险，还会有千折百回，还会有于辛万苦。就是经历了 1992 年的改革大潮，我们的面前仍然难题重重，有人还在提出中国的改革到底能搞多久疑问。只要对目前改革现状进行清醒的全面的深层反思，我们就会感到这种疑问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看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上层建筑的体制、机制仍然是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总病根。改革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上层建筑却基本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领导作风、决策能力、政府职能还远远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如果这一问题不及时解决，我们的改革就有前功尽弃，中途翻车的可能。

我们看到，92 年中国潮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年绕开了，回避了，这就是产权问题。这一问题暂时回避一下可以，但不能长期拖后。产权理论不清晰，产权关系不理顺，其他一切方面的改革都不会收到预想的效果。我们看到，左倾思潮在 92 年中国改革大潮中受到了一次清算。但是。左倾思潮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变换手法，改头换面，正以另外的形式存在着，潜伏着，如同棉花蚜虫一样，在喷洒一段农药后，这些蚜早就有了抗药性，有了抵抗力。左倾思潮也在改革大潮中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增加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我们看到，旧体制——应该消亡的东西，还没有消亡，而且，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日体制对改革的抵触则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在这个旧体制上享有特权的人，在旧体制行将消亡的时候，他们会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自己争附地盘。新体制——这个应该建立起来的新事物，还处于襁褓之中，还很微弱，还处在旧体制的围追堵截之中。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我们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负作用、负效应，还在时刻危及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官商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贫富分比问题、腐化问题，等等，都是应该予以正视并加以解决的迫切问题。

我们看到，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还基本没有解决，这是决定改革的方向问题，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是衡量改革程度的标志。多数和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仍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这个问题久拖不决，就会直接影响改革的进程和全国人民对改革的信念。

我们看到，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如同爬到陡坡中间的车子，不加速前进，就会迅速滑了下来。改革处于不进则退的境地，只有前进才有前途，倒退就只有死路一条。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改革滑坡，而不是防止经济过热。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改革依然困难种种，险关重重，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经过 14 年的改革，已经在人民中间培育了一种改革精神，强化了改革意识，人民会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改革浇铸了人民的

改革意志，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人民将决定一切，任何阻止改革的企图，人民是不会允许的。有了 14 年的经历，有了 92 年的经历，改革过程中的一切问题开始一一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是非已经清楚，症结已经暴露，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这兵改革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不改革，毋宁死！中华民族一定会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以胜利者的姿态迈进新的世纪！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过 1992 年中国改革大潮的中华民族，定能闯过惊涛骇浪，到达胜利的彼岸。

## 7.4 重新崛起的文明

有许多历史人物都对古老而又年轻、神奇而又雄伟的中华民族有过种种评价和预测。西方的拿破仑和黑格尔是最著名的两位。拿破仑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具有辉煌的时代，世界历史就是从中国开始的，人类的太阳是从东方开起的。这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正确评价。然而，他们两个都有各自失当的地方。拿破仑认为，对付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它昏睡，千万不要惊醒它。黑格尔认为，中华民族自从衰落之后就永远不会重新崛起，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中国辉煌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不受拿破仑和黑格尔的预言所限制的，20 世纪末，中华民族正在醒来，正在崛起。

当 92 年中国潮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年代，时隔几千年，中华民族又震惊了世界，这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要重新崛起，进入再度辉煌的年代？

在人类的襁褓时期，地球上首先形成有四个文明中心，这就是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的入侵而被希腊文化同化；古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民族的占领而中断；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侵略而被毁灭。唯独中国文化，延续不断，高峰迭起，形成恢宏的文化大系。

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累积出中国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为欧洲的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西方的文化巨匠——培根、伏尔泰、歌德、巴尔扎克等都从中同文化中获取了精神力量和智慧源泉。中国文明堪称世界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哪一个炎黄子孙不为此而自豪呢？

然而，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后来发生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的文化衰退了，中国文明陨落了。这是悲壮的衰落！它的周期竟达 500 年之久！哪一个龙的传人不为此而痛心疾首？

当然，按照历史学家的观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任何一个国度的文化都会有从兴盛走向没落的可能。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统计，自人类有史以来共存在过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四种已经绝迹，六种正在衰朽，只有希腊文明变成了工业文明，仍然存在着。

现在的问题是，衰落的文明是否能重新崛起？昔日的中国是否一去不复返？东方文化是否能重返世界？是否可以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断言，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只能一次创造新纪元。世界历史始于中国，太阳曾在这里升起，然后就一去不复返地沉没了。

黑格尔的话讲得傲慢武断，其实，更重要的是偏狭自大。他认为人类文明在他自己的日耳曼民族那里达到了最高峰，并从此万古不移，其他民族则永远只能仰视日耳曼民族而兴叹。

但是，历史并不受黑格尔的断言所束缚。相反，阴极而阳生，否极则泰来。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命题正在以实践的力量和黑格尔争辩。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创造，今后人叹服。其中四大发明，更著称于

世。这些发明创造当年传到西方社会时，变成了旧社会灭亡的加速剂、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诚如马克思所讲：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技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可是，四大发明在中国本上却是另一番境遇，火药用来作爆竹，纸张用来敬鬼神，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封建制度窒息了中国科学技术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花，扼制了中国自己的生产力的发展。墙里开花墙外红，这是一个悲剧！

今日中华民族正在反思这场悲剧，并力图重新振兴自己民族的古代文明成果，不准过去的悲剧再捉弄我们自己。从长征火箭发射人造卫星的隆隆巨响中，我们不是可以听到中国文明复兴之日正在向我们走来的脚步声吗？从1992年中国潮的滚滚波涛中，我们不是仿佛看见了太平洋时代的曙光吗？

中国的兵书《孙子兵法》在被西方称作未来学，其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竟成了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指导原则。布热津斯基在其地缘战略学中指出，美苏竞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美苏竞争很可能不是通过战争，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得分，逐步压倒对方的过程。孙子的谋略思想构成了美国竞争战略的核心。他感叹道，中国的战略思想和实践在绚丽多彩的军事艺术史上名列前茅。尼克松也曾悟醒到，孙子的“以正合，以奇胜”是美苏竞争的重要方法。直到海湾战争的爆发，布什的高参建议他在枕边放上一本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其实，纵观海湾战争的发展过程，不论是盟军还是伊军，他们各自都在政治、外交、军个等方面导演了战略战术上的绝招，哪一家不是在娴熟地运用《孙子兵法》这正是：一部中国古代奇书，交战双方争相阅读。这种情形在《孙子兵法》的故土上能不引起空谷回响吗？

《易经》是我国古代系统讲述宇宙演化规律的最早文献，它用阴阳对立面的演变说明世界的组成，它提出的原始物质结构理论正好和现代物质结构理论相吻合。《易经》用阴阳这两个符号推演出事物纷繁复杂的变化，以二这个数字为基点，正和现代计算机程序的二进制相贯通，被称为计算机之父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读到《易经》时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二进制的思想。《易经》从阴阳两仪中派生出六十四卦，又正好与现代已破译的全部六十四种生物遗传密码的数目一致，令人拍手叫绝。中宙古代文明暗含了现代科学成果，现代科学成果验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科学成就。这说明在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一条暗中的通道。

当代著名科学家从计算机的二进制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阴阳八卦”，从量子场论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元气说”，从耗散结构理论追溯到老庄哲学的“法自然”的主张，这一切是否预示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要来一场大复兴？是否预示着东方文明正在重新崛起？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首先在意大利形成，然后依次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而在这之前，古代的科学技术中心应该说是中国。那么，到了今天的时代，世界科学技术中心能否再次转移到中国？”

不堪回首的那段屈辱的历史逼着我们复兴中国文化，现代西方竞相发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事实，促使我们走向世界文明之巅。当代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分子都担负着复兴中国文化、让东方文明重新崛起的历史重任！

当然，中国古代文明不仅仅是指科学技术，而且包括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即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今天中国古老的文明要重新崛起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在大变革的时代经受着冲撞、重树、冶炼，

必然会发生擅变、升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锻造一种崇尚创造、鼓励竞争、不畏风险的精神，这种新的精神正好冲击着传统中国人那种保守、偏狭、谦卑、求稳的劣根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树立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的精神，这种平等的精神和极端的平等精神相去甚远，有如霄壤。真正的平等精神不在于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号施令，或者任何人都不接受别人的命令，而在于要使他平等的人服从，向与他平等的人下令。这种平等的追求，并不是要求没有主人，而是要求只把与他平等的人看作主人。因此，这种平等，就是人格上的平等，是权力的平等，是道义的平等，是实现每个人价值的机会均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民主与自由，使得每个人都获得了发挥自己才能和天赋的广阔天地，有了更充分的条件实现自身价值。这种民主与自由，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做主人的权力和条件，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大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同时，这种民主与自由的要求，内在地包含了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民主与自由，既不是一种受奴役的状态，也不是极端自由的状态。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将会吸收人类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保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当世界大潮涌进中国，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一定会使中华民族的古老土地上产生更伟大更新鲜的文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这种新的文明提供了土壤和契机。

新的中国文化，新的理想人格，新的民族精神，当我们完成重建民族精神家园，再造民族之魂的时候，中华民族将再一次在世界的东方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各强大民族面前一领风骚。

西方曾有两位历史人物对中华民族做过预测性的结论，一个是黑格尔，一个是拿破仑。黑格尔认为，古代兴盛的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开端的一个标志，这个结论是对的；但他认为自中华民族衰落之后，就不会再次崛起，就会一去不复返地沉没下去，这个结论正在被今天的事实所否定。拿破仑称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中国虽然处于沉睡状态，但毕竟是一头狮子，这就是承认中国的潜在力量。这是正确的。但拿破仑害怕中国这头睡狮醒来，因此，他告诫西方人，千万不要惊醒中国，让他昏睡去吧。这一想法是错的。中国在 20 世纪末期开始醒来，把拿破仑的告诫变成幻想、变成梦愿、变成一厢情愿！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 7.5 创造巨人的时代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过程。改造社会，就是要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发达。改造人，就是要使中国人实现人格的超越、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超越。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我们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一时代，是需要新人而且正在产生新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正在产生巨人的时代。中华民族在创造伟大时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创造自己民族的伟大英雄的时候。

1992年渐渐离我们远去，20世纪正接近尾声。我们中华民族正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正以强烈的意识期待着代表新世纪的巨著问世，宣告新世纪的巨人出世。

20世纪末，中国的大门全世界敞开了。中华民族正迈向新的世纪，走向新的生活，开创新的生活。改革、开放、搞活，成了中华民族生活的主旋律。中国人为自己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改革、开放。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表层上，它是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改造社会的方面。在深层上，它是对人的素质、人的观念的改变，这是改造人的方面。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改造社会，就是要使中国社会从贫穷走向繁荣，从愚昧走向开化，从落后走向发达；改革人，就是要使中国人实现理性的超越、精神的超越、思想的超越。开放，就是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之中去，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放。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定会同时得到改变。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世界观、决心改造他自己的国家时，曾经这样写到：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同样，我们今天在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呼唤社会的现代化，又要呼唤人的现代化。

人类是富有理想的动物。人类总是在为自己描绘新的美的未来蓝图。人类总是在追求完美。圆满，即使人们达不到这种圆满，仍然还要这样做，追求圆满，又永远也达不到圆满，也许这就是人谱写自己历史的特有方式。实现了理想，又树立新的理想，人类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能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时，他们是这样地描述未来美好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在离开人世前，都为整个人类的利益发掘了自己的全部潜力，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力，耗尽了自己的全部体力和精力。这样一个社会，对于我们每一个现存的人来说，是一个可以想象而不能到达的社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可以去追求它，憧憬它，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这种社会一旦在人世间变成现实时，那时全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定会亲手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一个大写的“人”字。即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会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占有了人类全

部本质”的“真正的人”。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成为向这种“真正的人”靠近的一代新人。

我们的社会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新型的社会是由新型的人创建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通过实践创建的客体。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相互作用，共生共长。我们要创建的新型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现代化有机社会系统。这个系统要求这个社会要有承担不同角色的新人。

人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就是人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与地位。人是有差异的，人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也就是有差异的。社会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角色的多样性。有的人在社会系统中默默无闻，只起到一个分子的作用，成为历史进步的铺垫。他们并不是在社会系统中没有承担任何角色，因为任何一次历史的巨大进步，都是以牺牲无数个体为前提的。与此相反，有的人则在社会系统中赫赫有名，在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中起到核心和灵魂的作用，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并由于他们作用的巨大而成为历史人物。社会要素的可变性决定了人的角色的可变性，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既可能成为无所作为的生物人，也可能成为如同政治家、科学家那样的社会精英。一个历史人物既可能推动历史的前进而留名千古，又可能延迟。阻碍历史的发展而遗臭万年。生活在同一时空里的人，可以担任各种不同的角色；生活在不同时空里的人，可以担任相同的角色。人的角色所具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可变性，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局面，使社会系统显现为一幅绚丽壮观的画卷。

按照社会系统的结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部分组成。而这三个组成部分又都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承担，因此，在社会系统中又可划分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这三大类别。

经济人就是社会系统中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者，这是保证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人。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已形成了物质生活需要和物质生活能力，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到了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保障。这部分人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各个不同时代物质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他们创造的产品看得见，摸得着，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年代里，经济人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

政治人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组织者，这是保证整个社会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相互协调一致的一部分人。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维系社会系统的整体存在，使得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处于同一体系之中。没有这部分人的自觉的管理，文化就会在自己之后留下沙漠，整个社会系统将是一片混乱。

文化人就是社会系统中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这是保证人类社会精神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在物质生活被满足之后，专门进行文化艺术创造，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主要阵地，这部分人的特点是从事思维加工，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是远离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从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在社会系统中的不同作用和地位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互相区别的不同特征。经济人主要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他们面对着一个现成的世界，生活在物理的空间之中。文化人主要是在精神的王国里创造人类的未来，他们呼唤新的社会，召引人类不断自我超越，他们生活在理想的天空之中。而政治人则着眼于他们所生活的现时代，完成历史从过去向未来的转变，他们是他们

们那个时代各种不同社会角色的汇合点，他们生活在现实的空间之中。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些生活在不同空间里的人共同创造的。经济人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物质生活条件，使人类得到生存的保障，使政治人获得管理社会的基本前提、为文化人创造了从事精神生产的条件。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活动，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黑格尔等文化人的出现；也不会有凯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等政治人的出现。文化人则为整个人类描绘美好的未来的社会图景，他们靠理性、靠激情使人类脱离现存世界，走向崇高，走向未来世界。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许是人类永远也达不到的现实世界，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却激励了世代代的人们的不懈努力，也许这正是文化人的历史作用。政治人就是把文化人创造的理性社会付诸实践，让理想变为现实。所以，政治人首先要有理想化的启蒙，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所谓伟人的伟大究竟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在关于什么是世界秩序这一种朦胧的知觉当中。这种知觉最后会转化为政治行动，用来安定世界秩序。伟人像凯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等等都是被神圣的理性接触过的。在他们同时代人的清醒头脑中，这种神圣的理性看来好像是疯狂似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人，都是在企图把理想的社会变成现实。然而，任何时代的政治人，都只能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与此同时，文化人又在不断创造出新的理想世界，而经济人则在不断保证政治人和文化人他们各自的社会作用的发挥。这三部分人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而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张力的背景下存在着。

应该说明，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的划分都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把整个社会系统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的角度上，按照不同人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才有了这种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的划分。而实际上，在现实的人的世界里，是很难找出纯而又纯的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的。人类本身具有多种需要，承担了多种角色，一个人既可以是一个政治家，又可以是一个思想家，还可以同时成为一个企业家。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既需要经济生活，又需要政治生活，还需要文化生活。在原始社会，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渔人猎人也常在业余时间从事绘画谱曲等文化艺术创造活动，他们同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这时候的人处在一种原始的全面发展的状态。进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分工的限制，使得人们相对地固定在某一生活领域和生产部门，片面地发展了人的需要和人的个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分工和私有制被废除之后，人被固定在某一领域里的局限性就会被克服，从而使人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获得全面的发展。到那时，就更不能指出某个人是政治人还是经济人，而只能说，每个人既是政治人又是经济人，也是文化人。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在上述三种人中作出重要与不重要、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因为按照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这几种人都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他们各个都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角色，又同时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制约。要素是系统的要素，系统是要素组成的系统。离开了系统整体，就不能说明作为部分的要素；离开了要素部分，就不存在系统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对于社会系统的存在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人、政治人、文化人，我们这个社会所产生的并非只是一般的普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

大变革时代，社会需要新人，就会产生新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需

要伟大的人物。就会产生伟大的人物。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们在创造中华民族伟大的新时代的时候，就是在创造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时代英雄。

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星光灿烂、群贤毕至、英雄辈出的时代。恩格斯在论及文艺复兴的时代情景时这样写道：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给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同时放射出光芒。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建筑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 16 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末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也是要使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复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复兴，远远高于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因为世界历史又前进了几百年，世界文明又有了新的进展，基础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在当代文明的基础上，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机制，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体制，实现占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先例可比的划时代的巨大工程。在这个工程的创建中，一定会创造出代表中华民族当代风貌的冒险家、实业家、革命家；一定会涌现出改天换地的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外交家；一定会诞生再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家、理论家、思想家；一定产生才华横溢、奉献出宏篇巨制的巨匠、泰斗、文豪、天才、巨人、大手笔。这些伟大人物具有伟大的人格，强大的意志，创新的精神，冒险的勇气。这些伟大人物具有现代化知识、时代的气息、雄浑的胆略、高操的能力、博大的胸怀。这些伟大的人物能够站在当代世界文明的高度，娴熟地解决当代中国和整个人类面临的难题，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新崛起，让这个文明古国再度辉煌，重展雄风。

一百年前的今天，即 1893 年 2 月 1 日，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序言的时候，他联想到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刚诞生时的情景，满怀豪情地迎接无产阶级的新纪元，他说。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 1500 年代那样，新

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伟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要反复出现。今天，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大潮之中，面对中国的未来，我们产生了和一百年前的恩格斯同样的心情。

1992年渐渐离我们远去，20世纪正在接近尾声。我们中华民族正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双臂，迎接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正以强烈的意识期待着代表新世纪的巨著问世，宣告新时代的巨人出世。

